炎黄春秋

99/9

总第90期

■ 一九四九，我终身难忘的一年

■ 从五一口号到群贤毕至的新政协

■ 吴江：值得纪念和研究的梁漱溟

■ 孔德懋从圣府闺秀到社会活动家

■ 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

■ 『东北叛党集团』冤案与邹大鹏之死

■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朱镕基总理（前排中）会见荣获1998年“友谊奖”的外国专家、二排右侧为臧英年、苗丽华夫妇

炎黄春秋

专 论

2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和一个时代的缩影……费孝通

春秋笔

4 1949——我终生难忘的一年……金 凤

14 从五一口号到群贤毕至的新政协……高建中

陨星篇

18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吴 江

26 陈赓大将在援越抗法中……张广华

30 忠贞不渝的刘达五将军……黎 白

35 王作尧命途多舛斗争不屈……王 曼

英杰谱

40 周恩来在绍兴结交一方名士……高 汉

44 23 年前胡耀邦给年轻人罗炤的一封信……

46 烈士方志敏和他的妻子……崔向华

沉思录

48 "东北叛党投敌集团"冤案与邹大鹏之死……严 石

52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齐 坚

人海浪

56 孔德懋从圣府闺秀到社会活动家……邱 健

60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驰骋商海……孙晓鸥

九州景

63 萧克将军重访炎陵县……王锡堂

群言堂

66 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王增瑜

69 开展"舆论史"研究……邵燕祥

70 难事不难……王 村

飞来鸿

71 老的感觉……冰 子

文荟苑

"却卷波澜入小诗"(封二)……胡 绳

72 生物学家石声汉的劫后幸存诗……涂光群

76 国歌的故事……俞乃蕴

赤子心

78 有心报国岂无路……臧英年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中国标准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 399 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出版日期:每月 4 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 0079 号
定价:4.80 元

一个知识分子的一生和一个时代的缩影

——《费孝通文集》前记

● 费孝通

在我这一生即将进人21世纪之前，也就是在我走过90岁这个年限之后，我的亲友们建议把我过去一生所公开发表过的写作整理成一部文集，作为纪念。我同意他们的好意，但是我自己这几年有不少已预定的课题还要完成，实在抽不出时间来帮助他们做这项工作。我只能表示尽力支持他们而已，又只能放手和放权让他们去办。最近他们已经把这部文集初步编成，将要去付印出版，坚持要我在集前说几句话。我表示同意，所以简要地把我想在集前说的话写下。

我同意把我一生公开发表过的写作力求完整地编成一部文集，这样做的主要目的是在为一些想了解我国20世纪知识分子怎样走过来的人提供一些研究的素材。我的一生从20世纪初期到它的结束，经过了九十个年头，这段历史给了我一生经历的内容。由于我自己喜欢写作，所以我也为这段历史留下了一些文字上的痕迹，反映了我这段时间里社会对我所起的作用，同时多少也透露了这段历史时期里中国的知识分子通过写作对社会所起的作用。作为一个以研究中国社会和文化为一生兴趣的人，我以己度人，想到我身后也许还会有和我一样有此同好的人，我愿意把我要留下的这本文集提供他们做研究中国这段历史的素材。也想以此作为我对我一生所受社会培育的一些回报。

为了贯彻我这个意愿，所以我一再向负责整理和编辑这部文集的亲友们说明，我愿意授权他们尽力搜集和如实地处理我一生留下的写作，把它们保留下去，而且尽可能全部编印出来，有待今后读者的取用。

但在这里我也得作一点保留意见。因为我一生中有一段时期曾经被划为“右派”，受到不可抗拒的压力，不得不写下一些言不由衷、不符合我实际意识的文字，就是那些被迫写出的“检讨”和“交代”。这些文字要作为研究当时历史经过的素材，是可以有用的，而且也可以说是有意义的，但需要如实地放进当时很特殊的和失常的社会情景之中去，才能明白其实在的意义。现在已事过二十多年，我本人不容易，也不愿意重新记取当时的社会情景，而这些文字又必须详加注释之后才能有用，如果用原文留给后人，不免会起误导的作用。所以我再三考虑，还是要求把这一部文字，作为另案处理，免于收入这部文集之内。我希望后来的读者们能谅解我提出这种保留的苦衷。我愿意在此声明这个保留意见是我自己作出的，我也愿意为此负责。

我同意编者以文章发表的时间先后来编排在文集中前后的次序，我认为既以提供研究素材为目的，所以为了便于追索我一生思想的发展和经过，采取按这些文章发表的前后来编排定在文集中的先后次序最为方便可行，但是事实上我是又有多题并进的思考习惯，不同题目的思想可以在同一段时间里参差进行。而且文章的完稿和发表之间又有不同的差距，我的文章又经常在同一时间里投向不同的刊物，发表时间和写作时间又不一定相符。由于以上种种原因引起了文集编者

的一些困难，不可能坚持上述的原则。同时也必然会使一般读者不能按文章编排的前后顺序来追索我思想的发展和变化。

在文集的编排上还有一个引起编者为难的原因是我在写作上常采取化整为散又集散为整的方法。就是一个课题时常分作了系列的短篇写出，一般是在一个刊物上连续发表，积有一定篇幅，再编成一卷作为专集出版。凡是已经以专集方式出版过的一系列文章，我建议在本文集里还是予以保留使文章内容的连续性不要拆散。这里又发生了一个编排上的难点，就是那些已结合成专集的文章，各篇发表的前后的间隙中我又时常插进另一个新的系列。逢到这个困难，我建议这本文集的编者只好让前后为序的原则作出些让步了。

我要感谢本文集的整编者为这项工作所费的劳动和精力。我认为他们把分散在各地各种报章杂志刊物上的文章收集起来确已竭尽了全力。要想做到把我一生全部写作都搜集到手困难很多。我的记忆中早年有一些常发表我文章的杂志和刊物，现在已经因各种原因，无法找到了。又比如我最早投稿的《少年》还是友人从偏僻的图书馆里找到的，而当时我曾用“费北”的笔名在这刊物上发表的一些作品，却没有复制给我。又比如我在中学毕业时所编的《水荇》中发表的早年作品，还是友人在东京大学的图书馆中偶然见到而复制寄我的。至于我在昆明学生运动前后所发表在许多街头刊物上的文章，为数不少，现在已搜集不到了。

最后我应当感谢这本文集的编者，他们不仅费了大力去搜集我散失的写作，而且又费了大力去校核所搜集到的文章的复印件和原刊里的错字和失误。我嘱咐他们的一条原则是凡不属于显而易见排印上的错失，一律存旧。因为在这段虽然不算长的时间里，一般通行语文的用辞也有相当的变化。这时已不常见的辞汇，在几十年前会是常见的，而各人所用辞也存在着个人的习性，所以现在看来不太顺眼的辞汇不宜改动。但在校核过程中确是发现不少出于作者的错失或疏忽，以致文章内容中有实质的错误，使前后所提的事实对不上口，甚至有矛盾，在数字上又有出入。这些错误应当由作者来负责的。我十分感激编者对我已经公开发表的论文中能发现这些错误，使我在有生之年还能有机会把这些错误予以公开纠正。所以我请求编者凡逢到这类情形，应当按照原文不加修饰地予以付印，并加注说明错误所在，千万不可掩盖。已经公开发表的文字，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人生不可能无过，有过则改，坦白不讳，就对得起读者了。如果文章中还有错失没有揭露之处，祈望今后读者继续纠正。我即在九天之上，也将表示感激。

我一生写作自以为是比较随意和顺性的，秉笔直书，怎样想就怎样写，写成了也不太计较个人得失和别人的毁誉，这种性格确曾给我带来过没有预计到的人生打击，但至今不悔，而且至今我还是这样做。这是因为我相信用文字来写作是文明时代一个社会成员参与集体生活时的一种自主和自由的行动。当然一个人所有的思想无不受当时社会的陶冶。他的一言一行无不是社会集体藉以交流和进行集体行为的方式。社会集体就是通过其成员的言行达到它的创新和发展。所以一人的言行虽系个人之事，但也受到这个人所参与的社会，包括社会的历史遗产和当时群众思想的交流的塑造，从这个角度来说有它表现社会的一面。我有时也乐于反复重读我过去的写作，常常以此作为我所处时代的一些纪录影片来自娱。我也希望能以此提供有些读者同享。从这个角度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同意我的亲友们提出整编这部文集的建议。在这部文集中也保留了一些我这一生未能实现的梦，和具体的有关研究社会的思路和此生未获申论的课题。如果此书能对一些后来者发生一点启发的作用，因而能继续进行发挥和发展，这将使我感到三生有幸了。后世不乏比我更有才能和学力、具备更好研究条件的人，希望能从此基础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获得更大的成就，于国于民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将为此而感到没有辜负此生的激情于地下。念人世的茫茫，愿以无悔无悉而告终。谨此写下这本文集的前言以告读者，并再次表示对编整和支援这本文集的亲友们的感激。

(14卷本《费孝通文集》将由群言出版社出版，本文为《文集》的前记，标题为《中华读书报》编者所加)

1949——我终生难忘的一年

● 金凤

编者按：国庆五十周年即将来临，《人民日报》著名记者王金凤为本刊撰文，记述她在1949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入城（北平）式和开国大典的报道，以及她采访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国家领导人重要活动的情况。行文栩栩如生，把人们带回到那个难忘的年代。

1949年，新中国成立的一年，也是我踏上记者岗位的第一年。50年过去了，1949年依旧深深刻印在我脑际，有多少难忘的人和事在我心底翻滚，使我情不自禁，写下记忆深处那些鲜明的印象和镜头……

当时平津战役已经打响，由彭真任书记的北平市委和由叶剑英任主任的北平市军管会在良乡正式成立，接管北平急需大批干部。我们这批从北平、天津奔赴解放区的大学生就成为合适的人选。经市委组织部分配，决定我去人民日报兼新华社华北总分社记者。我和北大的陈迹、陈骥，燕京的陈泓一起，向负责北平新闻工作的范长江同志报到，他对我们这几个“新兵”表示热烈欢迎。

我的记者生涯从此开始了，那时我20岁，是人民日报最年轻的记者。

解放军入城式

北平解放前夕，成立了新华社北平分社，李庄同志是主任，韦明同志是副主任，我和陈迹都调到新华社北平分社当记者。

1949年1月31日，李庄率领我们到北平石碑胡同接收了国民党的中央社北平分社，并使之成为新华社北平分社的社址。

2月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举行威武雄壮的入城式，我被分社派去参加这一有重大历史意义事件的采访报道。

一清早，我赶到前门箭楼下，这里已聚满了许多欢迎群众，有工人、学生、店员、市民，还有穿着长袍马褂和旗袍、大衣的民主人士。大中学校学生组成一队队的秧歌队，欢快地扭着秧歌，锣鼓震天，红旗飞舞，他们尽情地欢庆解放。有的学生在背上贴着“我们解放了”几个大字，格外引人注目。我走到各界群众中收集他们的反映。有的说，天亮了，我们解放了，有了活路了！有的痛斥国民党统治的黑暗腐败，欢迎共产党、解放军“救民于水火之中”……大家的情绪非常热烈。

上午9点，箭楼城门上出现了林彪、聂荣臻、彭真、叶剑英等中共领导人的身影，箭楼下的群众立刻热情地欢呼起来。

记者金凤和毛主席、朱总司令在一起

入城式开始了，一队队步兵、炮兵、骑兵、装甲兵排成整齐的行列，穿着整洁的军装，坐着大卡车、坦克，骑着战马，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从前门外列队进入前门。两旁夹道欢迎的群众，欢呼声如排山倒海般汹涌。人们想不到一向被称为“土八路”的共产党部队穿着如此整齐，装备如此先进，简直把大家看呆了。队伍从前门到天安门，转入王府井、东四、西四一直出西直门。我采访的区域是前门、天安门到王府井。随着部队，我一路从前门走到王府井，采访了许多群众。再从王府井穿过天安门回到石碑胡同，顾不上休息和吃饭，立即伏案写稿。李庄是到箭楼上采访的，他赶回分社，综合大家的稿件内容及时写成解放军入城式的新闻，发给总社。我们还分头写了几条花絮，报道入城式中最生动感人的镜头。

第一次听周恩来报告

我第一次见到周恩来是 1949 年 3 月，在一些著名科学家为成立中国自然科学工作者协会而举行的一次筹备会议上。那时我已从新华社北平分社调回《人民日报》当记者，便以党报记者的身份前往采访。

会场设在骑河楼清华同学会。这是一座灰色的楼房，会议室不大，到会的科学家却不少。竺可桢、曾昭伦、严济慈、周培源、茅以昇等一百多位著名科学家，济济一堂，小小的会议室都坐满了。

我在后面找了个位置坐下。突然，眼前一亮，身穿一身灰布军装的周恩来进来了。

我在国民党统治区早就听说过周恩来的名字，在斯诺写的《西行漫记》中看到过留着大胡子的周恩来照片，也多次在国民党报纸上看到过他穿着西装和国民党举行谈判的勃勃英姿。北平刚刚解放，周恩来的工作极端繁忙，我没有想到，他会来参加科学家们的一次筹备性集会。

会场上的科学家大概也不曾想到周恩来会来，他们全都站起来热烈地鼓掌表示欢迎。周恩来站在小小的讲台上，亲切地微笑着，浓眉下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环视了台下一百多位中国著名的学者，谈笑风生地开始作报告。

他谈了科学家们最关心的几个问题：政治和科学的关系，党的知识分子政策，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问题。这些问题都有很强的针对性。

他说，自然科学能否超阶级超政治？也能，也不能。他说，将来到了共产主义社会，没有了阶级，自然科学当然可以超脱地自然发展。但今天的世界上还有阶级，还有政治斗争，自然科学

就不可能脱离政治。尽管不少科学家主观上想脱离政治，可是实际上会受政治的支配，这是历史和今天的现实。他说到今天世界上存在两种不同的政治，为最大多数人民服务的政治和为极少数剥削阶级服务的政治，自然科学家要区别这两种政治并据此决定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他谈到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是团结、教育和帮助、改造的方针。他笑着说，中国的知识分子特别是学者、教授一向很清高，听到思想改造，可能很恼火，觉得共产党不尊重知识分子。其实，思想改造是普遍的，人人需要改造。共产党员首先要不断改造自己的主观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客观世界。他从自己的出身和经历谈起。他说，他出身于一个没落的官僚家庭，上的是资产阶级学校——天津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后来又到欧洲学习。他谈到他从一个激进的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的经历，谈到他在参加中国革命的长期艰苦斗争中也犯过错误，遭受过失败和挫折，因此也要不断进行思想改造……

听到这里，我不禁大吃一惊。那时我入党刚两年，朦朦胧胧知道一点党的历史，知道有过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错误和王明“左”倾机会主义错误。可是，从来没有想到在党内外有崇高威望的周恩来也会犯错误，更想不到他竟会当着这许多科学家(多半是党外人士)公开谈自己犯过错误。我以为，我们党内某同志如果有过错误的话，也只能在党内谈，怎么可以公开对党外知识分子讲呢?

我大错而特错了。我当时实在年轻幼稚，不了解周恩来正是以他的光明坦荡、无私无畏、循循善诱的精神，第一次见面就征服了中国这些著名科学家的心。

我看到，这些一向严肃的科学家听到周恩来这样光明磊落地谈自己的家庭出身、思想转变以及革命过程中犯过错误时，他们脸上也露出惊讶的神情。很快，他们由惊讶变为敬仰，完全听得人了神。我看到，有人不住地点头表示欣赏。

此时，大家感到，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位同大家一样，从旧社会、旧家庭、旧学校走出来而又经过几十年革命锻炼的知识分子的朋友、同志，他在向我们作推心置腹的谈话。他没有一点胜利者居高临下的傲气，没有说教，没有故作惊人之谈，然而谈话的内容却异常深刻、新鲜，饱含人生哲理，完完全全谈进我们心里，如高山流水，清澈见底，滋润了我们的心田，打开了我们的眼界，提高了我们的精神境界。

周恩来一口气站着讲了六个钟头，没有露出丝毫倦容。报告结束，全体科学家站起来，报以经久不息的热烈的掌声。我听到科学家们在纷纷议论，有的说：“共产党有这样出色的领导人才，难怪会得天下!”有的说：“他说得太好了，句句说到我们心坎里……”

窗外已是万家灯火，我立即赶回报社，写了一篇会场速写，第二天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朱总司令和青年一起劳动

1949年5月4日，北京市学联组织大中学校的学生，在天安门广场义务劳动。

当时的天安门广场，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上午8点，我骑车赶到天安门广场，只见广场上红旗招展，同学们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许多学生在挥舞铁锨，有的在捡拾地上的碎石，有的在拔草。我放下自行车，和同学们一起干起来，一边和他们随意交谈，才知道学联原来规定只来800人，结果来了两千多人。许多学校埋怨分配的名额太少，大家都抢着要来。

忽然，我们看到一辆小汽车，从西边开过来，在天安门广场边上停住了。车门开处，穿着一身草绿色布军装的朱总司令健步向我们走来了。广场上的几千名学生，扔下手中的铁锨、扫帚、簸箕，齐声欢呼起来。

北京市学联的同志赶忙迎上去，我也赶快跟了过去。朱总司令满面笑容，高高兴兴地说：“听说你们在这里义务劳动，我来看看你们。”

市学联的同志恭恭敬敬地说：“请总司令给我们指示。”

“啥子指示嘛”，朱总司令笑着用他那浓重的四川口音说：“我是来和你们一起劳动的。”

作者与她的丈夫空军战斗英雄赵宝桐

说着，他脱去军装上衣，只穿一件白布衬衫，抢过铁锹，便和同学们一起干起来。广场上一片欢腾，同学们干得更欢了。

干了半小时，同学们请朱总司令休息。朱总司令笑着说："不累，不累，我种过庄稼，开过荒。你们怕是累了吧？"

同学们齐声喊："不累，不累。"

又干了一个多钟头，这时已经10点多了。广场外开来一辆吉普车，车上下来一个军人，向朱总司令立正，敬礼，报告，大约是有事请总司令回去。

朱总司令放下铁锹，拍拍身上的土，穿上军装上衣，笑着大声对同学们说："同学们好，我有事要先走了，不能和你们一起干到底了。希望你们努力学习，锻炼身体，成为建设新中国的有用人才！"

朱总司令上车走了，同学们依依不舍地看着那辆黑色轿车往中南海方向驶去。大家又七嘴八舌地说开了："真了不起，朱总司令和我们一起劳动啦！""我们真幸福啊，和总司令一起劳动了！"

大家干得更起劲了。一个上午，广场上的杂草清除了，碎石、垃圾不见了。天安门广场收拾得清清爽爽，干干净净，彷佛一个满面胡须的老人一下子变成神清气爽的年轻人。这是两千多学生的劳动成果，其中也包括了朱总司令的一份劳动。

五月中旬，在全国青年代表大会上，我又一次见到朱总司令。他代表党中央向大会致贺词。那天，发生一个意外插曲，让大家吓了一跳。

朱总司令讲话时，不知是那家新闻单位的摄影记者上台为他照相。可能当时的摄影器材质量不好，只听得闪光灯啪的一下爆炸了！这还了得，马上，便上来两个军人，把那位记者带走了。朱总司令没有显出丝毫惊慌和生气，他照样显得那么慈祥，平和地把话讲完。

在双清别墅和怀仁堂两次见到毛主席

我第一次见到毛主席，是在1949年5月中旬一个鲜花盛开的日子。那天我采访全国青年代表大会，和代表们一起乘坐大卡车，到香山双清别墅受到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的接见。

在雄壮的军乐声中，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出现在我们面前。"毛主席万岁"，"朱总司令万岁"，几百名青年代表喊出全国青年的心声。十几个可爱的孩子跑上去，把鲜花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站在一个用木板搭起的台上，台下几百名青年代表排成几路纵队，接受主席和总司令的检阅。四名代表共擎一面一丈多长的锦旗献给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锦旗上写着："我们向你们学习，在你们旗帜下前进。"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并肩站着，笑容满面接受了青年的献旗。

台下的代表们高举着几十面红旗，放声歌唱"在毛泽东的旗帜下，我们胜利向前进！"那雄壮的歌声和"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似乎要冲破蓝天。毛主席频频挥手，用一口湖南话响亮地喊："青年同志们万岁！"

摄影记者抢拍下这些珍贵的镜头。荣高棠同志拿着相机也在照，还洗了一张送给我，是毛主席和青年代表在一起的镜头，其中也有我的身影。这张宝贵的有历史意义的照片历经"文革"灾难，竟然丢失了，实在遗憾。

5月下旬，中央团校第一期学员毕业的这

一天，团中央第一书记冯文彬的秘书打电话给我，叫我赶快到团中央，说“有重大的喜事”。我急急忙忙赶去，随中央团校的学员到了中南海怀仁堂，才知道是毛主席要接见毕业生，此时是下午3点钟。毛主席的秘书出来通知大家，毛主席因为等一个战报（当时解放军正向上海挺进），一直到上午10点才睡，接见的时间可能要推迟些。大家就在怀仁堂静静地等着。

大约5点钟左右，毛主席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过来了。他身穿一身灰布制服，脚上是一双圆口黑布鞋，脸色有些苍白，可能是睡眠不足的缘故。冯文彬同志忙迎上前去，我当时有点“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闯劲，不顾警卫规定，紧紧跟在冯文彬身后。冯文彬和毛主席握手后，一回头见到我，把我推到主席面前说：“主席，这是人民日报记者。”我惊喜中慌忙伸出双手，握住主席温暖的大手。毛主席笑着说：“人民日报记者，人民的记者，今天可不要发消息呦。”我一听慌了，回头求助于冯文彬同志。文彬同志笑着说：“主席，发消息是记者的职责，不然他回去不好向领导交账呀。”毛主席边走边说：“好吧，我不审稿，文彬你看着办吧。”我连忙说：“谢谢主席。”

毛主席进了怀仁堂，中央团校的学员，一下子围了上来，都想和毛主席握手，都想在和主席靠得最近的地方照相，把毛主席挤来挤去。冯文彬急了，大声喊：“规矩些，排队站好。”摄影记者过来照相，有人又悄悄挤到毛主席身边。毛主席笑着，他理解年轻人的心情，一点也不见怪。他的警卫人员也比较通情达理，没有采取措施严禁群众靠近领袖。

照完相，大家准备排队离去。只见毛主席和冯文彬说了几句话。冯文彬连忙高声对大家说：“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主席说，他今天因有事让大家等了两小时，心里过意不去。现在，他愿意和大家讲讲话。”大家一听真是喜出望外，赶忙找座位坐下。我一看，前几排人都坐满了。没有扩音器，我怕听不清毛主席讲话，冒冒失失，上了主席台，站在幕布旁。这是我第一次听毛主席的讲话。他老人家讲得很风趣，他说：“你们都是共产党员，你们有没有想过，我们建立共产党，为的是有一天全世界都消灭了阶级，政治消亡，我们这个共产党也要消灭。我们现在搞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为的是消灭阶级和阶级专政。我们建立党，为的是取消党……”

我们这些二十几岁的青年共产党员听了毛主席这番话，个个感到意外。我们虽也学过历史唯物主义和社会发展史，但却从来没有联系我们共产党的产生、发展以至将来不再存在的历史过程认真想过。中国共产党当时28岁，正是青年时代，面临着建设新中国和将来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宏伟任务。我们时时想着要巩固党和发展党，怎么会想到它有一天会不再存在呢？毛主席从这里开始，讲了党的性质、目标和当前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任务，内容大致和1949年7月1日发表的他写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内容差不多。

毛主席的报告真精彩，我全神贯注地听着、写着。可惜一用力，铅笔芯断了，我急得想哭，这支笔是临时借来的，这时又无法向别人再借，只好收起笔记本，站在台侧静听，拚命记在脑子里。

报告作完，毛主席从容离去。我们带着陶醉的幸福心情离开怀仁堂，离开中南海。我当然还得赶回报社，把这个重要的接见活动，向全国人民作出报道。

刘少奇顶住大国主义、大党主义的压力

1949年11月，新中国成立仅一个月，亚洲澳洲工会代表会议在北京举行，世界工联主席赛扬和几位副主席都来了。刘少奇同志是会议的执行主席。

赛扬是法共中央委员，架子很大，脾气也不小。他虽然是共产党员，却有白种人看不起有色人种包括中国人的种族主义思想。苏联出席会议的一位副主席和苏联工会代表也很高傲。他们摆出大国、大党主义的架子，盛气凌人，要想控制整个会议。当时，会议代表来自亚洲和澳洲的31个国家，并非都是共产党员。他们有的是工团主义者，有的是和平主义者，有的倾向共产

党，有的倾向社会民主党。31个国家的国情不同，有的如中国、朝鲜、苏联是共产党执政的国家；有的如日本、澳大利亚是资本主义国家；更多的亚洲国家如印度、缅甸、泰国、菲律宾则是刚从殖民统治下取得独立，各国工人运动的要求自然也不一样。而莫斯科却要发号施令，想把会议方向完全纳入苏联外交政策的轨道。这就在大会的议程特别是通过那些决议时发生尖锐的冲突和争吵。赛扬是跟着苏联走的，他看到会议不大符合他和苏联的要求，竟然大发脾气，甚至想甩手不干，声称他马上要回欧洲！苏联代表也摆出一副不合作的样子。

刘少奇同志作为会议执行主席，在这种情况下，以非凡的政治智慧和高度灵活的政治策略坚决顶住了大国、大党主义的压力。他不慌不忙，几句话就平息了赛扬的怒火，也使苏联代表安静下来。然后，少奇同志和所有到会的，包括不同政治倾向但要求进步和维护工人阶级权利的各国代表充分协商，终于顺利通过了大家满意的议程和决议，使会议取得圆满成功。

傲慢的赛扬和傲慢的苏联代表低头了。他们终于认识和承认了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人阶级的光荣地位，承认和认识了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刘少奇的杰出才能。在告别宴会上，我亲眼看到傲慢的赛扬举着酒杯走到少奇同志面前，跷起大拇指说："伟大，中国共产党！伟大，中国工人运动久经考验的领袖！请你一定干杯，亲爱的刘少奇同志。"

少奇同志仍然非常冷静、沉稳。他并不因为赛扬的那样赞美而面露喜色。他微微一笑，举起酒杯，友好地和赛扬以及其他代表团团长一起干杯。我在一旁观察，心里十分痛快，对少奇同志佩服极了。心想，这才是真正的大国领袖风度哩。在少奇同志一生中，这恐怕是微不足道的一件小事，却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刘伯承谈解放战争中的二野

1949年秋天，当人民日报布置我去访问即将参加全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刘伯承同志时，我一方面非常高兴，同时又十分惶恐。我丝毫不懂军事，却要访问一位举世闻名的军事家。我只好临时抱佛脚，赶着学习毛主席写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等几篇军事著作，其实是囫囵吞枣，似懂非懂。在约定采访的那一天，我怀着不安的心情，来到中南海刘伯承同志的住处。

这是一排三间老式、朴素的平房。东面一间住着刘伯承同志，西面一间住着粟裕同志，当中一间放着一张方桌和几把椅子，大概是他们吃饭的地方。

我掀开东面房间白布门帘，走了进去。

刘伯承同志看了介绍信，笑着说："你是人民日报记者？很年轻嘛，你是要访问我？你可知道，我是不喜欢记者访问的。"听了这几句话，我心里更加紧张起来。刘伯承同志说："我给你讲一件往事吧！那是1941年，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日军向我太行山区八路军总部展开铁壁合围的扫荡，企图消灭我军主力。我在前线指挥所正忙着指挥反扫荡斗争。一位记者硬逼我谈了20分钟的话，事后他却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大篇，把我吹得神乎其神，什么常胜将军，什么杰出统帅，什么战争之神，简直乱弹琴。文章送到我手里，我把它扔到废纸篓里去了。你看，我对记者是不是不大客气？"我大着胆说："我猜想，那位记者可能有点'客里空'作风，写的不大合乎实际，你才把稿子扔进废纸篓的吧？"刘伯承同志笑了起来："原来，你也知道'客里空'？"我说："我看过苏联剧本《前线》，也知道解放区新闻界开展过反对'客里空'活动。"我一下子找到了接近刘伯承同志的共同语言。他从办公桌上一大堆书中抽出一本俄文书给我看："你看，这就是《前线》这个剧本，我很喜欢它，常带在身边。你知道，书中描写了一位戈尔洛夫将军，思想保守又骄傲，值得我辈军人警惕。也写了你的一个同行'客里空'记者，信口开河，弄虚作假，你可要注意啊！"我连连点点头说："谢谢你，刘伯承同志，我刚开始工作，一定警惕，不当'客里空'这样的记者。我希望，写的稿子不至于被您

扔到字纸篓里去。”气氛已经缓和，刘伯承同志问：“你要我说什么?”我按照报社的布置，老老实实地说：“请你谈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

“要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刘伯承同志哈哈大笑起来：“你这个娃娃，提这样大的问题，你知道什么是军事战略思想?哈哈，你呀，就像小孩子戴顶大帽子，喏喏，快盖到肩上了。”他边笑边打手势，好像一顶大帽子正盖在我的头上，连头带脑盖下去，一直盖到肩膀上……

我明白了我这样幼稚的外行，提这样大的问题的确很不相称，很可笑，我跟着也大笑起来。

“好热闹啊，你们在笑什么?”一声洪亮的声音在门外响起。随着声音，走进赫赫有名的邓小平和贺龙同志。我连忙站起，真高兴在这里又看到我久已景仰的两位前辈。贺老总学着刘伯承、邓小平的四川口音，大声问：“你们笑的啥子嘛?”

刘伯承同志笑着说：“这个年轻记者要我谈谈毛泽东的军事战略思想。你们看，像不像一个小娃娃要戴顶大帽子，那帽子一直盖到肩上了?”

“哈哈，哈哈”，贺老总的大笑声震全屋，他那捏着烟斗的手不住在我面前晃动：“小娃娃戴大帽子，哈哈，帽子盖到肩上了。”小平同志也爽朗地笑了起来。

在三位前辈的朗朗笑声中，我十分窘迫，又感到无比亲切。我红着脸小声说：“刘伯承同志，您愿意谈什么，我就记什么。”

刘伯承同邓小平商量：“你看，我谈些什么好呢。”

小平同志痛快地说：“你定好了，谈什么都行。”

刘伯承说：“那就谈谈我们二野在解放战争时期的经历吧，你看怎么样?”

小平同志连连点头说：“好，好。”小平和贺龙同志走后，刘伯承从墙上取下中国地图，铺在大写字台上开始谈起来。

“在解放战争各野战军协同互助获得胜利之中，第二野战军不过是其中战斗单位之一而已。因为二野的作战基地——晋冀鲁豫、中原、华东这些地区都处于四战之地，二野也就成为四战之军”。刘伯承同志以他特有的严谨，一开始就精辟地概括了第二野战军在解放战争中的作战特色。他熟练地用手指在地图上指划，讲起解放战争时期的政治形势和军事形势，讲起二野在解放战争期间走过的战斗历程。他谈话的声音不高，语调平静，言词简洁，逻辑严密，记忆力十分惊人。几十次战役，成百个地名在他口中徐徐吐出，如珠落玉盘，不断滚动。尽管我丝毫不懂军事，但随着他的叙述，在我面前清晰地展开了决定中国命运的解放战争那一幅幅壮丽雄伟的画卷。我的眼睛忙着看地图，耳朵忙着听谈话，笔尖忙着在本子上沙沙地写着。我忘了时间，忘了身外的世界，自己也仿佛置身在刘伯承指挥的第二野战军的战斗行列……

“首长，该吃饭了。”一位年轻战士站在刘伯承面前这样喊。这才把我从战场拉回到和平的空间。一看手表，12 点了，不知不觉，谈了三个多小时了。我看了看笔记，解放战争还只谈了一半，我为难地说：“还没有谈完，刘伯承同志，您看什么时候再谈?”

刘伯承爽快地笑笑：“这样吧，下午接着谈，现在吃饭去。”他让警卫员再打一份饭来，吃完饭已将近一点钟，我请伯承同志休息一下，他摆摆手：“不用了，我们接着谈。”

大地图摊开在桌上，刘伯承马上接着谈。他那时视力已很不好，要用两副眼镜。他自己看地图时用一副眼镜，当他把地图摊到我面前，他用手指着地图讲解时，又戴起另一副眼镜。就这样，他忙着一面讲，一面把地图推来推去，同时交替使用两副眼镜，我真是感动极了。

不知不觉，四个多钟头过去了。我一看表，已经下午 5 点多钟。算来，这一天刘伯承同志和我谈了整整 8 个小时。我怀着十分感激的心情起身告辞：“谢谢您，刘伯承同志，感谢您花这么多时间接受我的访问。记录整理出来马上送您审阅。”刘伯承摆摆手：“先不忙给我，我是代表二野谈的。你先请出席政协的二野代表们看看，听听他们的意见，补充修改后再送给我。”我点

头答应，心想刘伯承同志真是谦虚啊！

回到报社，我连夜把访问记写了出来。第二天和二野代表团联系，在北京饭店开了座谈会，把访问记念给他们听了，他们补充了些意见。我修改了一遍，才给刘伯承同志送去。

两天后，我收到刘伯承的审稿。打开信封，赫然映入眼帘的，是原稿上刘伯承用毛笔修改的苍劲有力的笔迹。可敬的刘伯承同志百忙中把文稿修改润色一番，文字简练了，结构严谨了，题目也是刘伯承同志起的，叫“四战之地，四战之军”。我激动地把文搞抄了一遍，把抄稿送排字房发排，把原稿留在身边。

文章发表后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以为作者是一位老练的军事记者，没想到我是一名刚过20岁的青年记者。其实，全靠刘伯承同志的谈话，我不过是忠实的记录者而已。何况文稿还经过他亲笔修改呢！十分可惜的是，刘伯承同志亲笔修改的原稿在“文革”中丢失了，夫复何言！

不拘一格的廖承志

1949年，我分工采访青年团、青年和学生工作，常去团中央。那时，团中央人才济济。冯文彬是团中央第一书记，蒋南翔是书记，廖承志也是书记处书记，肖华、李昌、韩天石等是常委，荣高棠是秘书长，宣传部长是杨述。

去团中央的次数多了，和廖承志同志也熟悉了，大家都称他为“廖公”，我也这样称呼他。他生性诙谐，出言幽默，只要他一到场，会议便开得生动活泼，我们都喜欢听他讲话。

一天，冯文彬的秘书郁文通知我去旁听团中央常委会，我匆匆忙忙跑去了。

一看，团中央常委都到了，廖公也在座。他向我眨了眨眼睛，示意我坐下，我便在他对面一张空椅上坐了下来。因为我刚刚骑自行车赶来，浑身还冒着热气，头发有些散乱，我也顾不得梳理，甚至顾不得卸下身上背着的军用挎包。挎包还背在身上，我从包中取出笔记本，就全神贯注地记录会议的发言。那时，党内民主生活很正常，常委们坦率地交换意见，真正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廖公也发言了，他讲话简明扼要，从不拖泥带水。讲完话，他便靠在椅背，静听他人发言。我仔细记下常委们的讲话，一面思考，应当根据这些发言提炼什么报道思想或报道线索。坐在我对面的廖公看着我身背挎包，一面记录，一面思考的紧张模样，大概觉得有趣、可笑。只见他抽出钢笔，在笔记本上飞快地写着，我还以为他是记他人发言或是写他自己的发言要点。

会议开了两个小时，休息一下，常委们纷纷离坐，有的抽烟，有的聊天。我也合上笔记本老老实实坐着。廖公笑着走过来，递给我一张纸。只见纸上他用钢笔画了我身背挎包、一手拿钢笔一手捧笔记本的可笑模样，上面还题了“王金凤小姑娘肖像”。我看到画像，满脸通红。冯文彬、荣高棠这时也走过来了，看了速写画都大笑起来。荣高棠笑着说：“廖公，你不要光给年轻同志出洋相，你自己也该画一张。”廖公慨然应允，马上当场画了他的一张速画像，并题了“姓廖的老头子自画像”几个字送给我。画像上的廖公挺着开始发胖的肚子，两手捧腹，端然正坐，脸上是一副俨然的神气。参加会议的同志看了，都大笑起来，说廖公真是多才多艺，画得传神。廖公郑重地对我说：“金凤同志，我决不是出你的洋相，我是描绘了你青春奋发精神的一刹那。青春，青春，那是多么美妙的时期。我看你笑嘻嘻的，无忧无虑，高高兴兴地工作、学习。和我这个老头子比起来，我真羡慕你的青春。我的青春已是一去不复返的了。”

这时，一向乐观开朗的廖公发出一声轻轻的叹息。他的话不像是开玩笑。我想，他是用他独特的方式，勉励我不要虚度青春大好年华，应当更加奋发地工作。我珍重地将这两张画像夹进我的笔记本中。

接着，我听到他又在说自己的“笑话”了：“诸位，我奉劝你们千万不要说一句假话，尤其是对我们的周副主席（即周恩来同志，当时还未举行开国大典，周恩来还未当总理，党内都称他周副主席或周公。）说了假话就要受到惩罚。就在昨天，不，应该说是今天凌晨三点，我忙完公

事，实在困得不行，赶忙躺下。正睡得迷糊，电话铃响了。我心想，半夜三更，还来电话，不是成心不让我睡吗？我一肚子火，拿起电话，只听见对方说：‘廖承志同志在吗？’我睡意未消，糊里糊涂应了一句：‘廖承志不在。’不料电话中忽然传来周副主席的声音：‘你不是小廖吗？’我一惊，连忙答应说是。周副主席严厉批评了我：‘明明在，怎么你说自己不在呢？这会耽误大事的呀。半夜找你，必有紧急的事，再怎么累，也不能说不在。’周副主席在电话中足足训了我五分钟，才交待了要我办的事。我现在把这件事说给大家听，诸公应引以为戒呀！在任何情况下，甚至在睡梦中也千万不要说一句假话，这是要受到惩罚的呀！”

大家听了起先哈哈大笑，转而又严肃起来。廖公正以他的坦荡和幽默方式，在向大家揭示一个极其普通的做人原则啊！

不说一句假话，当时我认为，这有什么困难，事无不可对党言。以后经过多次政治运动，才知道事情并非那么简单。有的同志说，自“反右”运动后他在党内便不说真心话了。

过了几天，我在一个奇特场合，又看到了不拘一格的廖公。

1949 年的人民日报社社址在王府井大街。报社旁有个小胡同。早上这里有卖豆浆、烧饼、油条的，晚上有卖馄饨兼卖烧饼夹酱猪肉的。一天深夜，大约 11 点多钟，我赶完稿子，走出报社，感到肚子有些饿了，便向馄饨摊走去。

一位中年汉子正忙着招呼顾客，两三张长板凳上已挤坐着好几个人，多半是和我一样辛辛苦苦做完中、夜班的工人和普通干部。正好有一人吃完站起，板凳上有个空位。我走上前正要坐下，低头一看，吃了一惊，在我旁边坐着的顾客不是廖公吗？

他一抬头也看到了我，看到我那吃惊的脸，他不动声色地笑着招呼我：“喂，你也来吃宵夜啦，快来，坐下。”他拍拍板凳，招呼我坐下来。

这时，一碗热气腾腾的馄饨已送到他面前，他有滋有味地吃着，低声对我说：“刚下班，赶稿子了吧？”我点点头，也低声对他说：“您怎么也上这里吃馄饨，不合适吧。”他调皮地眨眨眼睛，仍低声说：“我喜欢街头小吃。到这种地方坐坐，使我回想起青年时代，在东京，在汉堡，我有多少次在街头小吃，更不用说长征时了。爬雪山过草地时，哪里吃得到这样的馄饨？同志们只好精神会餐了。”他说着，又招呼摊主：“馄饨味道不错，请再给我来一碗。”

我的一碗馄饨煮好了，我一面吃馄饨，一面

王金凤小姑娘肖像

姓廖的老头子（廖承志）自画像

听廖公兴致勃勃地和老板聊天，问他一天收入多少，面粉、猪肉多少钱一斤？生活过得如何？老板一边下馄饨，一边笑嘻嘻地回答廖公的提问。我心想，原来廖公在这里做社会调查呢！

又一碗香气扑鼻的馄饨端到廖公面前，他有滋有味地吃着。我低声问：“您一个人来的吗？”廖公又调皮地用嘴向后边一努，低声说“有人跟着我，让他来吃，死活不同意，还批评我一顿。唉，下次小组会上，少不了又要检讨了。”

我回头一看，胡同口站着一位穿军装的小伙子，想必是他的警卫员，一脸不耐烦。我和廖公不多谈了，让他早点吃完，让这位军人早点放心。

廖公吃完了，连我的馄饨一起付了账，又客气地对老板说：“多谢你的好手艺，祝你生意更兴隆，财源通四海。”

廖公走了。不一会，街头响起汽车的马达声。那位老板恍然大悟，对我说：“同志，刚才那位是位首长吧！”我笑着回答：“是一位一心一意为老百姓办事的共产党员。”

参加开国大典的报道

最难忘记的是 1949 年 10 月 1 日的开国大典。中华人民共和国要在这个壮严的典礼上宣布成立，怎不令人激动万分？

开国大典下午 3 点钟开始。我不到中午 12 点，便赶到天安门广场，采访参加游行的群众。2 点钟一过，我赶到天安门，抢占了金水桥东侧一个有利位置，那里向上可以看到天安门城楼上的领导同志，向下可以清楚看清阅兵和游行队伍列队通过天安门的情景。

两点半钟过后，我看到，天安门城楼上陆续出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等中央领导同志和宋庆龄、张澜、李济深、沈钧儒、黄炎培等著名民主人士的身影。天安门广场和东长安街红旗如海，歌声似潮，30 万游行群众集合待命。

三时整，天安门广场响起 28 声礼炮，毛主席以洪亮的声音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成立了。他手按电钮，天安门广场上，新中国第一面国旗——五星红旗在 10 月的晴空中徐徐升起！我目睹着这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湛蓝的天空中迎风飘扬，我心潮澎湃，感奋不已。这是中国人民一百多年前仆后继、流血牺牲、艰难奋斗的成果呀！我相信，有幸参加开国大典的每一个同志都不会忘记这一刻。

朱总司令乘车绕场一周，检阅队伍。

雄壮的军乐声中，盛大的阅兵式开始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骑兵、炮兵、装甲兵的健儿们迈着整齐的步伐，列队走过天安门门前，接受中央领导的检阅。人民空军的飞机编成整齐的队形，飞过天安门上空。人们看到中国人民有了自己的空军，无不欢呼雀跃。帝国主义随意欺凌中国人民的日子终于一去不复返了。

阅兵结束，天色已近黄昏。30 万群众的提灯游行开始了。北京市的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街道居民，手提红灯笼，欢天喜地地欢庆共和国的诞生。暮色中，一队队一行行的红灯笼宛如一条条火龙在天安门前盘旋飞舞，景色十分壮观。人们高喊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在城楼上也高呼：“工人同志万岁，农民同志万岁，学生同志万岁！”领袖和群众互喊“万岁”，这种情感交融的情景真正令人感动！

晚 10 点，游行才结束。开国大典进行了整整 7 个小时，毛主席等领导同志在天安门城楼上几乎也站了六七小时。我作为一名记者，从早到晚采访了十几小时。回到报社，顾不上休息，立即动手写开国大典的特写。

1949 年，是我刚当记者的第一年。这一年我发表了一百多条新闻和三十多篇人物专访、通讯、特写、速写和评论等。工作刚刚起步。可以说，我是名副其实的新中国培养的第一代记者。

（作者系人民日报社高级记者，现已离休）

（责任编辑　林　耀）

从五一口号到群贤毕至的新政协

● 高建中

“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

1948年仲春，华北大地绿叶萌发，生机盎然。

4月30日，河北阜平县城南庄，中共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召开扩大会议。

会前，4月25日，毛泽东提出了这次会议的主要议题，其中之一是邀请各民主党派及群众团体代表来解放区商讨召开人民代表大会并成立临时中央政府。

在会议的筹备阶段，五一国际劳动节就要来到了，几经酝酿，中央提出，以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的形式，向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发出号召。当然，这是一种再简明有力不过的宣传形式。

30日的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在激动人心、喜气洋洋的气氛中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亲自起草的五一口号。其中，特别是对召开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在讨论中，周恩来指出：提出召开新政协的口号，从形式上看是恢复1946年1月政协的名称，但性质和内容都不同了，五一口号是行动口号，不是宣传口号，这是今天形势发展的趋势，全国人民的要求。会议召开的时间大致不会超过明年，待北面打成一片后召开。刘少奇在讨论中指出：目前召开新政协的国际国内形势已经成熟，我们先提政协这个口号，可以起号召作用，要争取90%的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中国共产党在全国人民中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其他任何政党都没有我们这个地位。

毛泽东致电李济深和沈钧儒

5月1日，红色的电波传送了毛泽东致电香港李济深、沈钧儒的一份电报：

在目前形势下，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加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相互合作，并拟订民主政府的施政纲领，业已成为必要，时机亦已成熟。国内广大民主人士业已有了此种要求，想二兄必有同感。但欲实现这一步骤，必须先邀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代表开一个会议。在这个会议上，讨论并决定上述问题。此项会议似宜定名为政治协商会议。一切反美帝反蒋党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均可派代表参加。不属于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反美帝反蒋党的某些社会贤达，亦可被邀参加此项会议。此项会议的决定，必须求得到会各主要民主党派及各人民团体的共同一致，并尽可能求得全体一致。会议的地点，提议在哈尔滨。会议的时间，提议在今年秋季。并提议由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国民主同盟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本月内发表三党联合声明，以为号召。此项联合声明，弟已拟了一个草案，另件奉陈。以上诸点是否适当，敬请二兄详加考虑，予以指教。三党联合声明内容文字是否适当，抑或不限于三党，加入其他民主党派及重要人民团体联署发表，究以何者适宜，统祈赐示。兹托潘汉年同志进谒二兄。二兄有所指示，请交汉年转达，不胜感幸。

在这封电报中，毛泽东明确地阐述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的意义、目的、时间、地点和人员。

5月2日、7日，中共中央就关于邀请各民主党派代表来解放区协商召开新政协问题，分别电示中共上海局及中共华南分局，请他们和真诚反美反蒋的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社会知名人士交换意见。

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

五一口号，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开国动员令。全国各地积极响应中共五一口号的实际情况，有力地证明了刘少奇同志的推断：我们取得50%以上的拥护是没有问题的。这种响应，集中而典型地体现在停留香港和旅居海外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身上。

香港，在内陆地区内战硝烟四起、国共两党进行命运决战的时期，是一块相对安定的地区。从国共谈判破裂、内战爆发之时，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周恩来同志的安排下，多年为和平民主运动而奋斗的民主党派，纷纷转移到了香港。在这里，他们有的调整组织，有的充实力量……继续同中国共产党联合，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建立民主政府而斗争。

为了加强与这些民主党派的联系，中共在香港设立了香港分局，隶属于中共上海局。此时，负责香港分局工作的是乔冠华、方方、潘汉年、连贯等人。

5月2日，中共香港分局向留港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通报了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与会者喜形于色，倍受鼓舞，纷纷表示拥护中国共产党的这一决定。

5月5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李济深、何香凝，中国民主同盟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促进会马叙伦、王绍鏊，致公党陈其尤，中国农工民主党彭泽民，中国人民救国会李章达，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蔡廷锴，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谭平山，无党派人士郭沫若于香港联合致电中共中央毛泽东主席；同时，联合通电国内外各报馆、各团体和全国同胞，公开响应中共中央五一号召。他们在致中共电报中说：

“读贵党五一劳动节口号第五项：‘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适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曷胜钦企。”

同日，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指出：中共中央的五一口号“正切合全国人民目前的要求，也正切合台湾全体人民的愿望”，号召台湾同胞赶快起来响应和拥护中共中央的号召，配合全国人民的革命战争，广泛地展开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反对官僚资本主义，反对台湾分离运动的各种斗争……

各地华侨也纷纷致电拥护中共中央五一号召，拥护召开新政协。从5月4日至5月19日发来电报的就有代表新加坡华侨的陈嘉庚、马来西亚吉灵丹州侨团、泰国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马来亚槟榔屿71个华侨团体、马来亚柔佛州东甲属华侨促进祖国民主联合会以及泰国华侨促进祖国和平民主联合会等。

6月4日，在香港的各界民主人士冯裕芳、柳亚子、茅盾、章乃器、朱蕴山、胡愈之、邓初民、侯外庐、陈其瑗等125人联名发表声明。声明中说：五一号召合乎时代的要求，“新的政协召开之后，中国历史将会翻开灿烂的一页，真正建立一个统一的真正属于人民的国家。”

中国致公党、中国民主同盟、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则分别于6月9日、6月13日、6月25日发表声明，郑重宣告拥护中共发布的五一口号。拥护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除此之外，6月间，何香凝领衔，香港各界妇女232人发表了宣言；7月间，人民救国会发表“七七宣言”，民进理事会通过了《拟提出关于政治协商会议之行动公约及政治纲领》；9月，农工民主党在九龙召开了中央扩大会议，通过了《迎接新中国的斗争任务》的决议。其间，一些民主人士如沈志远、邓初民、马叙伦、郭沫若等还在报上发表文章，编成小册子对比新旧政协的异

同，阐明新政协的性质、任务，从理论上、思想上为新政协催生，扫除思想障碍。

接送香港民主人士北上

8月1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电复响应五一口号的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章伯钧、马叙伦、王绍鏊、陈其尤、彭泽民、李章达、蔡廷锴、谭平山、郭沫若。电文中说：

五月五日电示，因交通阻隔，今始奉悉。诸先生赞同敝党五月一日关于召集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一项主张，并热心促其实现，极为钦佩。现在革命形势日益开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强团结，共同奋斗，以期早日消灭中国反动势力，制止美帝国主义的侵略，建立独立、自由、富强和统一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此目的，实有召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及无党派民主人士的代表们共同协商的必要。关于召集此项会议的时机、地点、何人召集，参加会议者的范围以及会议应讨论的问题等项，希望诸先生及全国各界民主人士共同研讨，并以卓见见示，曷胜感荷。谨电奉复，即祈谅察。

鉴于当时需要参加新政协会议的民主人士代表，大部分都在上海、香港等地，于是，富有敌占区地下工作经验的周恩来，亲自领导了对民主人士的护送工作。经过精心的组织，巧妙的安排，自1948年8月至次年8月，共分20批，成功护送民主人士北上达三百五十多人，其中有李济深、何香凝、沈钧儒、郭沫若、蔡廷锴、蒋光鼐、谭平山、陈叔通、黄炎培、柳亚子、陈嘉庚、司徒美堂、章伯钧、章乃器、马叙伦、茅盾、陈其尤、李章达、朱蕴山、邓初民、马寅初、钱昌照、龙云、黄绍竑、刘王立明、许宝驹、黄琪翔、丘哲、李达、包达三、叶圣陶、陈其瑗、王绍鏊、千家驹、曾昭伦、郑振铎、曹禺、马思聪、王亚南、郭大力、史东山、洪深等。

中共中央指示，每艘北上的船，分局都派有相当负责的中共党员陪送，加强安全保卫措施。北上的船只，除有时遇到风浪等恶劣气候的影响，有时也会遇到国民党军舰的盘查，但由于组织严密，掩护得当，均化险为夷。3月4日晚上，上海重要人物陈叔通、马寅初等27位乘搭的挂葡萄牙国旗的华中轮，在海上曾先后和两艘国民党的军舰相遇，受到盘问，还将华中轮夹在中间，出语威胁，幸得船长佯称是开赴南韩仁川港的，并将船驶近仁川后掉头驶到山东烟台，才脱离险境。

群贤毕至　会聚北平

1949年1月31日，平津战役结束。这天夜里，住在平山县李家庄的中共中央统战部秘书长齐燕铭接到了周恩来的电话，要他同秘书处处长周子健、交际处副处长申伯纯立即到西柏坡接受新的任务。

齐燕铭一行立即出发，赶到西柏坡时已经是2月1日的凌晨了。仍然在灯下工作的周恩来，招呼他们坐定，嘱咐警卫员端来热茶后，开门见山地说：

“叶剑英同志来了电报，告知和平解放北平的协定已于1月20日签定，31日人民解放军已经入城接管，平津战役宣告结束。现在，你们要尽快出发，赶到北平筹备新的政治协商会议，这是首要的任务。其次，就是在华北局和北平军事管制委员会的协助下，接收以下一些地方：一是接管中南海，成立中南海办事处，负责中南海的房屋管理和卫生工作；二是接管香山，将它作为党中央的驻地；三是接管北京饭店、六国饭店等大饭店，为接待各地民主人士作准备。”

2月1日，北平和平解放，李济深、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56人，致电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庆祝人民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2月25日，李济深和沈钧儒、马叙伦、郭沫若等35名民主党派领导人和无党派人士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林伯渠和东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高崇民的陪同下，由沈阳乘专列到达北平。在车站举行欢迎仪式后，民主人士分别前往北京饭店和六国饭店住地。

1949年9月30日，会议选举的中央人民政府主席毛泽东（左三）和副主席刘少奇（左一）、朱德（左二）、宋庆龄（左四）、李济深（左五）、张澜（左六）、高岗（左七）在大会主席台上

3月5日，党的七届二中全会开幕。毛泽东在报告中说明了党的工作重心已由乡村转移到城市，提出了革命取得全国胜利后，党在军事、政治、经济、外交诸方面所应采取的基本方针和政策。

经过几天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全会决议，批准了一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的工作和中央关于召开新的政治协商会议、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批准了毛泽东主席于1月14日提出的以八项条件为基础与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的声明。这次会议为党在革命转变关头夺取全国胜利和建设新中国，在政治上、思想上和理论上作了充分准备。

3月25日上午，毛泽东带领中央机关来到北平。至此，中共中央和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无党派知名人士的代表，汇聚北平，进入了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阶段。

1949年6月15日，新政协筹委会在北平正式成立。

协商建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经过几个月的紧张筹备，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平隆重开幕。毛泽东同志致开幕词，庄严宣告："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从此站立起来了！"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国共产党在大会上发表讲话，郑重表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为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成功及其发展和巩固而进行不懈的努力。""凡是中国共产党参加并一道通过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决议，中国共产党将坚决地执行并为其彻底实现而奋斗。"宋庆龄、何香凝、张澜、黄炎培、张治中、程潜、司徒美堂等在大会上也分别代表各方面发表讲话。

会议选出了63人组成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毛泽东当选为主席，朱德、刘少奇、宋庆龄、李济深、张澜、高岗当选为副主席。

会议还选出了180人组成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并推举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陈叔通为副主席。

会议于9月30日举行闭幕式，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宣言》。朱德副主席致闭幕词，他说："我们既然能够团结一致，开创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我们就一定能够团结一致，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好，把我们的国家引导到繁荣昌盛的境地。"

10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举行第一次会议，正、副主席及委员宣布就职，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同日下午，首都30万人齐集天安门，隆重举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大典。毛主席亲手按动电钮，第一面五星红旗从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向全中国、全世界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一位很值得纪念和研究的人物

——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

● 吴 江

1993年是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张申府先生（1893－1986），哲学史家兼佛教史专家汤用彤先生（1893－1964），以及新儒家事功主义者梁漱溟先生(1893－1988)诞辰一百周年。中国文化书院于当年下半年（梁漱溟先生的诞辰日)召开学术会议，探讨研究他们在中、西、印文化领域所取得的成就。我有幸也被邀与会，并就梁漱溟先生事提供了一个书面发言。今录之于下。

我对上述三位先生的学术、道德、生平都缺乏研究，本来没有发言权。唯独对于梁漱溟先生，我禁不住想写一点文字，不是因为我对梁先生有特别的了解，而是因为我意外地读到汪东林先生发表在广东省政协机关刊物《同舟共进》杂志(1993年第1、2期)上的一篇文章:《述评梁漱溟向党交心的材料》(以下简称《材料》)。汪先生原是全国政协学习委员会的一位青年干部，任梁漱溟所在学习小组的秘书工作长达二十余年，多次专门采访梁漱溟，与梁先生结成了忘年交。汪先生因此留下了一份关于梁漱溟的极为难得的材料。这份材料比较翔实地记录了受中、西、印文化薰陶的梁漱溟在中国共产党当政前后与中共领导人的交往，彼此学识、政见上的异同，特别难得的是记录了梁漱溟在建国后的一个特殊新旧交替环境中（其中又有一个时期政治生活不正常)，在若干年的风风雨雨中，所表现出来的立身处世之道。这里看出梁漱溟确是从传统文化阵营中出来的一位有高度社会责任感的事功主义者。鉴于此，我乐于利用这个材料，夹抄夹叙夹议，就梁漱溟的活动特别是建国后他对若干重大问题的态度，在此作一介绍。

梁漱溟

梁漱溟自认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

梁漱溟是否如人所说是中国新儒家的开山祖师，这个问题可以讨论，但他属于新儒家阵营是无庸置疑的，他甚至被人称为“儒家的最后圣人”。梁幼年不曾接触儒学，而是直接接受西学，

热中于印度哲学与西方哲学，深喜柏格森，信服西方政制，也读过一些马列著作，但不信奉马列学说。1917 年 24 岁时，他应蔡元培之邀到北京大学教授印度哲学。梁沉缅于佛学，并从比较角度评价中、印、西三大系统文化。因对民国以后政治上种种腐败现象不满，梁曾几度准备出家而未如愿。但他决不是一个出世主义者，他和那些纯学术活动的新儒家不同，他自幼以经世救国、建立功业自任，颇有"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神，因此没有几年就由佛归儒（但梁个人生活中始终未放弃佛家思想）。特别当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他像严复走过的道路一样，因看到西方文明的非人性和粗野自乱而毅然舍弃西化思想而倾心于中国固有文化，认为世界未来是中国文化之复兴。梁漱溟于此成为地地道道的"中国文化本位论"者。他期望中国文化"老树上发新芽"，同时期望中国政治之改良。梁漱溟自认他非"学问中人"，乃"问题中人"。梁漱溟 1922 年出版的被认为新儒学开山之作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大胆地倡言自己对儒学前途及命运的看法。

一九八七年，梁漱溟在北京与回国访问的著名教育家晏阳初（右）会面

梁漱溟从一入世就进行多方面的活动，其活动的倾向性的互异令人吃惊。早年同李大钊、陈独秀、张申府（当时亦为共产主义信奉者）等人有交往，李大钊遇害，梁曾尽力营救并为之操办后事。梁始终认为共产党内的精英分子都是一些为国为民不图私利的"汉子"。但是在"五四"运动中又首先站出来反对"打倒孔家店"，标榜"新孔学"。20 年代胡适提出了所谓"中国五大仇敌"论，即认为中国之所以极弱，是由于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五因，而独不提列强的侵略和军阀的黑暗统治。梁漱溟对此很不以为然，当时致书胡适，率直地指出胡适否认列强实为症结所在，亦不以军阀为仇敌，所谓"一步一步作自觉的改革"，便只能是"没有具体内容"的"空发梦想"。这正是作为具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梁漱溟的一个最大的特色。他这样做，纯为改良中国社会的功利观念所驱使。梁一生追逐于事功，这使他在观念上亦常有出奇制胜之举，而不失之于迂。就连被看作是梁的文化之根的所谓"意欲"说，也是功利主义的，纯是为了满足"生"之需要（"天地之大德曰生"），即以其所欲治天下，为贫穷落后的中国谋富强之道。为此，他独创自己的"内圣外王"之道，企图以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文化为本位，从乡村建设、实现乡村自治入手，重造中国社会。梁认识到在中国无权、无势、无兵，办不成大事，知识分子必须附于一种权势力量，才有可能施展自己的抱负。1928 年，他先投奔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的陈铭枢，陈铭枢曾研究佛学，是欧阳竟无的弟子，梁和熊十力都尊重欧阳竞无。梁欲借重陈铭枢的权势实现他的政治理想——乡村自治。无结果。后又依附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开展乡村建设活动。梁的乡村建设的支柱是地主武装。他在韩复榘支持下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训练了一千五百余人，派他们到山东乡村去办"乡农学校"，还帮韩复榘训练了大批壮丁。梁还准备改革地方行政，派他训练出来的一些重要人

物去当专员、当县长。这一时期,是梁漱溟实行他的政治思想的一个高潮。抗日战争发生,韩复榘因擅自从山东撤退而遭军法制裁。梁漱溟的基地丧失,不能不另图实现其政治理想之途径。

梁漱溟在任何逆境中都怡然自适,其自信自负简直可以说达到狂妄程度。1942 年,梁自日本统治下的香港脱险后,曾给他的两个儿子梁培宽、梁培恕写了一封长信,信中说:“前人云:‘为往圣继绝学,为来世开太平’,此正是我一生的使命。《人心与人生》这三本书要写成,我乃可以死得,现在则不能死。又今后的中国大局以至建国工作,亦正需要我。我不能死,我若死,天地将为之变色,历史将为之改辙,那是不可想象的。乃不会有的事”。偷渡离港时,同行者都面有惧色,独梁怡然自若,若无其事。因他相信“安危”自有天命,从天命上说,他是无人可以代替的。

此后,梁漱溟仍我行我素,高度自信自负,始终没有放弃他的主张。抗日时期在四川北碚成立勉仁学院,聚徒讲学。此时梁漱溟已以“乡村建设”派代表人物和国民参政员名义,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参与创建“民主政团同盟”组织(后来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成为其负责人之一。当时栖息勉仁学院的梁的挚友、也有新儒家宗师之称的熊十力,认为“梁漱溟本非事功才”,劝他“以讲学为主”,并“拟请政府准予资助勉院,使其培养学子”(见熊十力《论六经》之末章)。但梁不听,反而更积极地投入了党派活动,因此愈来愈成为“问题中人”。

关于梁漱溟在新中国前的为学为人已有许多文章作了介绍。这里,我只是想根据汪东林先生提供的《材料》来看一看梁漱溟在抗日期间同中共领导人的接触,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思想转变和遭遇,从这里窥知他的为学为人立身处世的一部分。

两次赴延安,与毛泽东求同存异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梁漱溟为了了解并比较国共两党的主张,曾两上延安,一次是 1938 年初,一次是 1945 年。《材料》记述梁的自述:“我根据自己对中国思想文化和中国现实生活的研究,并不信奉共产主义学说,尤其是对中国社会,仅持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学说能解决中国各种问题的理论,我一直不敢苟同。我读过毛泽东的一些著作文章,知道他的主张,敬佩他的献身奋斗精神,但过去并无机会同他探讨如何改造中国社会这个大问题。自日本侵略中国后,中共提出一系列的抗日主张,特别是国共合作,一致抗日,深得人心。而今国民党方面令我失望了,共产党方面又怎样呢?百闻不如一见。因为上述两方面的原因,我产生了赴延安见毛泽东会谈的念头。”

梁漱溟第一次赴延安与毛泽东会见,主要是讨论时局问题。梁漱溟提出当前局势使他失望与悲观,中国的前途究竟如何?中华民族会亡吗?共产党有没有救国的良方?据说毛泽东兴趣颇高而又十分耐心,向他讲了一篇“中国必胜,日本必败”的理由,那就是后来不久发表的毛泽东《论持久战》一书的主要论点。梁漱溟说,这是一次“求同”有效的谈话:“仅就抗日战争而论,像毛泽东《论持久战》这样的大作品,大文章,蒋介石没有,旁人也没有,我看这是事实。”

第二次(1945 年)赴延安,被梁称为“与毛泽东争论通宵”,那就是谈双方的“异”了,即谈双方的严重分歧。《材料》记录了梁漱溟口述的关于那次长谈的回忆,因为内容重要,谈得又比较生动,我就直接将全文抄录在下面。

梁漱溟说:“毛泽东约我的第二次长谈,是从下午六点开始,不止是谈到次日凌晨,而是谈到天明,整整一个通宵,欲罢而不能。这次谈话的内容是如何改造这个旧中国和如何建设一个新中国的问题,我和毛泽东分歧较大。头一天我把自己新出版的数十万字的著作《乡村建设理论》送给他,请他指教。隔天约我谈话,毛对我说,他已翻看了这本书,并写了一条条批语,拿给我看。毛泽东坦率地对我说,你的著作对中国社会历史的分析有独到的见解,但总的看你的主张是走改良主义的路,不是革命的路。改良主义是解决不了中国问题的,中国的社会需要一

场彻底的革命。他十分明确地指出，现阶段的中国革命重担已落到了中国共产党的身上，当然还有统一战线的扩大，武装斗争的加强，即所谓发挥中国革命三大法宝的作用吧，他都分析了。其中从理论上说，阶级和阶级斗争问题是一个核心问题，毛泽东特别强调它的作用。我们对此发生了一场争论。

“我说中国社会与外国社会不同。在历史上，外国（主要指西方）的中古社会，贵族与贫民阶级对立鲜明，贵族兼地主，农民即农奴，贫富对立，贵贱悬殊。但中国的中古社会不是这样，其贫富贵贱上下流转是相通的。中国有句老话：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中国中古社会的贫富贵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因此阶级分化和对立也就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这种状况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了几千年。在现代中国，最大多数的仍是贫富有差别但并不悬殊的农民、工人少，资本家更少，真正的大地主也很少，它的阶级分化、对立不鲜明、不强烈、不固定的状况依然存在，这是中国社会的特殊性。我据此分析，又提出了‘伦理本位、职业分途’八个大字。所谓伦理本位是与西方人的个人本位针锋相对的。西方人讲自由、平等、权利，动不动就是有我的自由，把个人的权利放在第一位，借此分庭对抗。但中国人不是这样，历来注重义务，而不是权利。父慈子孝，父亲的义务或责任是慈，儿子的义务责任是孝，还有兄友弟恭，夫妻相敬，亲朋相善，等等，都是伦理本位的内容，都是中国家庭和社会的重要原则，即无论是谁，居何种地位，都注重尽义务，认识自己的义务是什么，本着自己的义务去尽自己的责任，为家庭，也为社会，而把自己的权利放在次要的地位，放在尽义务、尽责任之中。所谓职业分途，也就是社会分工。每个人作为社会一员，干哪件工作，就有责任（义务）把它做好。人人负责，做好本行，则社会就能和谐、稳定、发展。要实现上述目标，现阶段中国最需要的是开展艰巨而持久的民众教育工作，特别是从乡村建设和农民教育做起，因为乡村是中国最广大的领域，农民是中国的最大多数。全国有识之士，都应积极支持我从事这项工作，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而不是去费力从事其他。

“我讲了许多，毛泽东都耐心地听着，中间偶尔插几句话。我讲得差不多了，毛泽东才接过话头说，中国社会有其特殊性，有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与西方的历史文化背景很不相同，这些分析并没有错，但中国社会无论是中古还是现代，都同西方社会有着共同的一面，而这个共同性即共性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面。这个共性指什么？就是自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来，就存在着阶级的对立和阶级斗争，这个阶级斗争是推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动力。最后，他指我太着重了中国社会的特殊性的一面，而忽略了最基本、最重要的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我则指他是太着重了共同性即一般性的一面，而忽略了中国社会最基本、最重要的特殊性的一面。两人争论相持不下，谁也未能说服谁，直至天明。使我终生难忘的是当时毛泽东那种政治家、学问家的风貌和气度，他披着一件皮袍子，有时踱步，有时坐下，有时往床上一躺，十分轻松自如，从容不迫。他不动气，不强辩，谈吐幽默，常有出人意外的妙语。”

这次谈话把双方在解放前的分歧症结摆得十分清楚了。中共对梁漱溟采取“求同存异”态度，引为朋友。解放前夕，中共在北京召开创建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各路朋友各党派民主人士到会，在此会上正式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唯独梁漱溟未到会。从 1949 年 4 月至 12 月梁漱溟留在四川静观全国解放。据说，在此稍前梁漱溟在重庆实业大厦作了一次讲演，还讲“他要修改共产党”。另据一材料说，此时梁漱溟还对他的一个外甥谈了下面这样的话：“……既有‘四顾无人’之概，不免有‘舍我其谁’之感。像这样数千年悠久历史之下，像这样数万万广大人群之中，而‘认识老中国，建设新中国’这句话，只有我一个人最亲切……是事实如此，不是我自负。”1950 年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邀请梁漱溟来京共商国是，梁来后被安排在原皇家园林颐和园居住，待为上宾。

《材料》指出：梁漱溟终于来京，说明他毕竟

怀抱着一颗爱国爱民族之心，同时他仍要看一看。总之，梁漱溟是带着惶惑和疑虑由旧中国走进新中国的。他来北京后有整整两年抱沉默的态度。而毛泽东则多次把梁请到中南海长谈，又安排梁于1950年4月至9月带秘书随从赴华东、华北等地考察；1951年5月至8月，梁又到四川省合川县云门乡参加土改运动。这次梁漱溟亲眼看到了贫苦农民的愿望和要求，看到了中共领导的农民活动中的农民与他自己30年代搞乡村运动时的农民，情况迥然不同，从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了，农民真正有了自己的人格。这对梁漱溟思想上的冲击是非常之大的。1951年10月间，梁漱溟终于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两年来我有哪些转变?》的长文。这篇文章所谈的"转变"，在过去熟识梁漱溟的人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这里，抄录文章的两段：

文章开头说："说到思想转变这句话，在我谈何容易！更简捷地说，我过去虽对于共产党的朋友有好感，乃至在政治上行动有配合；但在思想见解上却一直有很大距离。直到1949年全国解放前夕，我还是自信我的对。等到最近亲眼看到共产党在建国上种种成功，夙昔我的见解多已站不住，乃始生极大惭愧心，检讨自己错误所在，而后恍悟中共之所以对。现在那个距离确实大大缩短了，且尚在缩短中。"

文章是这样总结的："所谓三年来（自1949年始）给我的教训最大者，即是若干年来我坚决不相信的事情，竟然出现在我眼前。这不是旁的事情，就是一个全国统一稳定的政权竟从阶级斗争中建立，而屹立在世界的东方。我曾经估计它一定要陷于乱斗混战而没有结果的，居然有了结果，而且结果显赫，分明不虚。我何以估计错了呢？对于国际的国内的种种形势漫不加察，没算在内；我认为分不成两面的，归根到底还是分为两面了。其次，我对于马列主义不通，误以为斗争只是斗争，不料想毛主席却有又联合又斗争的统一战线那一套运用。于是就不但分为两面，始终斗而不乱；更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当全国解放之初，我还对于国家前途的统一稳定有些信不及。但一到川东参加土改，在下面看了看，才知道原来高高在上的北京新政府竟是在边远角落的农民身上牢牢建筑起来的，每一个农民都是新政权的一块基石。若问似这般鬼斧神工从何而致?还不是说破嘴皮的四个大字：阶级斗争。结束一句话：既然客观形势上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卷入世界漩涡，而终必出于阶级斗争之一途，那么，阶级斗争便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真理。眼前的事实即其证验。"

对于梁漱溟，无论对他赞成不赞成甚或抱有成见，大概没有一个人会认为这是梁漱溟为迎合共产党而故作违心之论，或是被迫放弃自己坚持数十年的理论。梁的思想转变可能与他的西学底子和过去曾接触过马列学说有关，当然主要还是反映了梁漱溟的现实的事功主义立场，他是根据自己亲眼看到的事实说话的。在事实面前服人之说，而自弃其旧说，亦是梁先生的过人处。而当时中共之所以获得成功，所谓"始终斗而不乱"，"并且不断扩大了自己的一面而终于制胜强敌"，则是由于中共在开国初期处事谨慎，其所进行的斗争一般根据"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控制在正常的范围内，不像1957年以后那样失去控制直至发生像"反右"、"文革"那样的狂乱事件（这是一个郑重的党所必须认真检查总结的一项重大的历史教训）。

处事论人，梁漱溟无愧是梁漱溟

正因为梁漱溟如此坦承了自己的根本性的重大"转变"，公开否定了自己坚持数十年的一套理论，这就尤显出1953年毛泽东怒斥梁漱溟并为此展开一场批判，不仅不合情理，而且输了道义。根据《材料》作者在历次学习小组会（或"交心会"）上对梁漱溟的多年观察，认定：梁漱溟仍恪守"讲真话"的主张。当时谈到"交心"好像一般认为是要"交黑心"，梁漱溟则申明不敢苟同这种说法，他没有提到神圣的"红心"，也不承认自己有什么"黑心"，他还独创一家之言，认为也没有什么"白心"。梁漱溟没有"随风倒"乱批评过人，更没有冤屈过一个人。1953年那场

批判，他自己当然没有料到。起初他是在怀仁堂周恩来总理主持的政协扩大会上说他对当前农村问题的看法，说农民生活还是苦，当场引起大家的反对，但周总理很谦虚，说有看法还是说出来的好。后来在中央人民政府会议上梁漱溟当着毛泽东主席的面又重复谈他的看法，不意引来了毛泽东的恶语相向，梁漱溟又当面顶撞，还问："共产党究竟有没有听意见的雅量?"这就引来了一场批判大波澜，而梁漱溟在被批判中却表现得出奇的冷静。

据《材料》记载，1958 年一次整风会上，梁漱溟曾谈到这件事，他说："那时我曾请求领导上派人帮助我检查思想，亦就是要求和马列主义水平高的人深切细致地交谈，给我指点出错在何处。然而领导总没派人应我之求。我亦曾请求当众检讨，亦始终没有让我作检讨。直到 1955 年，还有一个批判我的思想的运动，京内外报纸期刊批判我的思想的文章真不计其数，此外，还有科学院由郭沫若、潘梓年两位主持开会批判，学术界到会者有八十人左右。所有这许多批判，给我启发不大，益处不多。但领导上发动这一批判运动我是拥护的，拥护是从政治立场上拥护，而思想转变则不那么容易。比如在哲学上我是深喜柏格森的，现在要我否认他的道理，作不到。潘梓年亦曾相信过柏格森，他曾翻译过柏氏《时间与自由意志》一书，并写有一篇译者序言，对柏氏治学方法深致推崇，我曾向潘先生请教：你是怎样从柏格森哲学里跳脱出来的，希望指点给我，他却笑而不答。像这样，我只能积下许多疑问了。"

尤其是 1957 年那场轰轰烈烈的反"右派"运动，梁漱溟的表现更是非同寻常，在那种情况下，虽经多方动员，梁漱溟竟是出奇的沉默不语。感谢《材料》作者为我们提供了(并且可以说是相当客观地分析了）梁漱溟当时对运动的惊人的客观冷静态度以及他对几位"右派"朋友的与众不同的坦率陈言，使我们活生生地看到梁漱溟之所以为梁漱溟。《材料》对这件事费了较多的笔墨，为历史，为了解梁漱溟其人，我觉得有全部抄录其文的价值。作者写道：

"梁漱溟先生这样有案在身的人，何以 1957 年没有成为'右派分子'? 这是不少人颇觉诧异的问题。1953 年那个与毛泽东当众顶撞的大案，当时虽没有公之于众，但传播的面相当广。从 1953 年到 1957 年这 4 年间，除了李济深、张澜这样地位高且与梁漱溟交谊颇深的人曾给毛泽东写信说情（当然无下文)，再没有人敢为梁说话，但不少相熟或不相熟的人，只要略知事情始末的，都知道梁心里有不少委屈。因此，到 1957 年那个不平常的春天'鸣放'一开始，就有《新建设》杂志、《光明日报》、上海《文汇报》等先后派出记者采访梁漱溟，要他发表意见，甚至要他'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但梁漱溟先生出奇地冷静，一概默然待之。也有人请他到座谈会上说说话，谈谈对'百花齐花''百家争鸣'的理解，以响应领导上号召，梁依然未加接受。有人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梁漱溟在 1953 年闯了大祸，吓破胆了，不敢说话了。此话传到梁的耳朵里，他摇摇头，一笑置之。如何解释这个现象，特别是梁漱溟先生何以这样沉得住气，在沉默中平安度过'轰轰烈烈'的反右派斗争呢? 这个问题发生在梁漱溟身上，的确不是'敢不敢'、'怕不怕'这样简单的事情，其深刻的思想渊源和文化背景，是不可与平常人同日而语的。

"第一，梁漱溟自少年始，就梦寐以求中国强大起来，但在旧中国生活半个多世纪，这一强国梦始终没有做成，这个愿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才有了变成现实的可能。梁漱溟是抱着怀疑、旁观的态度进入新中国的，他受到共产党的礼遇，但 1953 年 9 月又受到大的打击。在 1954 年至 1956 年 3 年时间内，他一方面是闭门思过，认真读书，一方面则对国家面貌的发展变化，局面的稳定统一，新事物的不断涌现，甚感欣慰。梁漱溟正视现实，深感共产党、毛泽东领导得法。正因为此，相比之下，他对自己个人的委屈便渐渐淡漠，心情则爽亮开朗起来。其间尤其对 1956 年 9 月的中共八大宣告'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今后的主要任务是'把我

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亦即是集中全力搞经济建设，特别赞赏，梁漱溟惊呼：‘这个结论实在太妙，好得不能再好！’‘所有人团结起来，向大自然开战，中国有望了！’梁漱溟盼着中共八大后迅速掀起一个经济建设高潮，也没有想到1957年开始，接踵而来的是帮助共产党整风，大鸣大放，搞得十分热闹。梁漱溟冷静地注意到绝大部分的‘鸣放’意见都是批评领导党的作风和政府弊病的，还包括要民主、要自由等等，而直接关系到如何发展经济建设的意见建议则很少。梁漱溟认为领导党刚刚召开了十分成功的第八次代表大会，正确的思想和行动纲领都有了，因此各方有识之士应该下力气的不是批评领导党而是多为经济建设出主意、想方法，使领导党把建国的大任务更好地担当起来。因此梁漱溟一开始便决意采取冷静旁观的态度，后来‘鸣放’的言论越来越加激烈，梁漱溟更决定一言不发了。

“第二，在后来成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上层人士中，有两位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前期，梁漱溟曾经与他们共过事，接触较多，自然对他们的人品比较了解。尽管当初是为了共同抗日，后来反对内战，目标是一致的，但梁漱溟在当时即感觉到这两位‘头面人物’政客味较浓，特别是其中的一位更甚，有着明显的从政谋私的气味，而对此，梁历来是不屑一顾的。海内外学术界都认为，梁漱溟是中国当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事实上从他青年时代的成名著作《东西文化及其哲学》到他90高龄才完稿出版的《人心与人生》70年的治学经历看，他是当之无愧的。但颇有意味的是，作为梁漱溟个人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却有着浓厚的佛家思想。这不仅表现在年轻时曾几度决心出家而未如愿，而后从19岁茹素一直坚持到95岁病逝，达76年之久，在生活上淡泊如水，以至在病逝前一年的一次佛教文化研究的聚会上，他对赵朴初居士说，纵观我的一生，从始而终我都是一名虔诚的佛教徒；而且这一点明显地反映在他个人在看待名位利禄上，也如同衣食居行一样淡泊而无所欲求，表现在一生从事政治社会活动上，则是多做事而不求高位，做好事而不谋己利。正因为这样，他常为坚持己见而不顾一切做出常人所不可理喻的‘傻事’。梁漱溟知道那两位后来被划为‘右派’的老朋友在旧中国就曾谋求高官厚禄，新中国成立后，他们已官居中央部长，却仍然不满足。梁漱溟心里不以为然，也就决心不凑这个热闹了。当然，梁漱溟也并非预料到紧接着会有个反右派斗争的政治运动，他也想不到自己的那两位老朋友竟会变成反党‘联盟’的头面人物。

“在30年后的80年代中叶，在这两位头面人物先后病逝20年之后，有关方面为其中的一位召开90诞辰的座谈会，其真实的含意是为这位保留‘右派’帽子的头面人物肯定历史上的功绩，以全面公正地评价其一生。几乎所有到会的发言者，都从不同的侧面回述这位头面人物在不同历史时期为国家为民族所作的贡献，而没有人指出他的毛病，更无人提及1957年被判为‘右派’头面人物的事情。梁漱溟是最后几位要求临时发言者之一。他以92岁的高龄，吐字清晰，没有稿子，不到10分钟的发言吸引着全体与会者。他一开头就说，大家都在缅怀他，先头的好几位都谈及他的贡献，他的优点，听下来大体都是事实。但我以为，作为老朋友，也不妨缅怀时提及他的一些短处。人无完人，他也不例外。在我数十年的交往接触中，甚至觉得他的短处、弱点也是十分明显的，而且一直改进不大。我说的是他常常过多地想到个人的得失，有时甚至扩大到难以驾驭的地步。比如1957年他当了右派，他是不是真的够右派，这暂且不说，说的是他在1957年的举动，正是他个人弱点的一次暴露，他吃了这个亏。如果不是他身上的利欲所致，怕不至于这样忘乎所以吧。1957年反右派开始后，许多人都在说他个人一无是处的时候，我心里却念及他也为国家民族做过不少好事，因此我一句话也没有说。在今天大家都念及他一生所做的种种好事时，我却觉得应该提一提他的短处，他的弱点，他的不足。我以为这才是完整的他，也可从此完整地看到每一个人的自我。我的话可能与各位不合拍，但坦然陈言于

故人,为老友,也为自己,当不会有错。我的话也就讲到这里了。”

这里见出梁漱溟评事论人的特点。这种特点仍表现出梁漱溟身上的独立自居的功力和他的重淡泊、轻世俗的人生观。有人说梁漱溟的思想是“逆现代化大潮而行”,其一部分原因,我想是因为没有看全作为现代事功主义者的梁漱溟的一生,尤其是没有注意到他对中共八大会议的评价及由此触发的对于中国现代化所抱的憧憬。

说到论人,“文革”以后,论人恐怕莫过于评论毛泽东了。对毛泽东的看法成了一个集中点。梁漱溟有幸看到毛泽东走完其一生路程,辽远广阔而最后仍未消解物我的界限。1953 年风波后,梁漱溟与毛泽东中断了联系,但毛泽东并没有把梁漱溟这个老朋友忘却,1975 年即毛泽东逝世前一年,毛泽东还在讲到“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的那段批语中专门提到梁漱溟,含保护梁漱溟之意。毛泽东谢世之后,特别在批判“四人帮”、总结“文革”的历史教训之后,梁漱溟又是怎样看待毛泽东的呢?《材料》的作者对这个众所关心的问题(因为从这里可看出梁漱溟的为人)也有段重要的记载。作者写道:

“经过 1953 年的那场风波,直至 1976 年毛泽东病故之后,梁漱溟在公开或私下场合,都认为毛泽东是本世纪中国仅有的少数几个伟大人物之一,他始终不接受任何说他反对毛泽东的指责,他只承认有误会或政见不合。在梁漱溟的晚年,许多来访者几乎都提这个问题,要他谈谈如何认识和评价毛泽东。对此,梁漱溟除了一般的交谈,即‘一分为二’地看待毛泽东,还提出过一个独特而有趣的说法和见解。梁漱溟说,毛泽东不是一个,有许多个毛泽东。他说,纵观毛泽东 83 年走过的道路,有为创党建国立下丰功伟绩的毛泽东,有为新中国创业引得全世界注目的‘指点江山,意气风发’的毛泽东,又有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地热衷于搞人斗人的‘运动’而导致 10 年‘文革’祸国伤民的毛泽东;若从个人的天赋素质观之,则有作为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的毛泽东,有作为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的毛泽东,又有精通马列主义学说的毛泽东,熟读中国经书和运用中国历代治国之道的毛泽东……。梁漱溟常常谈笑风生而又颇为严肃地发表诸如此类的议论,指出任何一个人都是变化的,发展的,不可能固定不变,至于变好变坏,什么时候好,什么时候坏,则取决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因此,他认为没有固定不变的同一个毛泽东。梁漱溟多次说过,毛泽东是个伟人,他以自己的丰功伟绩建立起本世纪中国共产党谁也望尘莫及的地位,因此他功劳大,过失也大。这正是毛泽东的崇高地位决定的。”

这种评论历史伟人的方式,也是中国人古已有之的方法,即综观和纵论的方法,见局部而不失全体,富有历史感,较少情绪化,却往往包含着不少模糊点留待人们用自己观点去分析。例如,人的变好变坏的主客观条件究竟是什么,一个现代伟人或领袖(不是古代的帝王)达到“别人不可限制,自己不加限制,随心所欲”的地步,究竟是什么原因使然?何以致之,孰令致之?这些在梁漱溟等人除了概而论之以外,大概是说不大明白的。这不能苛求于他们。在我看来,梁漱溟对于毛泽东的评论,在格调上已经胜过某些自负的专业史家了。

现在再回头说几句。梁漱溟这位现代新儒学的奠基者,这位颇有中国士大夫特色并且深有时代感的事功主义者,这位在“文革”后像经过秦火的伏胜、张苍一样复出著书立说的新儒家人物,虽然后来新的时代条件造成他的思想转变,而且建国后的特殊环境塑造了他的某些特殊心态表现,但是,他的执着于事功的立场不变,他的独立人格不变(梁在逆境中仍有一种徜徉自适、与物冥合的心境,大概与他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立身天地的人有关),他的“讲真话”的一贯主张不变(例如,他最后讲的一句真话是:“儒学开不出新天地来”),连他的佛学修养底蕴也不变。梁漱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有益于中国文化的人,也是有益于探索中国社会的人。这样的人是值得后人纪念、研究的。

(责任编辑:舒元璋)

陈赓大将在援越抗法中

● 张广华

许多人都知道陈赓大将在中国革命战争中的显赫功绩。然而，他曾为越南抗法战争做出过重大贡献的一段经历却鲜为人知。

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赴越南

1950 年初，越南共产党中央主席胡志明秘密访问北京，寻求对越抗法战争的支持。当时毛泽东、周恩来正在莫斯科访问，随赴莫斯科，与毛泽东、斯大林共商有关越南抗法斗争的重大问题。斯大林说，中国与越南国情相近，领土相接，援助越南革命斗争的任务，宜主要由中国负责。

当时，新生的中国战争伤痕累累，经济困难重重，但中国政府为了支援越南兄弟党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和打破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的包围，毅然决定接受胡志明的请求。

中越双方协商后认为，为使中国援越工作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在中越边界组织一次战役，以打开两国的交通运输线，开创抗法斗争的有利局面。

为此，中共中央一边积极筹建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一边电告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云南军区司令员陈赓，就近先去越南，帮助组织和指挥边界战役。

中共中央决定，陈赓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赴越后，6 月 18 日对陈赓赴越任务做出明确指示："除与越南方面商谈和解决若干具体问题外，主要任务应根据越南各方面的情况，拟定一个大体切实可行的军事计划，以便根据这个计划，给予各种援助……"不久，中央又明确要求陈赓"在越南应帮助他们打几个仗，打开一个相当的局面"。

1950 年 7 月 7 日，陈赓率领一个由军事、政治、后勤干部组成的工作组离开昆明前往越南。时值盛夏酷暑，炎热难捱，有时大雨滂沱，每日跋涉在山地和水网稻田里，这使腿部受过重伤的陈赓倍感艰难和吃力。他在日记中写道："冒雨季赴越，……晨起，雨乃倾盆""天气炎热，山高路小，泥滑难行，有马不能骑。下山至清水河，已精疲力竭。""过桥，越共派专员设亭接待，备有各种饮料及水果。饥渴至此，狼吞虎咽，""稍事休息，即令代表团同志开展调查活动。一夜大雨，牙痛甚剧。"

在那艰苦的二十个昼夜里，陈赓拖着伤残的双腿，忍着阵阵剧烈牙痛，一路上仍谈笑自若。他一边步行，一边认真调查研究，掌握第一手有关作战情况，仔细思考着越军今后的作战问题。

7 月 20 日，陈赓电告中共中央和已在越南的罗贵波（中国政治顾问团团长，中国首任驻越大使）："据我沿途了解，法军在越南尚有进攻能力，谅山老街等地之敌，还控制有相当机动兵力，以现实论，越军尚未取得完全主动；越军主

力一部，经滇桂整训装备后，情绪甚高，但营以上干部多是新知识分子，实战指挥能力较少；目前越北作战方针应争取于野战中歼灭敌之机动部队，首先拔除一些孤立较小的据点，取得胜利，积累经验，提高与巩固部队情绪，争取完全主动，逐步转人大规模作战；越方已决定先打高平，建议围攻高平之部队，先攻夺外围孤立据点，取得经验，若高平敌出援，争取于野外歼其一部，造成攻占高平之有利条件，再夺高平，……"

陈赓的意见得到了中共中央军委的赞同。中央军委于7月26日复电陈赓："我们认为你的意见是正确的，越军应先打小仗，逐步锻炼到能打稍大一点的仗，然后才可能打较大的仗。目前不要直打高平，先打小据点，并争取围城打援是适当的。"

丛林中与胡志明相见

胡志明和陈赓早在中国大革命时期就在广州相识了。1950年1月陈赓曾以主人的身份在南宁款待胡志明。相隔半年之后，他们又在越南北部的原始森林中相逢，两人激动得紧紧拥抱在一起，高兴地说："我们又相见了！"

到达越共中央住地的当晚，陈赓与胡志明进行了亲切的会谈。胡志明对陈赓的见解非常赞赏，并要求陈赓尽快赴前方指挥部协助组织指挥这一战役。

7月30日，即陈赓离开越共中央驻地的前一天，胡志明邀请陈赓到竹林深处他住的一间茅草高脚屋里作客。陈赓环视四周，屋内仅有一床一桌一椅，床上铺着一席一毯，桌上摆着一架打字机和几本书，他不由地回身深情地望着自己的老朋友说："胡主席太简朴了，可敬可敬！"胡志明更不禁回忆起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抗战时期在延安的情况。在谈到两位老朋友又在艰苦的战斗生活中会面时，精通汉文汉语的胡志明随口吟道："乱石山中高士卧，茂密林里英雄来"，充分表达了他重见陈赓的兴奋心情。

7月31日，陈赓一行起程奔赴设在广渊的越军前方指挥部。胡志明走出山口为陈赓送行时，见陈赓等人每人手里拿着一把由国内带来的雨伞，便指着陈赓的雨伞说："这个东西不行！"他见陈赓等人面露不解神情，又说："我们越南人在山林中走路，很少有打雨伞的，为了保密和不暴露身份，得给你们换换装。"紧接着，胡志明亲手收走了陈赓等人的雨伞，发给大家每人一顶草帽，并反复叮嘱陈赓一路上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

说服越军干部先打东溪

8月14日，陈赓一行抵达广渊越军前线指挥部，与前两天到达那里的以韦国清为团长的军事顾问团会合了。

陈赓不顾疲劳，抓紧时间与韦国清一起进一步听取了越军总参谋长黄文泰及作战等部门有关敌我双方情况，尤其是东北战场具体情况的介绍。越南战区的全景顿时在陈赓脑海中出现了。

法军在印度支那总兵力约为23万人，其中法国本土部队4万余人，其余为欧、非雇佣兵和越伪军。在越北地区兵力为七万余人，100架飞机(战斗机和运输机各半)。在1950年的春季攻势里，法军攻占了太原、府里和宁平等省，基本控制了红河三角洲产粮区。在与广西接壤的中越边界，法军总兵力约1.1万人，基本处于守势，沿第4号公路重点设防。1950年5月，越军曾向高平、七溪之间的小据点东溪发动攻击，虽

然最终没有攻克，但是着实吓了法军一大跳。此后，法军加强了高平、东溪和七溪等边界据点的守备力量。

越军总兵力约16万人，其中三〇八师等部队共2万余人直接由总部掌握，现全部集中在高平附近。高平地区法军仅2000余人，越军在人数上占有绝对优势。打好边界战役，越军就可取得战略上的主动。

为了具体了解战场情况，陈赓派专人对高平做实地侦察，发现高平守军已增至3个营约1500人兵力，三面是水，一面靠山，易守难攻，是块极难啃的硬骨头，以目前越军的作战技术和心理素质，先攻打高平问题成堆，困难颇大。

陈赓陷入沉思。他一面听取汇报，一面将目光缓缓地在图上移动，经过高平逐步南移，在高平东南45公里的东溪停顿了一会儿，又向南缜密审视着，再经过七溪、那岑，在谅山再次停了下来。

一阵沉默之后，陈赓终于发言了，他提高声音说，“边界作战第一仗从哪里打起非常关键，这个问题必须认真解决，首战必胜嘛！我看，东溪是最合适的地方。攻占了东溪，整个战役的主动权就可以牢牢掌握在我们手中。”

东溪是从中国广西水口关经布局关进入越南公路的交叉点，这个很小的镇子是四面环山的一块盆地之北部的一小片隆起的高地，正好封住了这个方向的中越通道，4号公路呈西北往东南走向穿镇而过，镇的西北面是高平，南面是七溪，攻下东溪则拦腰切断了法军这一线的防御体系。

韦国清等中国军事顾问一致同意陈赓的意见，但是武元甲却有些想不通。陈赓说，现在法军在越南总的说来处境不利，从本土向越南大量增兵也很困难，目前越南人民军正由分散的游击战转到相对集中的正规战，由不大集中的游击队转为相当集中的正规军，由打消耗战转为打攻坚战与歼灭战，要顺利完成这个转变过程，需要做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现在面临的战役是这个转变的开始，必须保证首战胜利，依目前越军实力，一举攻下高平甚为困难，即使全力以赴勉强拿下高平，越军也将损失惨重，很可能得不偿失。如果先攻打敌人守备比较薄弱的东溪，占领了东溪，战役全局就活了，高平的敌人也就容易解决了。

经过反复切磋，陈赓与武元甲终于取得了共识。随即他在8月22日把与中国军事顾问团一起制定的作战计划报告中共中央军委。

此时，胡志明也赶到了广渊，越共中央政治局同意了陈赓提出的作战计划，8月24日，陈赓又接到中共中央军委“同意”的复电，陈赓的作战决心更加坚定了。

8月23至24日，越军前指召开边界战役参战部队团以上干部会议，陈赓应邀出席了会议。武元甲宣布完作战计划后，听取大家意见。

一〇二团团长武安仍主张先打高平。他说：“我们的力量有限，应该集中兵力一举拿下高平。若先打东溪，力量受到消耗，高平不就更打不下吗？不打下高平，又怎能打破法军的边界封锁呢？”八十八团团长泰勇也说：“如果我们趁敌人增援不及，一开始就猛攻高平，获胜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吗？如果先打东溪，高平的敌人就会加强工事，不是增加了攻打高平的难度吗？”

陈赓心情平静地听完他们的意见，承认他们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但是，他耐心地解释说，我们打仗的着眼点是什么呢？从表面上看，法军的封锁是由高平、东溪、七溪、那岑、谅山等几个重要据点来完成的，只要拿下高平，法军的封锁线就垮了。可是，法军的据点又是靠什么发挥作用呢？靠的是驻军。我们中国革命的经验是：集中优势兵力，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是最为重要的，解放战争中我们打仗的着眼点主要在消灭敌人有生力量，就是决战阶段的辽沈、淮海、平津几大战役，也是如此，结果，每一个战役均消灭数万、数十万敌人，全国比较快地就获得解放。乘敌不备之际突然进攻高平，或许战斗初期也会取得某些胜利，但我们能否一拳将敌人打倒呢？如果一拳虽然打中，但没有打倒敌人，它还能与我们战斗，背后又有东溪、七溪、谅山之敌趁势猛扑而来，我们不就几面受敌了吗？可是先攻打东溪就不同了，高平、七溪、谅山之敌成了惊弓之鸟，我们以逸待劳，谁出动增援就打谁，将敌人歼灭在没有工事的野外，那是多好打的战斗啊！陈赓最后笑着说：“改变了行动计划，我们当然要向部队认真说明原因，即使少数人有情绪，只要打了胜仗，什么话都好说，不断打胜仗，代价又小，大家会有什么意见呢？”

陈赓的一席话，引起越南同志的再次深入讨论，最后终于把思想统一到首先攻打东溪的计划上来。

前指会议之后，胡志明紧紧握着陈赓的手说："我想请求你包下东溪战斗的胜利，也包下边界战役的胜利。"陈赓严肃地说："我一定尽力帮助打好这一仗，但打胜仗主要还是依靠越军指战员和人民群众。"

边界战役取得彻底胜利

9月中旬，边界战役准备工作基本完成，陈赓、韦国清与武元甲由广渊移到东溪以东班员地区，就近指挥边界作战第一仗——东溪战斗。

9月16日，东溪进攻作战开始了。开头颇为顺利，很快迫近守敌核心工事。可是战至17日晨，守敌在航空兵掩护下进行反击，前沿进攻部队有的从已占领的阵地上退了下来。陈赓亲自到前指了解情况，与武元甲等研究受挫原因，提出新的作战意见，但由于协同动作差，战至17日夜仍无明显进展。有的部队进攻决心再次发生动摇。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向胡志明、武元甲建议，必须严令部队，不惜任何代价，坚持下去，同时建议调整部署，从四面实施进攻，重点放在南、北两面。部队再次发动攻击后，很快向纵深发展，战至18日8时，终于歼灭了东溪守敌270余人，缴获了大量武器弹药及其他物资。这是越军历史上第一次攻歼两个连守备的敌人之据点。

东溪战斗结束后，胡志明征询陈赓对东溪一仗的看法，连续两天心情紧张，思绪纷繁的陈赓慢慢地回答道："东溪之战是胜了，意义很大，但应当说这并不是一次成功的战斗，人民军死伤500多人，而歼敌不到300人，代价太大了。"

谈到战斗中暴露的人民军的问题时，陈赓坦诚地对胡志明说："从战斗过程研究，战士是勇敢的，关键是有些干部缺少作战经验，指挥能力差，今后需要从有实践经验的老战士和战斗骨干中选拔干部。"胡志明听了频频点头。

第二天，陈赓发起高烧，诊断为急性疟疾，连续一周卧床不起。

这期间，七溪已集结了四个营的敌人。陈赓考虑，按东溪战斗情况看，越军以现有力量攻占七溪是非常困难的，因此他与胡志明、武元甲研究决定，取消原来的进攻七溪的计划，改为在东溪以南设伏，以求歼灭由七溪北上之敌。法军此时在七溪却按兵不动，另集结五个营兵力进攻太原，直接威胁到越南党政军首脑机关的安全。此时越军一些干部主张放弃设伏，回师太原。陈赓见状果断向胡志明、武元甲表示，进犯太原是敌人的诡计，目的是引诱我军由东溪回撤，保证高平之敌南撤时的安全，千万不可上了敌人的当。果然不出陈赓之所料，七溪之敌在9月30日开始北犯，高平之敌也在10月3日弃城南下。这两股由勒巴日和萨克东指挥的法军，企图在东溪会合后逃回七溪、谅山，以免被歼之命运。

由七溪北犯的勒巴日兵团，在越军坚决阻击下，于10月4日转向东溪西南的谷社山区。越军在10月5日的进攻作战中，伤亡较大。连续作战四天的第三〇八师，面临一个是暂停进攻还是坚决打下去的问题。在这关键时刻，陈赓在电话中对武元甲果断地说："这样的仗不打，就无仗可打了。"接着又语重心长地说："在战役的关键时刻，指挥部动摇，会葬送战役的胜利。

陈赓挂上电话，立即提笔给胡志明写了一封短信，希望他鼓励前方指战员，下定决心，坚持到底，先集中力量歼灭勒巴日兵团，然后立即歼灭萨克东兵团，夺取作战的彻底胜利。

胡志明完全同意陈赓的意见，立刻发出号召书，要求部队"务必坚决全歼敌人，争取全胜。"

在越军的坚决打击下，战场的形势急转直下。至10月7日，两股敌人先后被人民军彻底歼灭，勒巴日、萨克东及其参谋人员以及越伪高平省省长均被活捉。

边界战役共歼敌8个营，8000多人，法军在中越边境上的防线全部崩溃，同登、安亭、谅山、安州等地之敌纷纷逃跑，进攻太原之敌也在损失600多人后，狼狈撤出太原，西北老街等地敌人也仓皇逃走，战役的预定目的完全实现。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忠贞不渝的刘达五将军

● 黎 白

一

刘达五，字尊三，原名开达，清光绪六年（1880年）腊月初九日出生于四川省会理县外北乡瓦店子的一个贫农家庭。幼时，协助家庭劳动，仅读了两年私塾。十五岁，到会理城中一家染房当学徒，后为商家当挑夫，来往于昆明、下关、大理、保山等地，对社会穷富贵贱的生活悬殊、少数民族遭迫害而造成的贫穷落后的情况感受极为深刻。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当云南创建新军之际，他在大理应募入伍，在初建的新军第十九镇三十八协七十六标第一营当列兵。入伍后，他勤奋好学，成绩优异，被保送到昆明武备学堂深造。在学习期间，认识了留日归国的革命党人李根源，学业期满后，由李根源介绍并推荐其返大理，任命为第一营第一队排长。

任贺龙部训练处处长时的刘达五

二

1910年（宣统二年），英军侵入云南片马地区，烧杀掠抢，私立界桩，侵占我国领土，清廷谕云南总督李经义处理，李即派讲武堂总办李根源率军赴片马权宜处理。李根源先抵下关，指派刘达五率一个排担任卫队，任刘为卫队长，随至片马与英军交涉。英军军官狂傲无理，李根源已知靠单纯外交交涉很难解决英军侵占领土的问题，势必用兵，但对英军兵力所知极少，即派刘达五潜入缅甸英占地区侦察。刘达五从未去过缅甸，不懂缅语，却义无反顾地接受了指令，在李根源介绍的一名熟悉情况的商人帮助下，深入缅境，在八英、亚鲁本、丹邦阳、密支那等地结交华侨，经过20多天艰苦侦察，终于察清英军在缅北只有一个旅，司令部驻于曼德勒，在密支那只有一个团，驻片马不足千人，而我方驻军在三千以上，料英军不敢大举入侵。他返回营地，向李根源报告了情况，使李下了决心，对英军采取强硬方针，派兵拆毁片马地区英军越境私立的界桩，英军终不敢大军侵犯，最后在会谈中不得不承认片马是中国领土，交涉成功，李根源对刘达五的才干及勇敢又有进一步的认识，返昆明后，即介绍刘达五参加了同盟会，从而，结识了一些革命党人如李烈钧、杨蓁、唐继尧、谢汝翼、顾品珍等人，他们中不少人后来都成为辛亥革命和

护国战争中的风云人物。此时，刘达五又初识蔡锷。他返回大理后，被升任为第一营左队队官。他在中下级军官及士兵中大力发展同盟会员，鼓吹革命，逐渐成为驻大理新军中颇为先进，颇为活跃的人物。

三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了。云南革命党人立即响应。10月27日，腾越起义，30日，昆明起义，11月2日，大理起义。大理的起义组织过程中，以刘达五为代表的同盟会革命党人在中下级军官和士兵中所进行的宣传和组织工作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刘达五出于对孙中山及其学说的崇敬，将开达之名字改为尊三，字达五，取“尊三民主义，达五权宪法”之意。1913年，步兵第四团由大理调驻昆明，刘达五任一营连长，并曾一度担任云南讲武堂教官，可见他刻苦读书，用心武备，已具有相当良好基础了。

四

1915年冬，袁世凯称帝，蔡锷、李烈钧、唐继尧在云南首举护国义旗，宣布云南独立，出兵四川。不久，贵州宣布独立，刘达五被派到贵州后便转入黔军第一团任连长，后被

任贺龙部少将参军时的刘达五

任命为第一师第一团的营长。1917年，北洋政府段祺瑞破坏临时约法，孙中山在广州成立护法政府，号召反对段政权，举行护法之战。黔军入川，猛攻重庆时，刘达五率部为先锋，身受两处刀伤，仍奋勇向前，率营穷追猛打，由重庆直追敌至成都，赶跑了四川总督刘存厚。攻克成都后，刘达五营驻守成都北门外一座大商号内，老板及家眷已逃，库房内存有大量财物，厅室内也摆有价值连城的古字画及古玩。刘达五严禁士兵抢掠，并且面嘱留守的店员设法让老板返家清点。老板朱梦博返回后，见家中财物一无损失，堪称秋毫无犯，深为感动，从此便与刘达五结成莫逆之交。此时，刘达五因战功卓著升为黔军前敌总指挥部上校参军。但因不满黔军在四川的战事已由响应孙中山的号召进行“护法”战争变为军阀混战，又不满黔军内部将领之间的争权夺利，忿而辞官，于1918年末返回云南大理，开了一家磨石铺，以磨石为生，同时，深感自己文化低，对许多事务判断不明，便买了许多书籍，勤奋自学。1920年夏，突然接到结拜兄弟袁祖铭电约，再度赴川。这时，袁祖铭已出任黔军前敌总指挥与北洋系川军结成倒熊克武的联军。熊克武军是忠于孙中山的队伍，刘达五劝诫袁祖铭不能反熊，应遵循孙中山的革命道路。袁祖铭此时已狂妄骄横，虽然对刘达五这位结拜把兄还能宽容，但根本不采纳刘达五的建议。刘达五只好弃官再返大理。不过，这时，他结识了熊克武部下旅长贺龙，彼此性格相近，经历相近，志愿相近，结下了很好的友谊。这个相识，使刘达五奠定了终生走上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道路。

五

1924年春末，刘达五获悉贺龙率部与熊克武等在四川作战失利后退往贵州，他认为贺龙是年轻有为的具有先进求索思想的将领，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当贺龙处于危难之际，自己岂能坐视？即毅然带上长子、幼子和侄儿赶往贵州投奔贺龙，表示义无反顾的决心。他在铜仁地区找到贺龙。当时，贺龙任川军第一师师长，贺龙见刘达五来到，很

为感动，先任命他为师部上校参军。刘达五久经作战，并在云南讲武堂担任过教官，富有治军经验，全力协助贺龙整顿部队，训练官兵，起到很大的作用。1924 年 10 月，刘达五作为贺龙的特使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及所领导的革命政府联系，并且带了贺龙致孙中山的信，表达了希望编入革命军参加北伐的强烈愿望。刘达五见到当年袍泽、现任广州大元帅府参谋总长李烈钧，相谈甚欢。只因孙中山准备亲自赴北京与北洋政府谈判，未能见到。孙中山赴京后于 1925 年 3 月 12 日病逝，刘达五即返回编入革命军的并已率兵进入湘西的贺龙所部。此时，贺龙已被任命为中将师长，刘达五即被任命为少将参军。不久，熊克武令贺龙率部随他去广东，但贺龙认为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各路武装各有异心，不如留在湖南，休养生息，再图北伐。熊克武不采纳贺龙建议，率部赴广东即被扣押，贺龙一个师留在湘西，发表留湘通电，湘督赵恒惕不得已任命贺龙为澧州镇守使，但半年后，即出兵讨伐贺军。贺龙为保持主力又退往贵州铜仁地区。当地部队很苦，但由于贺龙团结当地少数民族，军纪严明，部队反而有所扩大，刘达五发挥了训练部队的经验，使部队处逆境而士气仍盛，并且通过刘达五与黔军总司令袁祖铭的关系，说服袁与广东革命政府联络，投入北伐军行列。

贺龙所部先被广州革命军政府编为第八军第六师，贺为师长。后为加强已编入革命军序列的黔军袁祖铭所部，改命贺龙为国民革命军左翼总指挥袁祖铭所属第九军第一师师长，刘达五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师训练处处长，负责扩大新兵，训练队伍，培养军官，并且与共产党员周逸群（已被贺龙任命为第一师政治部主任）等共同辅佐贺龙从政治和军事训练上，除旧更新，提高部队的素质。1926 年末，刘达五随贺龙率部与北洋军展开激战，并被任命为主力的第一师第一旅第一团团长。

1927 年，贺部改编为独立第十五师，刘达五仍任第一团团长。当时，依中共中央的规定，中共组织不得在高级将领中发展党员，刘达五是少将团长，与中将师长贺龙一样，是不能被发展成为共产党员的。但是，在贺龙、刘达五等人的支持和默许下，周逸群等在师内营以下军官中发展了一批优秀人才为中共党员，而在刘达五的第一团发展的党员尤为众多。刘达五与师内的共产党员相处极好。

1927 年 4 月 18 日，北伐军向河南进军，贺龙所率独立第十五师奉命先行消灭由奉军煽动并支持的红枪会等武装，以保证北伐军运输安全。刘达五率第一团为先锋，以少击多，立下了赫赫战功。接着即向北洋军主力由张学良指挥的奉军展开奇袭和猛攻。刘达五仍率第一团为先锋主力，奇袭猛追，取得了逍遥镇大捷，以贺龙一个师全歼奉军四个旅，俘虏三千余人。北伐军顾问俄国加仑将军兴奋得把自己的望远镜取下来挂到刘达五脖子上，并用中国语高呼“革命万岁”！

在临颍会战中，刘达五率第一团仍为先锋，他亲率部队与敌肉搏，头部负伤，血流满面，不下火线，奋勇杀敌，在贺龙指挥各团配合下，终于取得了胜利。此后一路势如破竹，直捣开封，北洋军大败，溃逃至河北及北京地区。

六

1927 年 6 月，贺龙所部奉命回师武汉，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贺龙任军长，刘达五仍任第一团团长。这时，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号称国民党“左”派领袖的汪精卫也已和蒋介石合流，武汉国民政府开始反共。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掩护一批在武汉的共产党员和左派革命人士到了九江，接受中共中央的领导和指示，率军开抵南昌，即在中共前委书记周恩来领导下发动了著名的南昌暴动。此时，刘达五担任第二十军第一师前敌指挥，率第一团首先攻占敌朱培德第六军司令部，取

得了南昌暴动第一仗的胜利。

南昌起义武装在广东潮汕地区失败前，刘达五率第一团与强敌多次血战，最后只剩下四个人，刘达五肩部负伤，化装潜往汕头，再搭船到香港，于1927年10月转至汉口，多方打听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下落不着，只好住到资本家朱梦博家里。由于刘达五当年在成都曾经保护过朱梦博的家宅和财产的安全，彼此成了莫逆之交。这时，白色恐怖笼罩武汉，敌人每天屠杀革命者，刘达五在朱家疗伤，朱梦博依旧尽全力支持。不久，刘达五知道贺龙已返回家乡桑植创建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第四军，便立即离开武汉，在桑植找到红四军和贺龙。

1928年9月，贺龙率红四军全部兵力一千五百余人在石门县境遭三个师及各地团防地主武装袭击，损失极大，红军只剩下二百余人。刘达五在突围中被敌机枪子弹打中双腿，血流如注。贺龙取出一迭钞票交给刘达五的副官吴志忠，令他设法秘密将刘达五送往武汉治伤。但由于从石门的战场辗转潜入武汉时间不短，伤口已经感染，不能痊愈，双腿残废了，刘达五悲愤欲绝，自己再也不能重返苏区，重执武器，重晤贺龙，再不能与敌人拚杀于疆场了！但是，身残怎能不革命？刘达五冷静下来，下定决心要为革命尽最大努力。有了这样无畏的坚定信念，刘达五通过一些旧日同僚的关系开了一个“西南大旅社”，副官吴志忠也在旅社工作，奉刘达五之命，千方百计寻找党的关系。1930年夏，吴志忠见到贺龙、周逸群领导的红军第二军团的杨育。他原是潮汕失败后，刘达五的第一团仅存的三位志士之一，并与刘、吴一起在1927年冬投奔初创的湘鄂边苏区红军的。此时，杨育奉命由洪湖苏区（湘鄂西苏区）潜来武汉购买军火、药品并按贺龙指示打听刘达五的下落。从此，刘达五即以旅社为掩护，运用各种关系，购买大批军火、药品，多次安全运抵洪湖苏区。以一个双腿不能行动的残疾之身，忘我地投入了革命斗争之中。直到1934年10月，杨育运走一批军火后就再未到武汉，刘达五焦虑万分，后来，从报纸上看到红军“肃反”的消息，又看到贺龙率领为数不多的红军已转往贵州。他已经无法再与组织取得联系了。他认为再留居武汉充当“资本家”已经毫无意义，何况自己名为旅社经理，实际上仍是个没有财产的人呢。于是，他在朱梦博资助下返回云南大理，在大理六牌坊拜春堂老家又开了个磨石铺，支撑着残疾的双腿，重新以磨大理石为生。

七

当时，很多与刘达五相熟的军政要人如何应钦、胡瑛、卢汉都是手握大权的显赫人物，大理的一些富商也曾得到过他的帮助。他返回大理后其中的一些人曾给他以资助，都被他断然拒绝。他宁愿坐在一张特制的木椅上，不论酷暑寒冬，每日磨石，家属常常出入于当铺当卖为生。他却安贫若素，从不低头，从不气馁，从不求人，绝不与国民党党政人物往来。但他却十分关心国家大事，更关心共产党和红军的安危，他特地订了一份《云南日报》，从字里行间分析共产党和红军的状况。当时，边疆大理文化水平低下，私人订阅报纸的极少，刘达五家境贫寒，却偏偏订阅报纸，已成为乡邻传奇的人物。他与当地贫穷下层人们交往不少，经常向他们讲革命道理和革命故事。红军长征路过云南时，反动派大肆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刘达五毫无顾忌地向群众讲解共产党的宗旨，驳斥敌人散布的对共产党的污蔑。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共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时，红军改编为八路军、新四军，刘达五立即致书延安，向贺龙致以悬念之情，并祝胜利，同时，把保存的贺龙、贺锦斋、林空湘、许蕴石等共产党人的照片、南昌起义第一团的照片都公开挂在铺面的墙上，每天晚上都与邻居友人讲解共产党的政治主张，红军时期的战绩，讲解南昌暴动，贺龙的经

历等等。抗战初期，他这种公开宣传尚未引起国民党政权的重视。可是,不到两年,国民党加紧了反共活动，大理市管区司令杨益谦得到密报说刘达五一贯公开为共产党宣传，便将刘达五逮捕关押到司令部,宣称罪状是“聚众谋反”。杨益谦亲自审问，审讯了二十多天，毫无结果。认为一个贫穷的残疾老石匠竟能“聚众谋反”？实是奇谈，社会舆论大哗。杨益谦只好把刘达五释放。刘达五出监之时，无数群众等在司令部门外给刘达五披红挂彩，沿途燃放鞭炮祝贺，拥戴他直到家中。他回家后，态度不变，依然宣传共产党的政策，宣传红军的英勇，揭露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他上无片瓦，下无寸土，以残疾之身，凭着一双手，每天磨石不止，苦度岁月。从来不曾向反动派乞求施舍，更没有向反动派低头，始终保持着贫贱不移，威武不屈，为革命、为理想而无所畏惧的极其可贵的精神。

刘达五终于历尽磨难而盼到了全国解放，他欣喜无限，连续写信向毛主席、朱总司令、刘伯承、贺龙司令员致敬。1950年8月5日,贺龙给刘达五写信嘉勉。驻大理第十四军军长李成芳及大理县长都亲到刘达五家慰问。

刘达五在解放后的生活依然很困难，他没有积蓄，磨成的大理石卖不出去就要断炊，而解放初期对大理石的需要又少。李成芳曾向贺龙反映了刘达五一家的困难状况，贺龙很为关心，致信给大理县长要他给予帮助，杨县长登门拜望，向刘达五询问有什么困难需要解决时，刘达五说：“困难是有的，不过，我可以自己解决。全国刚刚解放，国家困难更多。我非常感谢政府关心，来看看我，我已经十分喜欢了。至于经济上，请照顾那些比我更困难的穷苦人吧！”

1952年，七十二岁的刘达五因脑溢血不治与世长辞了。

刘达五坚贞不屈的精神永远留在人们心中。

（责任编辑 徐 孔）

花上只够买一本书的钱
享受读几十本书的乐趣

欢迎订阅《书摘》月刊

《书摘》杂志由光明日报社主办，以“让爱书人少花钱、多读书、读好书”为办刊宗旨，每月从新出版的众多图书中广搜搏采，荟萃精华，精心编辑，是献给广大爱书人的一道精美的“图书套餐”。

《书摘》设有“国是论坛”、“生活广角”、“人物春秋”、“历史与内幕”、“百科视野”、“图文并茂”、“缩微景区”等栏目，集思想性、时事性、知识性、文学性于一体，品位高雅，可读性强。著名作家贾平凹称赞道：“《书摘》是个丰富多彩的朋友。”

2000年《书摘》杂志将由96页增至112页，以介绍推荐更多好书，并将调整更新栏目，力求更加隽永耐读，同时进一步提高印制质量，以报答读者朋友的厚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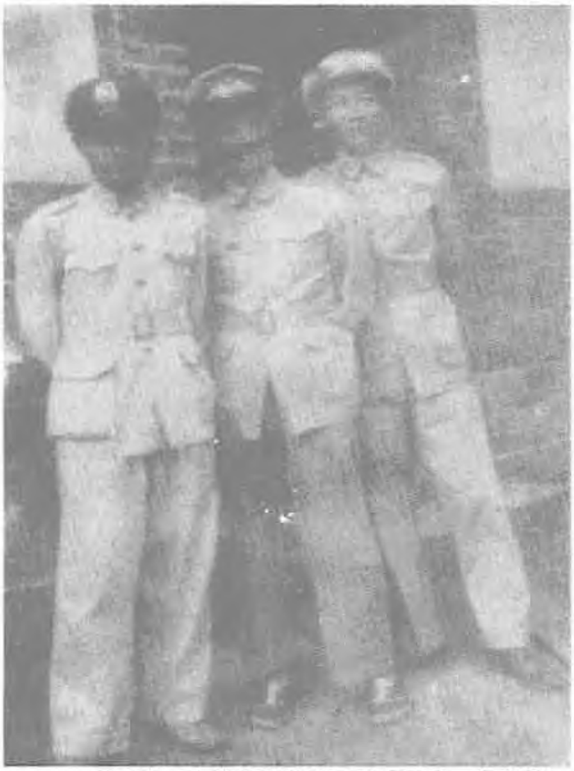
请读《书摘》杂志，体会书海泛舟的美好感受！

《书摘》杂志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邮发代号82－492。每月定价7元，全年84元。杂志社同时办理邮购。

地址：北京永安路106号《书摘》杂志社　邮编：100050　电话：(010)63047292

王作尧命途多舛斗争不屈

● 王 曼



1946 年，东纵北撤前的三位领导人。自左至右：曾生、王作尧、杨康华

王作尧是一位和林彪集团、“四人帮”作不屈斗争的将军。

他被放逐长坂坡

1970 年元旦，新春伊始，来催王作尧将军上路的人一早便到家来了。昨天，他刚从囚禁地释放回到武汉家里，满心欢喜地对妻子何瑛说：“我解放了。”没想到他屁股还没坐热，武汉空军的专案人员随即跟了来说：，“为执行林彪副主席的命令，进行战备疏散，司令部决定你明天一早便离开武汉，到湖北当阳县去。”

“这是流放。”将军心里明白。这一夜，他没有合过眼，跟妻子谈着他两年来（从 1968 年 8 月 2 日被拘禁）在武汉空军执法队遭受残酷逼供的情景。打手们夜以继日地围攻漫骂，硬要他承认是“国民党的策反对象”，是“叛徒”，常常强迫他站立十多个小时，直到两只脚都肿了，王作尧也不说半句违心的话。这次要他去当阳，定是又一场灾难。当阳在三国时期张飞单枪匹马守住长坂桥挡住曹操大军的附近地区，那里人迹罕至，极目荒凉。他沉重地对妻子说：“我此去凶多吉少，我这匹老马无法驮起全家来度难关了。但你放心，我会自重不倒的。要告诉孩子们不要因为家难而自暴自弃，更不要做对不起党的事情。”

妻子那时也正在单位受审查挨批斗，为了不再给丈夫增添痛苦，她强忍着泪水，安慰他说：“只要你平安无事，我们全家会有希望的。”

王作尧被安置在当阳县城背后一座山顶上的一间独立屋。这里没有厨房，没有厕所，四周野草丛生。

将军面对这幅荒凉景象，没有惊慌，没有叹息。他 1935 年参加革命，经受过战火的洗礼，在严酷的斗争环境中锻炼成长。当日寇气势汹汹地从广东大亚湾澳头港登陆，国民党守军纷纷溃逃的危险时刻，王作尧却带领刚刚组织起来的东莞模范壮丁队开往前线，在东江河畔的梅花塔附近袭击从石龙窜来抢粮的日本侵略军。梅花塔战斗的胜利，鼓舞了东莞人民，参加模范壮丁队的青年越来越多，部队不断壮大。一年多后，在中共广东省委的领导下，与在惠宝地区组建的曾生抗日游击队，合并为广东人民抗日游

击总队；1943 年 12 日扩编为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东江纵队，王作尧任纵队副司令员兼参谋长。部队在战斗中不断壮大,成为华南敌后一支抗日武装的劲旅。

抗战胜利后，他进入华东军政大学学习，1947 年 5 月调任华东野战军第十纵队副参谋长,转战在华东各地。渡江前夕,他又奉命调回两广纵队任副司令员兼第二师政委，南下参加解放广东战役,一直打到南海之滨。数十年的战火洗炼,他早把生死置之度外,这么个放逐又何惧之有!王作尧以第一次举枪抗日的勇气,开始了被流放的新生活。

屋里没有做饭的炉灶,他立即动手砌;没有厕所,他在屋边的荒地上挖个茅坑,用牛毛毡和茅草围起一间厕房。他又在荒坡上挖出一分多地,种起青菜来。对任何事物都有研究兴趣的王作尧,爱上了种菜这个行业。他经常到当阳镇买回各类菜籽和瓜苗来试种。几年间,他种过的瓜菜计有,苋菜、菠菜、蕃茄、苦瓜、黄瓜、辣椒、节瓜、竹叶菜、刀豆、扁豆、南瓜、四季豆、芥兰、大白菜、油菜、芥菜等 26 种之多。他还学会孵化小鸡,一年间,共喂养成 42 只大鸡,这样,他不单解决了吃青菜的困难，菜盘里还时不时增添了鸡肉和鸡蛋。

为了让生活过得更充实，他每天在劳动之余定要坐下来读书,他除了读毛主席的著作外,还读他随身带来的《唐诗三百首》。但此刻让他苦恼的是依然不让他看报纸和听广播。即便至此，林彪一伙原想用流放手段来消磨王作尧意志的目的又落空了。将军又成了驾驭生活的强者。

谁在他背后插了一刀

王作尧将军一生光明磊落，在革命征途中勇往直前,从没受过任何磨难,为何组织上竟会怀疑他是“国民党策反对象”呢?他对此一直迷惑不解。其实,这事早在 50 年代便已发生了。

1951 年 1 月，广东成立防空司令部，华南军区司令员叶剑英把王作尧从江防司令部调到那里任第一副司令，司令员是华南军区参谋长黄永胜兼任。黄一贯骄横跋扈,喜欢拉帮结派。他不喜欢东江纵队和粤赣湘边纵队的干部，对他们无端排挤，王作尧看不惯他这种横蛮的作风，两人常因意见不合而顶撞。王作尧心胸坦荡，闹过意见后不放在心里；黄永胜则不然，记恨在心想寻隙报复。后来终于使出鄙卑手段,秘密向上级呈递报告,诬陷王作尧是“国民党策反对象”,“不宜留在广东工作”。从此,王作尧带着背后的刀伤走上了漫长的坎坷之路。

1954 年 12 月，王作尧突然接到中央军委的命令,调他到北京进防空军高级防校学习。王作尧不知个中缘由,心里很是高兴,他觉得早年虽在黄埔军校学习过，但对现代化防空军还知之甚少,现在有这个学习机会,是求之不得。谁知到了高级防校,却分配他任该校高级班主任,后又兼任代训练部长。他开始感到惶惑,后想到作为一个党的高级干部,不应考虑个人的得失,也就随遇而安了。他每天集中精神修改教材,为完善每份教材，反反复复地写，常常工作到深夜,……

其实，王作尧那里知道，这次调他到北京，对他进行审查。在不久开始的肃反运动中,王作尧被当作肃反对象。当领导当众点他是“国民党策反对象”，要他如实交代时，王作尧镇定自若回答说：“我自己完全不知道有这么回事，敌人想策反那是敌人的事,我受党教育几十年,就那么容易被敌人策反过去?我历史简单清楚,一参加革命队伍,就没有一天离开过党和部队,所作所为许多人都可以作证。我相信这个问题,只要深入调查一下,就不难弄清楚。”

王作尧想得太简单了,有黄永胜一伙当道,谁能去为他作什么调查!王作尧痴心地等着,一年、两年……还是没有结果。

1956 年，王作尧被通知留在北京工作，他又信以为真,待他举家由广州迁到北京,王作尧又接到调任沈阳防空军副司令员的命令。

农历大年初一，北京家家户户正在喜气洋洋地团圆过节，王作尧一家七口却匆匆登上北去沈阳的火车。将军一声不吭地独坐在车窗口望着那沉沉的夜色，心里明白，这是对所谓“国民党策反对象”审查的继续。

经过一天一夜的颠簸,火车抵达沈阳。严冬沈阳雪花纷飞,滴水成冰。过惯广东生活的孩子

们挨不了冻，嚷着要回南方，老伴的情绪也起了波动。将军却坦然地劝导说：“你是老党员啦，党叫到哪里就到哪里嘛。战争年代，你从香港大城市来到东江游击区，连死都不怕，现在只不过是冷一点，慢慢就会习惯的。我刚到一个新单位，人地两生，你要协助我管好家，管好孩子，不使我分心。”他这番发自内心的真情话，深深感动了妻子，她决心照丈夫的嘱咐把家庭管好，为他分忧。谁知只过了两个月，防空军与空军合并，将军又接到调往武汉空军任副司令员的命令，在举家迁往武汉的路上，将军不无感慨地说：“何瑛，我真像个骡马队一样，整天驮着家当东奔西跑，真对不住你们呀！”老伴体贴丈夫的难处，没发半句怨言，却逗趣地说，“俗话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天上雷公也打不走。”说得将军哈哈笑了起来。

1989 年，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高兴民（左二）等代表中央军委为王作尧（右二）授勋后留影

依然逃不出黄永胜的魔爪

武汉空军当时正是林彪死党刘丰把持的单位。他们依然按照黄永胜给种下的祸根，把王作尧当作“控制使用的对象”。王作尧身为副司令员，却有职无权。党委分工他管高炮、雷达部队和后勤工作，但北京召开与此有关的部队会议，一次也没有通知他参加过；高炮、雷达部队调动或出国参战，也不让他知道。

王作尧经常深入基层，到高炮、雷达部队检查指导工作，传授一些现代化知识，为他们解决训练中的具体困难，很受部队欢迎。但是这些，似乎都未被上级领导重视。

他很苦恼。他曾想以忍辱负重、埋头苦干的办法来消解这些精神上的烦恼，但这不过是一时逃避现实的想法而已。一天，他到飞行队去检查工作，可在讨论飞行事故时却不让他参加。他再也忍耐不住了，多年压在心头的怒火终于爆发了。他气愤地向空军党委提出：“我实在无法在这里干下去了，我请求调回广东工作”。

王作尧至此还不知道，当年他调离广东就是黄永胜捣的鬼，“国民党策反对象”，“不宜留在广东工作”的枷锁是黄永胜给他套上的，他们怎么会轻易让他回广东呢？

几天以后，给王作尧的回复是：“回广东工作可以，但必须转业到地方”。

王作尧少将时年仅 51 岁，年富力强，正是在部队大显身手的时候，他怎能忍心脱下军装，离开部队呢？他不屈服于压力，理直气壮地回答：“我不转业！”

这以后，将军的日子更不好过了。刘丰一伙处处给他出难题，甚至发展到不让他参加会议，使他成了一个无所事事的闲人。后来竟抓住他“请求住院”治疗糖尿病的机会要了个手腕，把“住院”二字改为“离职”。使王作尧一瞬间成了“离职休息”的干部。不久，“文化大革命”开始，刘丰一伙又以“隐瞒重大政治问题”为借口，把将军扣押审查，在武空执法队整整挨斗 485 天，

而将军也威武不屈地与他们斗争了整整485天。针尖对麦芒，执法队让他念“对于叛徒，除罪大恶极者外，在其不继续反共的条件下，予以自新之路”这段语录，将军便念“重在调查研究，不重口供，不要搞逼供信”的语录来回应。这样一来一往，一直没有任何结果。正在无奈之中，适好林彪第一号通令下来，刘丰一伙便把王作尧放出执法队，流放到当阳继续进行监护。

不屈为申诉

王作尧在当阳的荒坡上孤苦地度过了整整三年，直到1971年，林彪叛国出逃，摔死在蒙古共和国温都尔汗才结束了流放生活，于1972年返回武汉，与家人团聚。

此时，林彪反革命集团虽已垮台，但“四人帮”还在。武汉空军也有“四人帮”的人。他们依然不肯放过王作尧，继续对他进行迫害，不准他参加党的组织生活，只能听传达到连级干部的文件或报告。

一天，武空领导派人来向王作尧宣读一份手抄材料，要他交代所谓“策反对象”的问题，王作尧一听便火冒三丈，正是这份所谓“策反对象”手抄材料，使他遭受二十多年的冤屈和苦难。为了把事情彻底弄清楚，他强忍着怒火静静地听着。这份手抄材料这样写道：“广九铁路特别党部某人和王作尧接过一次头，王已答应从部队拖出来，约定于1942年2月在平湖再行商谈部队起义的具体安排……”来人读完即说，他们十多年来就是审查这个问题的，要他现在就这个问题交代清楚。

王作尧听后大声驳斥说：“这是一份伪造的材料，我根本不知道有广九铁路特别党部这个名称，1942的2月，日本侵略军进攻香港时，驻在惠(阳)东(莞)宝(安)的国民党军队早已逃之夭夭，躲到惠阳西北的深山里去了。这时，只有我们东江游击队跟随日军的脚后跟挺进香港敌后与其作战。不久，党中央就命令我们全力以赴抢救被日军困在香港的文化人、民主人士和国际友人。我此时正在铁路以西，跟政委林平、主任杨康华一起，全力指挥这场战斗，一步也没有离开，哪里有时间去跟什么‘党部’谈判，这纯粹是坏人制造出来的假材料，一查就会弄清楚，为什么要调查十几年，现在你们讲出来了，我也知道了真相，我这就要求组织上立即为此作出结论，把伪造材料的坏蛋揪出来。”

王作尧弄清楚被长期审查的缘由之后，便把他二十年来所受的不公正待遇，如实地写信给毛主席、叶剑英军委副主席和廖承志等中央首长进行申诉，要求查清事实，作出结论，落实政策，并严惩诬陷他的坏人。为了郑重其事，他在信封上写明：请按照党章规定转送。他把信交给武空党委转交，一封封信如石沉大海，没有任何反响。后来武空党委干脆告诉他：“党委转信，替你转信，就等于同意你的观点。审查你是江青、张春桥的指示，是正常的审查。”将军这才又明白，江青和张春桥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是一丘之貉。他再也不去白白花费心力了，一把火便把手头的材料化为灰烬。庆幸的是，很有心计的妻子何瑛为他留下了这些信的底稿。

王作尧在百般无奈中，向武汉军区党委提出了“回广东去住”的要求。

后又通过东江纵队老战友尹林平、刘田夫和杨康华的帮助，得到中共广东省委的批准，王作尧举家于1976年2月回到广州市，在广东省老干所永红新村安了家。

为了工作　继续斗争

不久，武空党委派人送来一份《空军政治部通知》给王作尧，通知说：“关于王作尧同志问题的审查情况及处理意见的报告，现经中央军委批准，同意你们1973年11月9日对王作尧同志问题审查情况的报告，撤销其专案审查，恢复党的组织生活和原来政治待遇。请你们按照总政批复执行，并通知王作尧同志本人。”

二十年来的专案审查，终于被撤销了，这是将军坚贞不屈斗争的胜利。但是，鉴于当时整个政治形势的严峻，王作尧将军还不能立即提出重新工作的要求。直到当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了，1978年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他才开始考虑向中央提出重新出来

工作的问题。1978年8月间，他接到去北京瞻仰毛主席遗容的通知，这正好是他去拜会叶剑英副主席和廖承志老首长的机会，将自己要求工作的意愿当面向他们提出来。在北京，他先晋见了廖承志，次日，来到了叶副主席的家。叶副主席见面就风趣地说：“作尧，你还很‘后生’呀！”

王作尧听着十分高兴，马上回应说：“是呀！我的壮年时光给长期的专案审查毁掉了，但我现在还只有65岁，能吃能睡，精力充沛，老卒余勇不减当年，只是现在欲执干戈路不通呀！”

叶副主席对王作尧的历史是很了解的。1948年他兼任华北军政大学校长时，就亲自点名要王作尧去当教育部副部长，广东解放初期，他出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一书记、军区司令员时，又亲自指调王作尧到广东江防司令部任副司令员，参予组织指挥解放万山群岛之役。这些往事留给叶帅很深的印象。当他听到王作尧说“要执干戈路不通”时，便立即说道：“你要工作?好哇！”

“是呀！我在武空他们不信任我，我无事可做，便提出‘住院休息’，可他们一反掌，把它强改作‘离职休息’，这不是我的本意。我现在身体很健康，还可以工作，所以我随身带来个报告，请求你批准我出来继续为党工作。”说着，他把进京前重新整理的1974年的报告给叶副主席。

叶副主席戴上眼镜认真用红笔在“我每天早上跑步两千米”，“每天洗冷水浴，能坚持上班八小时工作”等句子旁划上杆杆。随后，便在报告中作如下批示：请×××在广州军区安排王作尧同志的工作。

老帅的关怀，使王作尧感动不已，连声说：“感谢首长的关怀！”

叶副主席笑着说：“广东人民会欢迎你的”。

王作尧回到广州，正是落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议的时刻。广东人民正如叶副主席所说的需要王作尧出来工作。1979年12月，东莞人民选举他为广东省第五届的人民代表，在广东省五届人大第二次会议上当选为省人大常委副主任。王作尧日夜希望为党继续工作的愿望终于实现了。

王作尧在广东省人大常委副主任任上，像在部队当司令员时一样，经常早出晚归，勤奋工作，批阅文件常到深夜。他像过去下连队一样，常常以公仆的身份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听取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帮助他们解决具体的困难。他率领检查组到广州市越秀区检查落实华侨房屋政策情况，得知海珠北路祝寿巷有户马来西亚侨属，“四人帮”横行时被遣返回乡，现在回城复户，房子已被拆除，全家人没有栖身之所。王作尧便积极协助越秀区侨办联系省府有关部门为这户侨属落实政策，妥善安置了他们的住宿，使这户归侨十分感激。王作尧又抓住这个典型，推广全市侨房政策的进一步落实。

又有一次，省人大讨论研究市场物价问题，王作尧为了掌握第一手材料，跟妻子何瑛要了糖票和粮票去逛商场，掌握第一手材料，以便作出一个正确的判断。

每年，他总有几个月带着工作组深入到老区去调查。在调查中，他从许多老同志中得知，“文化大革命”期间，黄永胜一伙诬蔑东江纵队为“土匪部队”，诬蔑广东党组织是“地主富农党”，由此，许多东纵老战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批斗和审查。他这才知道黄永胜之流不只在迫害他，迫害尹林平、曾生等东纵的领导同志，连整个东纵的老同志也都受到不同程度的迫害。为了使东江纵队这支华南敌后的抗日劲旅的功绩不被淹没，他在百忙中撰写回忆录，用了三年时间，写成了二十二万多字的《东纵一叶》一书(已由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1988年8月6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政委高兴民中将为首的授勋代表团，在广州军区空军司令刘鹤翘、政委张振声等同志陪同下，代表中央军委专程来到广东人民医院东病区大楼，向王作尧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他紧紧握着高兴民中将的手，一而再地感谢党中央、中共军委给予他的荣誉。他说，只要一息尚存，我就要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奋斗。

1990年7月30日，王作尧将军终于走完人生的旅程，飘然离开了人间。

(责任编辑　洛　松)

周恩来在绍兴结交一方名士

● 高　汉

在绍兴周恩来纪念馆前面的广场上，有一座周恩来的雕像。雕像旁边，有一方他在1939年题赠天台名士曹天风诗轴的刻石。诗轴上所题的诗，则出自当时绍兴名士沈复生之手。

据知情人说，周恩来一生很少为别人题字；即使题，也不过几个字而已，像为曹天风所作整幅宣纸的题赠，实属凤毛麟角，这就更增加了这个诗轴的珍贵性；所以曹天风一向视它为命根子。

"文革"期间，曹天风屡遭造反派迫害，诗轴和他的文存诗稿、藏书藏画等等，均被抄掠一空。因为他拒绝为造反派提供伪证，即被诬陷为"特务分子"投入监狱。"伪造周总理题字"当然也成了他的重罪之一。从1939年到新中国成立，这个诗轴历尽劫波。曹天风及其家人为了完好保存它，提心吊胆十余年。解放之后曹天风反倒因为它吃上了官司，屈辱备尝，悲愤难诉。官司一直打到北京，最终由周恩来自己作证"确有其事"，曹天风才于1970年元旦获释，1979年彻底平反；诗轴原件交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收藏，复印件还赠曹天风及其家人，留作纪念。

曹天风先生遗像

绍兴周恩来纪念馆把这个诗轴刻石立在周恩来雕像侧畔，无疑是很有意义的。它不只记载着周恩来的文采风流，更记载着他杰出的统战才能。周恩来逗留故乡不过几日之数，却从他的襟怀坦荡、待人至诚、智慧过人、才华横溢，赢得了曹天风、沈复生这两位浙东名士的倾心。向以"疯人"、"狂生"自谓的曹天风佩服得五体投地，声明愿奉周氏之言为"圭臬"。事实上他也确实这样做了。例如：三青团曾邀他出任其机关报青年日报社社长，三次都遭他峻拒。沈复生则将自己总结绍兴地区明末清初组织义兵抗清失败的惨痛教训，掬诚献与周恩来，虽然所讲都是历史，内容却全是政治，不是推心置腹的关系，谁愿相告？在当年抗日战争正处于艰难竭蹶之际，在这个象征他们三人神智交融、友谊无间的诗轴背后，究竟发生了怎样一个故事呢？

1939年3月，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名义，视察东南形势。在皖南泾县云岭新四军总部检查了工作之后，他轻装简从，取道旌德，乘乌篷船于27日抵达自己还从

未到过的故乡绍兴。

当时，浙江杭嘉湖地区已陷于日寇之手，绍兴成了抗日的前沿地带。绍兴各界在得知家乡弟子、革命家周恩来要回乡扫墓的消息，奔走相告，拟搞一次大规模的欢迎。但当地国民党政府唯恐扩大了共产党的影响，产生不可预料的后果。原本想搪塞应付，又迫于舆情和群众压力，不得不做点门面功夫，就推派曹天风为各界欢迎总代表，率众郊迎周恩来于河上。

曹天风（1903－1992）浙江天台人，早年毕业于上海大学。在该校社会系求学时，系主任是瞿秋白，导师是恽代英、李达、施存统、沈雁冰等人，所以深受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他21岁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经共产党人宣中华介绍，他加入了国民党，一直是国民党中的左派。在上海，他参加过“五卅”惨案的抗议活动。1928年，因“共产嫌疑”被捕，关进了南京卫戍司令部军人监狱。翌年，又涉嫌参加由共产党人罗青领导的镇江起义，遭到了通缉；从此他就长期过着政治流亡生活。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他才于1938年应邀出任浙江省三区（绍兴）政工指导室主任、战时政治工作队教育长兼战旗杂志社社长和主编。因为他历来思想左倾，博览群书，学识渊深，派他担任绍兴各界欢迎周恩来的总代表，也可称是用得其所。

3月27日那一天，曹天风率众坐船到郊外一船码头迎候。傍晚时分，周恩来坐的乌篷船到，顿时锣鼓喧天，欢呼声口号声此伏彼起。曹天风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两岸过客，甚至歌楼酒肆中人，亦欲下岸来，以一观风采为快。”当时周恩来挺立船头，“身着军装，英姿焕发，虽长途跋涉，仍无倦容”，向欢迎者招手致谢。船到码头后，他与各界代表一一握手，然后挽曹天风等少数几人登船说话。这时，曹天风才发现，与周恩来形影不离的警卫员只有一人，“他手提机要箱，目光四射，炯炯有神。”欢迎群众趁原船回去，曹天风等就随周恩来进城。

当晚，由周恩来姑父王子余设宴洗尘，绍兴著名人士沈复生等作陪。

沈复生（1884－1951）绍兴本地人，年长周恩来14岁，是当地著名的民主人士。原名钧业，又名馥生，晚号复庵，本清末秀才。1905年他加入了光复会，同年赴日本留学，又加入了同盟会。辛亥革命前后，他曾先后任浙江省军政府教育司司长、省政务厅厅长、金华道尹、山东政务厅厅长、浙江省议会第三届议长、直隶省署顾问等职。1932年回故乡绍兴从事地方公益事业，并有著述，遗有日记三十卷，诗稿一卷。

他们在宴会上谈了些什么？已无案可考。不过从沈复生当时所作四首诗中能看到一点消息。这四首诗被曹天风发表在《战旗》杂志第五、六期合刊“旧园地的一角”栏内。题为《与客谈明末浙东山寨遗事有感》，全文如下：

越山盘郁越江清，义旅当年此结营；
海上犹存朱氏朔，民间错怨白头兵。
遗黎不尽三申痛，虏使终须五鼎烹。
往事已随流水逝，为君重复旧棋枰。

* *

山阴片土拟临安，换劫枯棋局已残。
南渡例多新桀戟，东迁非复旧衣冠。
六家丁壮征输急，二镇方王驭驾难。
雪耻复雠均有责，一时罴虎盛江干。

* *

驼峰一会亦千秋，鞠旅陈师志未休。
赖有荒山延汉腊，誓从沧海觅韩仇。
蛟关犄角真天堑，牛宿光芒拥上游。
王李陈刘零落尽，共谁努力复神州?!

* *

山中岁月纪春王，颁诏何须辨鲁唐。
此日甲兵栖越纽，相期铙吹渡钱塘。
檄传英霍军威远，势压杭嘉士气扬。
成败区区君莫问，中华终竟属炎黄!

发表时，作者作了11个详注，其内容大都是说明当时当地组织义兵者的姓名和驻扎的地点以及义兵与清兵前来招安者之间的斗争。最值得注意的是，沈复生在注释中指出：义兵的兴起，牵制了清兵跨海占领舟山群岛的战略意图，唯恐义兵乘其后，在整个形势上使抗清复明力量获得了海上回旋的余地；义兵之败在于“统率不一”和一部分义兵的首领假义兵之名，行“自便

私图”之实，遂使人民不堪重负，“不免移其恨虏之心理，转而恨义师”。既然脱离了群众，就使变节分子有了可乘之隙，义兵就逐渐趋于瓦解，终于一事无成。沈复生着重指出，这一惨痛教训，值得“论古者所当知也”。

我推想，上述这四首诗和有关的注解，该是洗尘宴上沈复生与周恩来的重要谈话资料。根据有二：

一、应曹天风的请求，周恩来在临行前夕，即3月30日深夜，为他题此诗第四首时，在跋语中称之为“沈复生先生近作”。周恩来在绍兴总共不过五日，除掉来去头尾多一日，实际上只呆了三天。“近作”云者谅必是他在宴会上才听说或看到的。

二、按情理推想，沈复生作为家乡参加过光复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前辈，自己又在辛亥革命前后涉足政治舞台多年，对于中国的革命事业，革命的成功和失败，革命队伍中鱼龙混杂的复杂情况，肯定已甘苦备尝，体会深刻。这样一个人与第一次来到故乡的革命家周恩来见面，该说些什么呢？空话当然毫无意义；褒贬现实恐亦非他所宜，毕竟他已退居林下多年；最适当的话题莫过于他诗中的内容，因为这些事发生在绍兴当地，而且近在明末清初，性质则关系国家民族存亡，意义当然重大。我甚至怀疑诗题中的“客”和首末两章的“君”，概属虚拟，而实指周恩来和由他所代表的革命者。如果这样推想是合理的，那么从这些诗及其自注中，我们可以体会到沈复生当时的良苦用心，对于中国共产党，他的确是寄予无限希望的。他这种用意，在第一章“往事已随流水逝，为君重复旧棋枰”两句中已有交代。下棋的为了总结经验教训，常用“复盘”的方式。沈复生重提这段绍兴往事，岂不就是一次借古喻今的“复盘”之举吗？他对于抗战必胜的信心充分表现在第四章，信心的根据就是长注中所说明的义兵不可脱离群众的道理。周恩来题赠曹天风的，正是这第四章，所加的短跋是：

“因抗战机缘得来故乡扫墓，承曹先生远迎，复得聆谠论，极感奋。爰录吾绍沈复生先生近作，应天风先生雅属并留纪念。”

所谓“谠论”，就是几天来曹天风始终陪着周恩来发过的许多议论，特别是曹天风在一次官方举行的大型座谈会上致欢迎词时所作惊人之语：“地球向东转，世界向左倾，是两种不可抗之伟力！”此言一出，合座国民党官员和历来“捧臭脚”的文人们都为之目瞪口呆，一时难以自处。

周恩来为曹天风题写诗轴那天晚上，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因为明天一早彼此就要分手。这可说是一次令人感动、又令人遗憾、意味极为深长的话别。据曹天风1978年口述的回忆录，其要义大略如下：

周恩来询问了战旗杂志社及政工队的编制之后，让曹天风对自己前途作一估计。曹天风说：“万绿丛中一点红！”

周恩来：“你虽不爱讲斗争，正义感倒是有的，不过放大炮常受迫害，你不怕？”

曹天风念了两句10年前的旧作：“弹丸饷我全无用，早岁便传不死方。”

周恩来：“这才是‘五四’、‘五卅’的精神！”

曹天风：“我到底是个摇旗呐喊者，真正的先锋队早已血染南京路，骨埋吴淞口了！”

于是周恩来讲了“五卅”运动时他不在上海，但参加了两年后的闸北暴动，上了武装斗争第一课。“五四”、“五卅”以两只手为武器的精神固然可以钦佩，但革命胜利还要靠武装斗争；社会主义则要靠迂回曲折、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才能实现。

令人遗憾的是，曹天风这时开始后退：“惭愧得很，我是一个空想主义者。”

周恩来：“空想主义倒未必……”

曹天风：“我本来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人道主义者。自入了上海大学，受革命先辈启示，学得马克思主义ABC，从此得救了。”

周恩来紧追不舍，继续启发他：“思想不好停留在现阶段，你高瞻远瞩，能不能更上一层楼呢？”

在这个节骨眼上，曹天风并没有正确的作出正面回答，又念了两句诗：“穷途莫笑无余技，待把黄金化石头。”

听到这里，周恩来心里有数了，就作出了要

结束谈话的暗示："良缘难得！这几天胸中无町畦，相与作自由谈，谈得极痛快。"

曹天风就更加后退一步："交浅言深，古人所戒。彼此原不相识，竟蒙你再三教益，至理名言，终身该奉作圭臬。所抱歉的：戟指谈时，使酒骂党（指国民党——高注），恐不免狂奴故态，太坦率处还乞见谅。"

周恩来："你是诗人，固然爱天真、爱戆直，难道革命者不应当如此吗？"

曹天风于是微觉黯然，起身告辞："再见无期，前途远得很，谨向你道一声珍重！"

周恩来语重心长："你应当更珍重了！平地比崎岖山路还更容易滑倒。"

从这些对话看，周恩来当时对曹天风这个人才是欣赏的，对他在关键处不能前进一步是惋惜的，对他未来的命运是关切甚至担忧的。过了很多年之后，曹天风才终于认识到了周恩来当时对他那份大仁大义的厚爱，所以在回忆录中他以这样八个字结束那一次话别："不为执鞭，悔已无及！"

1939年3月31日，周恩来告别家乡，取道诸暨，前往金华继续他视察东南形势之旅。是日晨起，曹天风与当时绍兴地区专员贺扬灵等前往送行。分手时，周恩来叮嘱曹天风说："望你保持高风亮节，越是困难越要珍重。"曹天风则别绪依依，倚马作诗。题为：《送客度沦区》，其中一首云：

据鞍忍论今天下，蜀魄犹号古帝乡。

万里危途独归去，青山影压帽檐斜。

诗得时，行人已经走远，他派快马拿着临时写在一片纸上的诗追去，目送他们的身影淡入江南早春的烟树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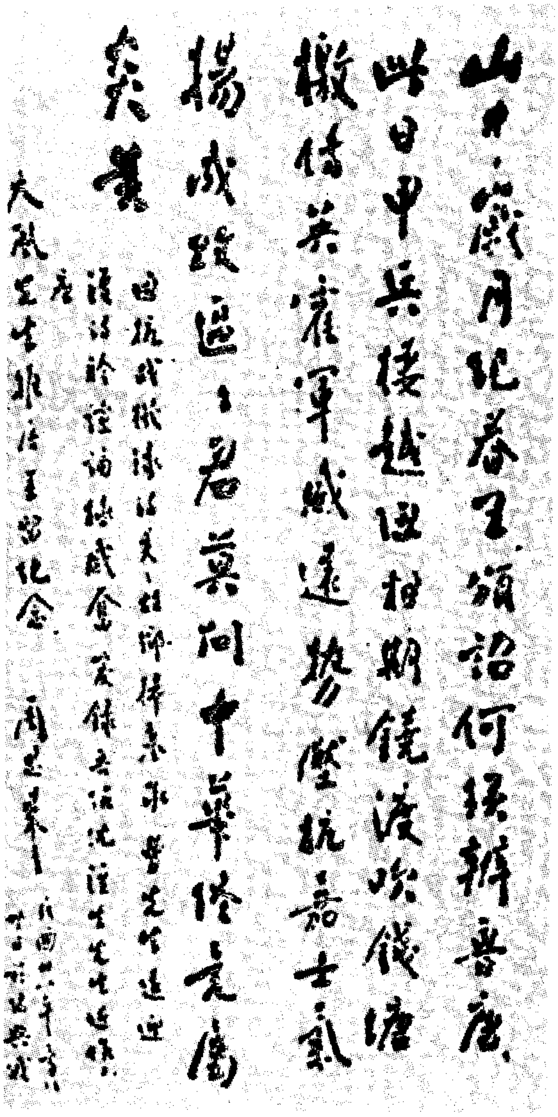
曹天风与周恩来绍兴别后，怀念与日俱增，对周恩来所赠诗轴则视同珍宝，重于生命。这在他后来的作品中时有流露，例如长诗《编余杂咏》中有句云：

闷极翻临快两帖，酒阑敢骂帝秦人。

莫嫌剑气山城少，入座虹当侠客迎。

越台舌战孰撄锋？半壁残烟护墨龙。

料得使君西去也，五峰轻荡马蹄风。



曹天风作诗，一向主张不加注。因此他的《水平集》中极少注释。但在这几句诗之后，他特地注曰："使君，恩来先生也。"根据这几个字推想，彩虹人座使他想到的是周恩来，是侠客，是他在越王台上舌战"群儒"的风采：锋芒毕露，所向无敌！看着为他所题的诗轴像条"墨龙"就在墙壁上飞舞，于是又似乎感觉到了这位豪客驰骋疆场的马蹄风正在越中山水之间回荡。诗人如此浪漫的情怀，难道不是周恩来巨大魅力留在他心上的印记吗？

（责任编辑　洛　松）

23年前胡耀邦给年轻人罗炤的一封信

编者按：罗炤是安徽金寨县人，1962年9月考进北京大学历史系，与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是同班同学，他俩平时很谈得来，常在一起议论人生道路。1963年5月，他俩认为读大学是浪费青春，应该到农村去半工半读才是革命化的道路，为此给胡耀邦写了一封长信。胡耀邦找他们谈了一个晚上，告诫他们不要头脑发热，他说："我要给你们泼瓢冷水！"要他们安心在校学习。

"文革"中，胡耀邦挨批斗，胡德平被打成"反革命"关进"牛棚"，罗炤常去胡家，与胡耀邦敞开心扉交谈。

罗炤在北大毕业后被分配到黑龙江的林海雪原，他在山沟里研究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并由此逐渐涉入佛学领域，1976年11月写出学术论文《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首先寄给胡耀邦请求批评。12月8日，一向关怀年轻人的胡耀邦给罗炤写了这封长信，在信中，胡耀邦着重讲述了批判"四人帮"的重要性，并且特别"谈到勇气"。耀邦同志说："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档它的奔腾前进呢！"耀邦同志热情鼓励一代青年，"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现将原信全文发表，以飨读者。

小罗：

你的大作和两封信都收到了。收到你的第一封信时，德平正准备第二天出差去山西，我委他先写几句话给你，并告你我将给你写封较长的信，他大概写了吧。

你知道我是不大愿意同人通信的。这些年来，我连一些战友和青年的一般问候信、包括我的三个孩子在大学写的家信，都不大看，不得已时，就委托德平或他妈妈出面敷衍一番。

对你却是一个例外，我知道你也是不轻易写信的人，要写，总有点值得看看的东西，你那种顽强追求真理的治学精神，那种独立地用新鲜活泼的语言表达自己思想的风格，都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初论谭嗣同的哲学思想》，我用了三个晚上的时间粗略地翻了一遍。我深信你是花了苦工夫的。但是你能体谅我，我不仅对自己祖国历史上的许多著名英雄没有研究过，就是对生长在自己家乡的这位赫赫人物也不甚了了。因此即使再仔细看多少遍，还是提不出什么切中要害的意见来。我只能答应你一条，就是德平回来后，我一定要他亲自去找几位有权威的而又认真负责的同志（其实真正有权威的也一定是认真负责的）看看，然后再商讨怎么处理告诉你。

因为在你面前可以无话不谈，我想先把自己这样一个很粗浅的想法告诉你——

现在，全国思想战线上最中心最迫切的任务是批判四人帮。这是一场关系我国革命前途的伟大斗争。要知道，把这一小撮丧尽人心的坏蛋拉下马来，打翻在地，这是一举成功的事情，但要从各个方面把这帮蛀虫们多年来一系列的反革命言行揭深揭透，批深批透，从而把我国革命引回到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轨道上来，还须作极其艰苦的努力。你的这个作品，同这个任务联系得不密切。这是否合乎“时宜”?这是一。

第二，谭嗣同的哲学思想，即使充满着唯心主义的糟粕，但这个人毕竟是我国十九世纪末思想界的一个先驱；他在反封建专制斗争中那种一往直前、视死如归的英雄气概，极大地鼓舞了后来的革命者的斗志。你的作品对他这个方面肯定得不够，这会使连中国近代史都不太清楚的现代青年可能产生错觉，无形中会使一些人离开具体的历史条件去看待古人。这是否合乎“人宜”?

从上面这个理由出发，我非常希望你抓住这两三年的宝贵时间，集中精力参加批判四人帮的战斗，你的历史知识是比较多的，我希望你能特别在这个方面下功夫，做贡献。十多年来，四人帮在各个领域里放了大量的毒，拿史学领域来说，前几年，在所谓儒法斗争问题上，他们及其叭儿们所散布的大量言论，真是达到了胡说八道的高峰。又如，多年来，他们及其叭儿们所写的一些历史人物的论文和出版的小册子(主要是上海出版社）对武则天、吕后等人的介绍，对秦皇朝、太平天国失败的评论，其荒诞无稽，大概也是前无古人的。这些东西，有些有心人可能还没有充分注意到，有些人则可能还有些顾虑，不敢放开写，而像我这样的人，又只能望洋兴叹，这就更希望像你这样的人勇敢地拿起笔来。

谈到勇气，我还想在这里多噜嗦几句。多年来，四人帮为了篡党夺权所筑起的两道堤坝——愚民政策和法西斯式的恐怖政策的堤坝，已经被我国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冲决了，而以华主席为首的我党中央，又把他们投进了人民群众愤怒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的残渣余孽，或者他们的幽灵还能重新筑起这两道堤坝吗？当然，小小的障碍物总是难免还会有的。但是，由几亿人民已经掀起的历史巨浪，小小的障碍物怎么能够阻挡它的奔腾前进呢！一个经受了种种磨练的几亿人口的国家的意气风发的政治局面，已经确实无疑地呈现在你们这一代青年的面前。你们这一代应该在这个大好时光里，信心百倍地有所作为。

还有，对这帮罪大恶极的反革命分子的批判（这帮罪犯曾经有意地混淆了反革命与路线的界限、政治路线与思想路线的界限、右的和“左”的机会主义或修正主义的界限、修正主义路线与修正主义倾向的界限，为他们大批整人作藉口）不能没有一点嘲笑，一点讽刺。这就要求宣传时还要有点匕首式的小品文。鲁迅先生说得好，他说把民家女子说成是婊子是骂，说娼妓是娼妓就不是骂(未查原文，是大意)。自然，骂也需要技巧，做到他老人家所要求的那样：“喜怒笑骂皆成文章”，你是有这方面的才智的，也希望你在这方面显显身手。

至于写出来的东西，在你和周围的同志真正感到满意之后，就可以寄人民日报，或光明日报，或解放军报，或红旗。经过改组后的领导班子，我相信他们有眼力不会放过好作品。自然，为着告诉我们一下你的战果，也欢迎随时抄寄一份给我们欣赏欣赏。

我在靠边的又一年里，非常懊悔的一件大事是：没有好好读马列，而是翻阅了一些杂七杂八的东西，以此来排遣心中的愤懑和忧虑。现在，虽然在加紧翻阅马恩四卷、列宁四卷、斯大林两卷、主席四卷和鲁迅的一些论文，但还得同时检阅坏蛋们那一大堆臭东西，真是临阵磨枪，心有余而力不足！

此外，关于批判四人帮问题，我还同德平谈了不少的看法和想法，因为写得太长了，就不愿再写了。如果你有兴趣，可以要德平选择他认为对你有点帮助的东西告诉你。

祝

近好！

依然未倒的笨伯伯

一九七六年十二月八日

烈士方志敏和他的妻子

● 崔向华

方志敏(1899－1935)是中国革命斗争史上,英年早逝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将自己毕生的精力献给了劳苦大众,他在狱中留下的《可爱的中国》、《清贫》、《死——共产主义的殉道者的记述》等十几篇遗作,成为中国革命史上的绝唱,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后来人,成为中华民族不朽的精神财富。他在土地革命时期所做的重要贡献,曾得到毛泽东同志的高度评价,他领导创造的革命根据地,誉为"方志敏式根据地"、"苏维埃模范省"。

正值方志敏诞辰百年之际,本文要介绍的,只是读者较少知道的,他与妻子缪敏的革命家庭生活。

方志敏一生短暂,婚后为革命操劳,少与家人团聚,竟没有留下一张与妻子或儿女的合影,这不能不说是他家庭的一大遗憾。还是若干年后的一位画家将方志敏和他的妻子缪敏画了一张合影,流传至今。

方志敏与妻子缪敏(吴云龙画)

方志敏和缪敏的婚礼,是在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江西省政府主席朱培德6月5日"欢送"共产党员出境的当天举行的。为了便于工作,区委批准方志敏和缪敏结为夫妇,在澎湃等人的撮合下,这对革命夫妇在白色恐怖的形势下结成了志同道合的人生伴侣。

缪敏是江西弋阳县葛溪乡缪家村人,生于1909年11月4日。缪敏自幼好学上进,且能歌善舞,是南昌市女子职业学校的高材生。她参加革命后表现很好,生活上也保持着农村青年艰苦朴素作风,方志敏对她很有好感。

南昌黄家巷31号是省委秘密交通机关。喜事总得有个喜庆的样子。工作人员把红纸买来后,区委书记罗亦农说:"请日本早稻田大学的高材生,我们的才子澎湃同志写幅喜联。"澎湃欣然命笔,写下这样一幅对联:"拥护中央政策方缪双方奋斗到底;努力加紧下层工作准备流血牺牲。"

几天后的一个清晨,赣江水雾迷蒙。方志敏告别新婚妻子,独自踏上了艰辛的战斗行程。不久,就在方志敏准备赴横峰大干一场的时候,波阳县委被叛徒出卖。县委负责同志林修杰、周萩薷和做文印工作的缪敏被捕。两位负责同志在被捕的第三天就被敌人枪杀了,没有暴露身份的缪敏还在狱中。方志敏强忍悲痛继续发动民众,点燃了楼底兰家村"革命的火药箱"。这年12月底,缪敏被保释出狱,回到了方志敏的身边工作,伴随方志敏南征北战。她曾担任闽浙赣省反帝大同盟主任,为赣东北革命根据地和红十军的创建做出了贡献,被邵式平、黄道、汪东兴、方志纯等同志尊称为"我们的大嫂"。

方志敏、缪敏夫妇相伴相随的时间很少,但由于他们有共同的理想,在生死与共的战斗生涯中,建立了深厚的情感。

方志敏十分喜爱孩子,可是难得有时间与孩子们长相聚。在赣东北中心的葛源期间,方志敏工作很忙,回到家里也总是看书、阅报告、写文章。只有在散步时,带儿子方英出去走一走。至今还有人记得他牵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在葛源街上散步的情景,父子俩边走边谈。有一次开大会,方志敏把方英带去了。当方志敏上台讲话时,方英也悄悄溜上台模仿父亲的样子,惹得台下哄堂大笑。方志敏开始不知怎么回事,回头才发现了方英,看着儿子那天真的样子,竟也会心地笑了,一位红军战士赶快上台把方英抱了下来。还有一次,苏区剧团在红军五

分校场地演戏，方志敏全家都去看了。回家后，方志敏接着伏案工作，方英和弟弟方明就在床上拉开蚊帐演起戏来。弟弟既然是"汉奸"，方英当然不客气地把他捆了起来，大声喝令他跪下。一个不肯跪，一个强制跪，最后弄得弟弟大哭起来。方志敏和缪敏看到两个孩子假戏真做，高兴地称赞说："演得好！演得像呀！"方志敏经常把方英带在身边，甚至北上抗日出发时，他还曾想带着方英一起走。

方志敏这位坚定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在敌人发动第二次"围剿"时，他眼看着苏区的土地一天天被占领，极为痛心。为力挽危局，在特委会议上狠批红十军代理政委涂振农的逃跑主义，并亲任红十军政委一职，和邵式平、周建屏率领红十军向贵溪方向行动，三战三捷，使贵、余、万苏区稳定下来。这时闽北告急，方志敏和周建屏又率领红十军向闽北急进，一鼓作气连打十一仗，收复了闽北根据地。

1932 年 9 月，方志敏率部二次援闽作战，转战 22 天，消灭敌人四个团，牵着敌人两个师来回兜圈子。扩大了闽北苏区，使之和赣东北苏区连成一片。到 1932 年 12 月，中央苏维埃便决定将赣东北省改为闽浙赣省。方志敏任省苏维埃主席。

方志敏趁第四次反"围剿"胜利，赣东北根据地趋向稳定的大好形势，腾出手来专抓政权建设。他深入基层，先到横峰，再到弋阳，又去乐平、景德镇、德兴，到处发动群众，恢复组织，整顿武装，发展生产。

1934 年 10 月初，方志敏接到中央军委电令，要他重组北上抗日先遣队，向皖南出击，开辟新区，北上抗日。同时，希望此举吸引和调动部分敌人兵力，以配合中央主力红军长征。

红军就要远行了，前途未卜，恶战频繁。缪敏为方志敏整理行装；方志敏安慰即将临产的妻子。方志敏交代妻子要当心身子，随手拣出几件衣服，说行军打仗带不了，藏在山洞里来年夏天再穿；缪敏叮嘱丈夫小心肺病复发，祝他一路平安。谁能想到方志敏这一走，竟成永诀。

方志敏率领着部队踏上了九死一生的征途。敌人调集重兵分成多路围追堵截。方志敏在寒冷的冬季转战疆场，艰苦卓绝。终因寡不敌众，陷入敌人重重包围之中。1935 年 1 月 29 日下午 1 时，方志敏不幸被捕了。

1935 年 6 月，缪敏也不幸被捕，随后被国民党当局判了无期徒刑，关押在南昌女子监狱。敌人甚至连孩子也不放过，派兵到缪家村去抓方英，让外婆带着孩子去县城坐牢。才 4 岁的方明当时住在德兴姑姑家，也由姑姑陪着被押至上饶、弋阳。乡亲们为了救出方志敏的"崽"，不怕受株连，多方奔走，设法营救。两个孩子终于在关押几个月后，由乡民们具保才放了出来。临走要求"随传随到"。

方志敏家人留影（前排中为方母金香莲、右为方妻缪敏、左为女儿方梅；后排左为长子方英、右为次子方明）

此时，在狱中受尽折磨的方志敏，还时时惦记着贤妻爱儿。但当敌人以夫妻父子感情企图诱其投降时，方志敏则严词拒绝，说："我失去了自由，妻子和儿子哪还能顾得到，我只有抛下他们。"1935 年 8 月 6 日，年仅 36 岁的方志敏英勇就义于江西南昌。

1937 年抗日战争爆发，经八路军办事处项英、陈毅亲自出面交涉，缪敏才被从监狱释放。闽北省委决定缪敏带着两个儿子去延安，女儿方梅寄养在农民家里。1938 年春末夏初，缪敏母子三人历尽艰难，千里跋涉到达延安。毛泽东在窑洞里亲切接见了李祥珍（缪敏当时的化名）。谈话中，毛泽东笑容满面地弯下腰摸着方英的头问："你知道你爸爸是谁吗？"8 岁的方英自豪地抬起头说："我爸爸是方志敏，你还不知道？"毛泽东听了连连点头高兴地说："是的，我知道，我知道的。"他亲切地勉励他们要好好学习本领，长大了，为爸爸报仇。毛泽东还题词赠缪敏："没有什么困难可以阻碍人们前进的，只要克服，并加坚持，困难就赶跑了。"

缪敏在随后的抗日和解放战争中，先后担任延安女子大学政治指导员，二野华北七纵队供给部副政委，冀鲁豫二地委社会部副部长等职务。解放后，缪敏回江西工作，先后担任了上饶地委组织部长兼妇委书记，江西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1977 年 7 月 9 日，缪敏因病医治无效，在南昌家中溘然逝世，享年 68 岁。

（责任编辑　洛　松）

“东北叛党投敌集团”冤案与邹大鹏之死

● 严 石

所谓“东北叛党投敌集团”，是“文化大革命”中阴谋家康生一伙炮制的一桩假案。

康生一伙为打倒一批原籍东北的党、政、军领导干部，蓄意把“七七”抗战之前成立的中共外围组织——东北救亡总会，颠倒黑白地诋毁为“东北帮”、“东北叛党投敌集团”。原总会领导成员，都被打成叛党投敌分子，不少人被迫害致死。1967年4月29日被逼服药自杀身亡的原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邹大鹏，就是其中的一个。

因为我曾长期在邹大鹏同志领导下工作，我愿意将我所知道的关于康生炮制“东北叛党投敌集团”和邹大鹏之死的一些情况，作简要回顾，以示对老领导邹大鹏的怀念。

关于东北救亡总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不甘当亡国奴的东北各界人士纷纷流亡关内。东北知名爱国人士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杜重远等，赴南京向蒋介石请愿。当得知蒋介石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要蒋出兵抗日收复东北无望时，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王化一等十人，在张学良秘密支持和领导下，成立了东北民众抗日救国会，中心任务是秘密组织支援东北抗日义勇军。

1933年3月，东北热河失守后，蒋介石下令“侈言抗日者杀勿赦”，张学良下野旅欧，“救国会”于同年7月被国民党政府下令取消。原“救国会”领导人高崇民、阎宝航、王化一等，为继续开展抗日斗争和支援东北义勇军，于同年“九·一八”纪念日，在北平秘密召开了“复东会”成立大会。

1934年1月，张学良旅欧回国，4月蒋介石又下令取消“复东会”。翌年9月，张学良在西安就任西北“剿总”副司令代理司令，高崇民、阎宝航、卢广绩、杜重远等多次向张学良进言，与杨虎城将军联合，停止和退出内战，以西北作为联合各派力量进行抗日的根据地，联苏联共，接受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挽救民族危亡。这对张学良的思想转变以至爆发“双十二”事变，都起了促进作用。

1936年“双十二”事变后，张学良被蒋介石囚禁，在北平的十几个东北救亡团体，虽与东北人民抗日救国联合会进行了联合，但未统一。这时，周恩来代表中共中央通过“救国会”负责人之一张希尧，告知中共地下党员苏子元，向苏的老友高崇民传达周恩来的意见：“西安事变虽然迫使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的要求，但是他的反共本质没有改变，他压制民主，排除异己的政策还会继续，如果没有人民的推动，他联合抗日的许诺是不会轻易兑现的。我们下一步就是要推动蒋介石兑现他许下的诺言，实现联合抗日。”并建议说：“首先要把东北军和东北各界人士组织起来，把东北救亡团体联合起来，形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抵制蒋介石的分化

瓦解，争取民主，实现联合抗日，争取张学良将军早日恢复自由。”

高崇民根据周恩来这一意见，立即与刘澜波、栗又文以及北平各东北救亡团体有关人士商讨救亡大计，一致同意成立统一的东北人民救亡团体。高崇民又去南京、上海，与阎宝航、杜重远等商谈筹建统一救亡团体事宜。当时正值周恩来在上海，在周恩来的关心和亲自指导下，统一救亡团体的名称，定为东北救亡总会，简称“东总”。1937 年 4 月，在上海召开筹备会，6 月 22 日，在北平东北大学礼堂召开成立大会。“东总”最高领导机关常务委员会，由高崇民、阎宝航、杜重远、卢广绩、刘澜波、栗又文、张希尧、邹大鹏等三十余人组成。

“东总”成立两周后卢沟桥事变爆发，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正式形成后，“东总”从北平迁至南京芦苇营阎宝航家。“东总”根据周恩来的进一步发展统一战线、扩大团结范围的指示，把“东总”领导机关由执行委员制改为主席团制，并吸收与国民党联系较广的知名爱国人士王化一、王卓然为主席团成员。在此期间，邹大鹏曾有一段时间，被“东总”派去绥远抗日将领马占山的东北挺进军主管军械处。

1941 年皖南事变后，蒋介石于 1942 年秋下令撤销“东总”，但“东总”机关刊物《反攻》，因“东总”迁重庆后以王化一为发行人、王卓然为主编，并因在国民党内政部进行过登记而依然合法存在。周恩来高兴地说：“只要《反攻》的牌子存在，以这个刊物向蒋介石斗争，蒋介石就很难出卖东北”。在重庆的“东总”领导人更是千方百计坚持《反攻》这一阵地。高崇民租赁的住楼，挂起反攻杂志社的牌子，高家便成了反攻杂志社的社址，阎宝航租住的楼，则成了“东总”和中共地下党重要活动据点，不仅周恩来经常在此秘密召开会议布置工作，董必武、叶剑英也多次在此主持重要会议。东北军和东北抗日民主人士，更是这里的常客。

1944 年，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处于大规模战略反攻阶段。高崇民、阎宝航、陈先舟等“东总”领导人，根据周恩来建议，调集干部，作重建新组织的准备。1945 年，新的组织定名为东北民主政治协会，但仍简称“东总”以示它是东北救亡总会的延续。《反攻》编辑部也进行改组。新“东总”建立后，坚持秘密活动的原则，如将日本在东北的军事、政治、经济情况，提供给苏联等。“东总”的工作一直坚持到东北解放。

历史事实说明，东北救亡总会是抗战前在周恩来指导下成立的中共外围组织，长期在周恩来指导下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其领导成员中不少是我党秘密党员，如刘澜波、阎宝航、高崇民、邹大鹏……等。“东总”从成立到东北解放，对开展扩大我党统一战线，团结东北各方抗日力量，支援东北抗日联军，向革命圣地延安输送干部以及揭露蒋介石，营救张学良、杨虎城等方面，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但是，早在 1942 年延安整风审干时，东北救亡总会就曾被康生打成“红旗特务机关”，把“东总”领导人如高崇民打成“红旗特务”，甚至把经“东总”介绍去延安学习或工作的干部，也都打成“特务”、“特嫌”，刘澜波当时就遭隔离审查。1944 年初，周恩来从重庆回到延安听说此事后，郑重指出：“东北救亡总会是我党领导的外围组织，哪有什么‘红旗特务机关’，一定要甄别！”但是康生仍顶着不办，直到 1945 年日本投降后，迫于形势，才不得不把那些东北干部逐步释放或解除隔离。

所谓“东北叛党投敌集团”

1966 年 5 月 4 日至 26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上除通过了震骇世界的《五．一六通知》外，引人注目的就是 5 月 18 日林彪在会上关于历史上的“政变”的讲话，这篇为打倒一批中央领导干部造舆论的“政变经”，就是由康生主持与陈伯达合写的。“政变经”中不仅点名批判了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还点了吕正操和中央党校校长林枫的名。说“彭真在东北和林枫、吕正操搞桃园三结义”。康生、林彪一伙胡说：“东北地区的党、政、军内隐藏着一股以张学良部下、政客、幕

僚为主体的叛徒、特务、反革命分子结成的反革命势力”，说“这股反革命势力分布很广，钻进来的时间很长，隐藏得很深，爬得很高，他们受国民党机关的派遣，打入我革命阵营内部”，还说“东北帮在国民党军队向东北北方进犯时，倒戈投敌，企图搞掉林彪指挥部暗害林彪。这是彭真、林枫、吕正操反党集团经过长期预谋，妄图叛党投敌的一起重大反革命案件”。

就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的五月间，康生一伙首先逮捕了时任大连市文史馆馆员的秦诚至。秦是国民党少将参谋，1946年曾以国民党“东北行辕”代表身份，去哈尔滨与我方谈判交换战俘问题，邹大鹏当时在哈尔滨任我东北局社会部部长，在邹的安排下，由吕正操，张学思、解方、高崇民、阎宝航等人接待了秦诚至。康生一伙逮捕秦诚至后，硬逼秦承认他当年去哈尔滨，是对吕、张、解、高、阎等人进行策反，而这些人接受了他的策反。于是，一个包括刘澜波，贾陶、万毅等42人的所谓“东北叛党投敌集团”，就这样被炮制出来了。接着就在“中央专案办”“二办”的领导下，成立了“吕正操、解方专案组”，内称“东北叛党集团专案组”。

1967年12月4日，吉林省造反派组织——“东方红公社”和《长春日报》的“敌百虫战斗队”以及吉林教大的“毛泽东主义红卫兵”，联合印发了一份四开小报，小报的通栏大字标题是：《东北救亡总会是什么货色?》。该报不仅点了中央“二办”审查的“东北叛党集团”，还点了东北地区的“东北帮”。其中有些人便是《东北救亡总会》的领导成员，如高崇民、阎宝航、刘澜波、于毅夫、栗又文等，该小报认定这些人，“抗日是假，反共是真，爱国是假，卖国是真”。

1968年“文化大革命”进入“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吕正操、解方专案组”、亦即“东北叛党集团专案组”，又向康生、林彪提出当时在东北地区工作的我党中高级干部九十多人的线索。于是沈阳军区又成立“五办”，立案审查所谓“叛党投敌集团”，目的是搜集吕正操、解方的“罪证”，于是这些人先后遭军事监护或逮捕人狱，其中有些人是康生直接下令逮捕的。同时“中央专案办”领导下的“东北叛党集团专案组”，也先后逮捕了吕正操、解方、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刘澜波。其中张学思、阎宝航、高崇民、贾陶、车向忱、洪钫、杜者衡、王树章等先后被迫害致死。

康生一伙抛出的所谓“东北叛党投敌集团”的“罪证”材料，一是由吕正操、解方、万毅、张学思、贾陶、刘澜波等42人，为声援1946年1月周恩来在重庆代表中共中央提出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两将军的要求，联名发给蒋介石和旧政协要求释放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电报；二是吕正操、高崇民、阎宝航、徐寿轩、万毅、张学思、陈先舟、车向忱等人为纪念“双十二”十周年分别发表的文章和有关报道，从中使人不难看到康生一伙炮制“东北叛党投敌集团”的目的，就是攻击诬陷周恩来，打倒一大批当年在周恩来领导下从事东北抗日救亡活动的同志，这一冤案，在粉碎“四人帮”后的1978年11月才得以平反。

邹大鹏之死

“文化大革命”前，邹大鹏是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邹原籍辽宁省辽阳市，1925年参加革命，解放前长期在东北从事地下工作，为东北的抗日斗争和东北的解放，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正如中共中央为邹大鹏平反昭雪的悼词中所说：邹大鹏“在北满深入群众，积极进行抗日斗争，参与组织领导了哈尔滨著名的反日筑路运动”。“他在白区秘密复杂的环境下，建立了从陕北到华北敌战区的秘密交通，为安全护送中央负责同志做出了特殊贡献”。“抗日战争时期，他在开辟平津和东北地区的情报联络工作方面作出了成绩”，“日本投降后，他不畏艰险，两次深入虎穴，取得了重要情报，对我军解放东北起了有力的配合作用”。建国以后，邹大鹏历任国务院情报总署署长，中央军委联络部部长，“他忠实地、全面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和政策，在党分配他的工作中做出了重大贡献”。

邹大鹏作为中央调查部常务副部长，长期带病坚持工作。他工作严谨细致，作风民主；他

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他德高望重，深受下级的爱戴和尊敬。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的1966年12月19日，中央调查部部长孔原被康生一伙诬陷打倒，周总理代表党中央立即指定邹大鹏主持部的工作。周总理并在1967年4月28日与康生、李富春一同接见有邹大鹏参加的中央调查部五十来个代表时，重申了这一指定。但是就在周总理这次接见的第二天晚上，邹大鹏夫妇竟服药自杀身亡了。噩耗传出，令人肠断心碎。但在当时的“革命风暴”之下，凡自杀身亡者，不问其因，一律视为“畏罪”，邹的死自然也不例外。但畏的什么罪？除治罪于邹者外，谁能说清楚？只知调查部内立即成立了“邹大鹏专案组”，对邹立案审查。

“文化大革命”进入“清队”后的1968年11月，中央调查部举办“毛泽东思想大型学习班”，实则进行“清队”。被“清”的首要对象，除已被关押的部长孔原，就是已死一年近八个月的邹大鹏。既有《邹大鹏为什么这个时候自杀?》的大字报，又有“揭邹”展览。“专案组”抛出的材料，更是颠倒黑白、无中生有地给邹大鹏戴了“叛徒、特务、伪君子、老反革命”四顶大帽子。胡说“邹大鹏是‘东北叛党投敌集团’重要成员之一”，“邹大鹏在这个集团中，利用他的地下工作的关系作掩护，为叛党集团搜集情报，给叛党集团和国民党穿针引线”，捏造“国民党曾派专人给叛党集团成员送了委任状”。甚至诬说“刘少奇叛变出狱后住在邹大鹏家，刘少奇三次叛党，邹大鹏追随叛变”。

这些诬蔑，都被无情的历史事实一扫而光了；康生是炮制“东北叛党投敌集团”的罪魁祸首，也无人再置疑。只有一个难解的谜是：1967年4月28日，康生陪同周总理、李富春接见有邹大鹏参加的调查部五十来名代表之后的第二天邹大鹏夫妇便自杀身亡，直接原因是什么？人们注意到，周恩来在接见中重申了党中央指定邹主持调查部工作的决定，表示了对邹的信任和安抚；也注意到康生在接见中谈到要学会调查分析干部材料时，对邹大鹏含沙射影地说：“有的看来好像没有问题，但一调查就有问题”。据知，就在第二天的午后，邹大鹏还接到了康生的电话，康生说了什么不得而知。无可争辩的事实是，当夜邹与妻子自杀身亡。因此，我特别同意，在研究“文化大革命”这段历史中，千万不可忘却“康生究竟是个什么人”这个课题。

（责任编辑　洛　松）

1947年，邹大鹏在哈尔滨与东北行政委员会成员合影。右起：邹大鹏、高崇民、冯仲云、李立三、吕正操、张学思、钟子云

红色高棉时期柬埔寨华人的遭遇

● 齐 坚

提起当代东南亚的排华事件，人们会首先想到不久前为国际社会所广泛关注和愤怒谴责的印尼“五月暴乱”。实际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半个多世纪，东南亚各国的排华事件便一直此伏彼起，柬埔寨华人在波尔布特集团统治下的遭遇更是一起鲜为人知的排华事件。

1975 年前的柬埔寨华人

柬埔寨古称扶南、真腊或吴哥，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早在中国南宋时期就有从事海上贸易的华商在此居留，称“唐人”或“新唐人”。

根据法国殖民当局 1921 年的人口调查，在 1890 年时，柬华侨人口有 13 万。本世纪 20 年代、30 年代后期和二战后初期，出现过中国人移居柬埔寨的三次高潮；特别是在战后的 1946—1949 年期间，华人由 30 万猛增到 42 万，占全柬 574 万人口的 7.4%；1975 年红色高棉领导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建立民主柬埔寨国前夕，则达 60 万之众。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在经历了民主柬埔寨政权（1975－1979 年）的短暂统治后，华人人口数量却大幅下降到 30 万左右。

柬埔寨华人在当地社会中担当的角色，是历史上长期形成的。尽管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去看，占全国人口极少部分的华人大多处于剥削者的地位，但受柬埔寨国民虔诚的佛教信仰和华人儒家文化的调和，阶级矛盾未达到激烈冲突的程度。不幸的是红色高棉在对柬埔寨社会进行分析并制定政策时，普遍拥有商人身份的华人被红色高棉划入“资产阶级”阵营，从而使其面临着比高棉民族更为严峻的阶级斗争的压力。红色高棉政权普遍宣传“华侨都是资产阶级，有史以来都是吸柬埔寨人的血”，贡布、波萝勉、柴桢、磅湛等省还发生过逮捕从城市来的华人或生长在农村的进步侨胞及华侨教师的“红色恐怖”，许多人被处以死刑或苦刑。1974 年 4 月 28 日，便发生了著名的“桔井事件”：大批从前线回来的柬红色高棉军队开进桔井市中心，把轻重机枪摆在街上，对准华人的住宅，限令全市华人立即到农村种田，并拘捕了罪名是煽动华人回国的嫌疑分子一百多人，这些人大部分受了苦刑，有的甚至被折磨死。

暴政与劫难

1975 年 4 月 17 日，以柬埔寨民族解放军占领金边市为标志，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力量夺取了全国政权，直到 1979 年 1 月 7 日金边被侵柬越军攻占时止，在红色高棉（柬共）执

政的三年零八个月中，柬埔寨人民经历了一场惨绝人寰的空前劫难，而华人社会更是首当其冲。

城市居民遭到大驱逐、大掠夺、大迫害

红色高棉接管城市，夺取政权后作出的第一项重大举措，就是立即强行将城市居民全部“疏散”到农村去。这项措施因其涉及人口之广、破坏之烈，而成为波尔布特集团暴政的正式开场。

被“疏散”的城市居民主要是二百万金边市民和难民，其中有华人约40余万人。4月17日，身着黑衣的红色高棉军队(俗称“乌衫兵”)进入金边，受到市民包括华人的热烈欢迎，人们载歌载舞、奉茶送饭，庆祝和平的到来。可是不久，军队便以“美国飞机要来轰炸”为借口，通过广播喇叭要求人们立即疏散到农村去躲避三两天，并派了一些军车帮助市民搬家。到了次日，因人们心怀疑虑，响应者寥寥，军队便全城鸣枪，用武力威逼市民按指定路线立即撤出城里；一周后，全城数百万人悉数撤走，金边变成了一座空城。在撤出金边的过程中，演出了无数人间惨剧，如有的家庭因等外出未归的亲人，便遭杀害；有的合家不愿离城而躲在房内，竟遭炮击；正在抢救病人的医生、护士只因延误了撤离时间，也死于枪口之下。因出城匆忙，所带食品、行囊不多，百万市民在炎炎烈日下颠沛流离，忍饥受累，被驱往遥远未知的他乡，许多人染病倒毙途中。平日不干重体力活的华侨商人和家庭主妇(尤其是缠过小脚的老妇人)，更经受不住旅途的折磨，死亡比例更大。这次“疏散”行动一直持续了好几个月，疲惫不堪的金边市民才先后到达各自的目的地，被指定在偏僻闭塞的乡村中或荒无人烟的深山密林里安家落户，开始农垦生活。但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具去搭建赖以寄身的茅棚，“安卡”(柬语“组织上”之意)分配的口粮又严重不足，加之医药奇缺，结果许多人又死于霍乱、水土不服和虐疾。

除金边外，马德望、磅湛、贡布、柴桢、实居、菩萨、磅清扬、茶胶、磅同、磅逊等其它大、中、小城市的居民，也被迫向农村和深山密林地区迁移。如靠近泰国边境的马德望省珠山市，解放后不到几天，全体市民就被勒令退出城去；因市民大多数都不愿走，红色高棉军队便规定出最后期限，届时如不退出即行枪决，且出城之后不准返回。

红色高棉军队每接管一座城镇，就立即破坏当地的市场。他们或宣布大减价，把物价削减90%以上，或直接捣毁所有的零售摊店，并且很快就将货币取消。城市商人(几乎均为华人)遭此掠夺与打击，顿时便陷入一无所有的境地。

显然，如此大规模地驱赶城市居民下乡务农，既非为着防空，也不只是单纯为了解决粮食匮乏问题。实际上，红色高棉是想通过此举彻底剥夺“资产阶级”的财富，消灭城乡差别，实现“波尔布特式的高度纯洁的社会主义社会”(依波尔布特集团所为，城市居民即使是产业工人，亦一概受到波及，并无例外。只有少数城里必需的车床技工、纺织技工、华语翻译、厨师等，才得以回城工作)。自1976年起，为了进一步取缔“资本家”的财产，加强对人口的控制，红色高棉还对从城市转入农村居住的华人进行再次的迁移。迁往马德望省各处农村去的华人甚多。该省原是鱼米之乡，但遭连年战火的破坏，加之外来人口太多，竟成为全国粮荒最严的地区，华人死亡率高达80%以上。

农村合作社中的超强度劳役与饥荒

柬埔寨历史上一直是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基础极为薄弱，要建立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全国的工业化是必不可少的。但红色高棉建国后，不是着眼于恢复和发展民族工业，而是单纯地执行“以农立国”的政策；在组织人民从事农业生产时，又不切实际地提出“超大跃进”的口号，并实行一系列集中营式的残暴管制措施，给广大人民包括华人带来无尽的苦难。

在将城市居民赶往农村后，柬埔寨几乎已是“全民皆农”了。为实现“超大跃进”的理想，民主柬埔寨政府于1976年制订了全国稻谷增产指标：每公顷单位面积产量3吨；1977年，又将

指标增为3.5吨到7吨（而原先全国平均每公顷产稻仅为1.2吨到1.4吨）。为了完成高指标，基层生产单位除了虚报产量外，还通过解放初期即已成立的互助组和合作社组织，强化对农民的奴役与压榨：

第一、延长劳动时间。在合作社里，社员每天必须劳动十二三小时甚至十五六小时。通常凌晨四点钟就要下地干活，夜里九点半才许收工，说是为了“不分昼夜地尽快建成社会主义”。

第二，增加劳动强度。合作社社员不仅劳动时间长，而且容不得有丝毫的偷闲，社员只有到了进餐的时间，才有休息的机会。为监督社员无休止地劳动，社里还通过密探或设立自行车游车队，到田间地头巡视，不准社员聊天或歇息。平时，社员除大病不起者外，小病不准请假，违者重罚。

第三，无休止的思想灌输。即使在繁重的劳动之余，“安卡”也要农民集中起来开会，接受千篇一律的宣传灌输，如讲，到了1977年农民可以每10天吃一次甜汤；到了1980年则可3天吃一次；15年实现全国现代化等等。

第四，开办“大食堂”。初时，农民还是以家庭为单位开小灶，过了不久，即被迫全部吃“大食堂”。“大食堂”开始尚能供应一顿稀粥、两顿米饭（通常是在稻谷收获期），后来便仅剩下两顿稀粥了。造成粮荒的原因是，“安卡”将丰收后的稻谷大部运走了，只给农民留下大约仅够三四个月的米粮。为了弥补伙食的严重不足，有些人在家里和住处周围喂养家禽家畜，种植蔬菜，但结果都被“安卡”巧取豪夺了。一些农民经不住饥饿，到合作社的果园和菜园里偷东西吃，如被发现，轻则罚绝食一、二天，重则处死。

繁重的劳役和严重的饥荒，摧垮了无数华人的健康身体，人们因缺医少药而大量死亡。但是，红色高棉为防范国外敌对势力的“渗透，”对人民的人身控制甚严，人民没有通信自由，甚至还被剥夺了拥有收音机的权利。没有特别的通行证，他们是绝对无法私自离开所属乡村的；若有敢越雷池一步者，即便初犯，被抓到后亦必惨遭毒打，命丧半条。在农奴式制度的禁锢下，华人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只能苟且偷生。

“清理阶级队伍”，肃反扩大化

民主柬埔寨成立之初，城市中的华人群体尽管遭受了迫迁的厄运，但尚未像忠于西哈努克亲王的“自由高棉”及朗诺部队残余分子那样直接遭到成批的屠杀。然而不久，由于红色高棉实行的极“左”政策导致社会矛盾尖锐化，加以内部派性斗争不断，波尔布特集团遂屡屡发动政治运动，以巩固自身的统治；在一再进行的“清理阶级队伍”和肃反运动的大拘捕、大屠杀中，华人亦每每受到株连。

1977年6月，柬共下达文件指出，国内外公开的敌人已被消灭，但目前出现了“阶级斗争的新动向”，要特别注意两种人：散布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言论的人，他们是反革命的后备军；懒惰的人，他们是剥削分子的根苗。同年柬越交战及翌年湄公河以东地区发生“三·二三”兵变后，波尔布特集团随即在全柬范围内反复展开了残酷的“肃反”大屠杀，民柬大批高级军官逃往越南，韩桑林、谢辛、洪森等人就是在此时投靠越南与红色高棉决裂的。被大批杀害的不仅包括越侨、政治上的反对派及嫌疑分子，而且殃及广泛的人群：资本家、商人、知识分子、医生、教师；一切患有不治之症者；干不了繁重的体力劳动或经常请假被认为懒惰怠工者；在日常生活中敢于流露对干部或现实不满、意见稍有不同或不服领导者。最后，在暹粒省和菩萨省等地，还发展到屠杀一切城市移民的空前严重程度。

华人因多属商人，且知识分子比例较大，故受害程度尤深，即便是柬共内部的上层华裔干部如符宁、胡荣、张东海等，最终也遭到“清洗”，不能幸免。而在张东海（分工主持商业部日常工作的商业委员会委员）于1978年3月被捕后，全国各部门、工厂的华裔干部、党员以至翻译员，都一批批地失踪，遇害了。更有甚者，华人在家中讲华语，亦会被疑为搞特务活动而被捕。

诚然，波尔布特集团的暴政罄竹难书，以上所述仅是举其荦荦大端者而已。其它如没收私人财产，实行无邮政、无货币、无商品的“共产主义”措施，都给柬埔寨人民和广大华人带来极大的危害。尤其是在禁止自由恋爱、婚姻由“安卡”作主的“配给制度”下，华侨少女被强行婚配给伤残军人的不在少数，许多人因此而自尽。

求助无门

众所周知，红色高棉的兴起和“民主柬埔寨”政权的建立，正值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时期，极左的国内外政策，必然地反映在对待柬埔寨华人问题的处理上。在华人遭受此种大劫难时，中国政府是否曾经施加影响、予以制止？

笔者掌握内部资料无多，不得而知。但从所见的众多难民回忆资料中可以肯定，在他们财产蒙受重大损失、生命受到威胁时，柬埔寨华人确曾基于自己的中国侨民身份，寻求过祖国政府的解救。然而，他们未能看到来自中国方面的任何公开的正面的反应。当时，华人所能接触到的祖国亲人仅仅是中国援柬专家，但当他们向这些祖国亲人投诉的时候，得到的回答则不能不使他们失望，因为回答均不外乎：第一种，要求华侨“顾全大局”、要“忍”、“忍”下去；第二种，认为华侨过去是剥削阶级，多数是资本家，现应好好接受所在国政府劳动教育，把自己改造成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第三种，则干脆立即避开。华人完全处于求助无门的境地。

应当指出，中国在柬埔寨华侨问题上所采取的不闻不问的“不干涉”态度，尽管有其内政、外交上的种种原因，其引发的后果却是极其严重的。在柬华人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时，不免发出感叹：“我们枉有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祖国’——华侨的寄托、精神支柱，却无能为力照顾得了海外华侨”；“热爱祖国却被祖国遗弃，在侨胞有难时祖国不伸以援手，这种心情是怎样的难受和失望”……无数柬华难民的这种表白，正反映了他们爱恨交织的矛盾心态。如何医治柬埔寨华人的心灵创伤，无疑至今仍是个遗留在国人面前的严肃的课题。

（责任编辑　吴　思）

代购代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羡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费
牛棚杂忆	季羡林	19.50	3.00
思　痛　录	韦君宜	13.00	3.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忆　周　扬	主编：王蒙 袁鹰	36.00	4.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 290 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孔德懋从圣府闺秀到社会活动家

● 邱 健

今年是孔子诞辰2550周年，笔者特地来到北京西郊一栋乳白色公寓中，访问了孔子七十七代嫡裔孔德懋女士。她虽已耄耋之年，但至今仍满头青丝，精力充沛，思路敏捷，保持着圣府闺秀儒雅谦和的仪态和风范。在她的京白里，不时掺杂着曲阜乡音，显得格外朴实亲切。在她简朴客厅的东墙上，悬挂有她在1990年与早年移居台湾的胞弟、七十七代衍圣公、台湾国民党"总统府资政"孔德成在日本相逢时的合影，西墙上挂着孔德成赠她的墨迹："风雨一杯酒，江山万里行。"

愿孔子学说给世界带来和平与繁荣

当笔者访问孔老时，正逢她从人民大会堂参加纪念孔子诞辰2550周年和孔子艺术塑像展示座谈会归来，脸上洋溢着一股喜气和兴奋之情。她说："孔子一生为实现以仁爱为中心的'博施于民　而能济众"的政治抱负，奔波于列国之间，坎坷曲折，历经磨难，壮志未酬。老年退而施教，弟子三千，诲人不倦。孔子把他以仁爱为中心的教育思想和富国强民的政治抱负，寄托在他的学生身上。期以后人，实现其仁爱主张，这就是传之于数千年的中国儒家学说的开始。"

在谈到孔子这尊全身金像时，孔德懋老人说："我在参加座谈会时，看到这尊塑像，久久凝视，百感交集。孔子一生期望泛爱民众，实现他仁爱主张，能使人民安居乐业。但在烽烟战乱的春秋战国时代又谈何容易！但2550年后，在孔子诞生的这块大地上，他一生追求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此刻，缅怀先人，更感吾辈任重道远。当今改革开放事业正取得举世瞩目之时，我们更应该继承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中的精华，为现代化服务。"

雕塑家钱绍武先生在文化界久负盛名，既长于雕塑艺术，又博学多才，儒学功底深厚。他采纳了各界意见，融会贯通，运用中西雕塑技法，终于塑造成功一尊可独尊于历代孔子塑像之林的、具有中国民族文化传统特色的孔子全身塑像。

圣府闺秀的寂寞岁月

孔德懋老人是山东曲阜"天下第一家"——阙里世家的七十七代嫡孙女。她的父亲孔令贻（七十六代衍圣公）5岁世袭衍圣公爵号，47岁时病逝北京。当时孔德懋仅两岁，姐姐德齐4岁，父亲去世五个月后小弟孔德成才出世。孔德懋从出生到17岁出嫁，一直生活在孔府的深宅大院中，严遵祖训和家规，过着几乎与外界隔绝的生活。孔府家规极严，不轻易买外面的东西，所以她和姐姐的童年过得非常单调，没有什么玩具，无聊时只好常常站在孔府内宅高墙边的土墩上，攀着墙头偷看外面街头的景色和熙熙攘攘的行人以为乐。日常生活除读四书五经外就是弹弹七弦琴。

为了保持圣府的古朴家风，家常服饰也极其简陋。她和姐姐的闺房床上用品，只铺着家织的蓝底白花土布床单，被面也是用棉织花布，连

门帘、帐幔、枕面都从不绣花，只是一色庄重的蓝黑色。虽然她们也有不少华丽的衣服，但平时只能放在箱子里，除节庆大典外很少穿。平日穿的衣服只是一身素色大褂，黑布鞋，头上梳根大辫子，能系条红头绳就算是装饰了。由于平时不出门，对外界事物一无所知，以致她们把亲戚送来的雨鞋当作时髦鞋穿，不分晴雨，穿上就不肯脱。

孔府的家学非常重视书法，她们从小就要练习写字，弟弟孔德成七岁时就有人向他求字，当弟弟忙不过来时，孔德懋也常为他代笔。如今孔德懋就写得一手好字。“中国孔府菜谱”、“孔府酒店”、“北京孔府酒家”、“孔膳堂”等许多题字，都出自她的手。至今在她书房中还放着一大叠别人请她题字用的宣纸。

姐姐德齐出嫁后因夫妻不睦吞金自杀。孔德懋也在只有十七岁的时候，就远嫁前清翰林柯劭忞之子，走出闺门又入深宅，过着豪门少妇的寂寞生活。直到 1949 年建立了新中国，她才走出了固守大半生的“金丝牢笼”。

孔德懋老人不愿提及“十年浩劫”和“批林批孔”运动那段在劫难逃的特殊经历。1979 年，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关怀和帮助下，她终于回到了阔别 40 年之久的曲阜故里，重温乡情。作为孔子在大陆的唯一嫡亲后裔的孔德懋，对她从 1983 年起连续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一事深有感触。她说：“如果不是结束了恶梦般的十年动乱，对孔子也像对其他历史人物一样，作出了历史的、全面的、公正的评价，我作为他的后裔，能享有今天的荣誉，真是不可思议的事。”

著书叙家史

我谈及她前些年撰写出版的《孔府内室轶事》和电影文学剧本《孔府秘事》成为国内畅销书一事时，不禁勾起她对往事的伤感。

孔德懋父亲孔令贻是七十六代衍圣公，先后娶过三房妻室，均无生育。最后娶的一房夫人是一位陶姓北京富商的小姐，但陶夫人进门后，到孔令贻 43 岁时仍无生养，她的父亲便将陶氏的陪嫁丫头王宝翠收了房。按照封建家规，收房丫头的地位与家奴相同，但她却先后为孔令贻生了三个子女。陶氏生性残暴善妒，平时对宝翠就很虐待，尤其是当孔令贻病逝五个月，王宝翠生下遗腹子孔德成七十七代衍圣公，才十七天，陶氏畏惧宝翠会随小公爷的诞生而母以子贵，密令心腹给宝翠端去一碗毒药让她喝下。宝翠服后出血不止，随即死去。当年目睹这场惨剧的女仆唐氏后来回忆说：“小圣人的娘死得好惨呵！她服毒时对我说：‘我这辈子没有过上一天好日子，倒不如喝下这碗毒药以了残生，只是盼望在死以前能再见到我的三个亲生儿女’……可是，宝翠在死前连这起码的愿望都未达到，就结束了她苦难凄凉的一生。”

孔德懋老人说：“我以亲身经历的，世人鲜知的孔府内宅生活公之于众，一是为后人了解和研究中国封建社会，封建礼教提供佐证和参考；二是为了怀念七十多年前含冤死去的母亲。但，我认为这与伟大先哲孔子的仁爱思想与形象是丝毫也没有关系的。”

传播儒学文化的友好使者

自 1979 年以来，孔德懋先后五次访问日本，为研究和传播儒学文化而奔波。

早在公元三世纪前后，儒学文化即传入东

一九九九年新塑的孔子金像

邻日本，对日本民族的道德观与教育观有很大影响。据知日本现有孔庙三十多处，孔德懋先后参观过其中多处，亲眼见到在这些孔庙中，至今仍然保存着历代不少中日交往纪念孔子的各种珍贵文物。在东京汤岛圣堂大成殿内供奉的孔子木像，就是我国明朝遣日使朱舜水东渡日本时作为礼物带去的，仍保存完好。长崎市的孔庙内不仅供奉着孔子像，还有孔子弟子72贤人像。日本明仁天皇还特意巡视过佐贺县多久市新修复的孔庙，可见日本国人对孔子及其儒家学说的重视与推崇。在日本有关传播、研究孔子学说的著作有很多，我在孔德懋老人的书橱中就看到日本著名学者井上靖写的《孔子》一书，据说这本书在日本曾再版数次，出售达四十多万册。

日本的祭孔活动也很隆重，一般是在一年中的四月和十月举行两次。孔德懋老人1991年应邀赴多久市孔庙秋季祭典以及在那里举行国际儒学讨论会时，她在演讲时激动地说："孔子创始的儒家学说历时两千五百余年，至今对推动社会进步有一定作用。孔子创立的儒学文化不仅是中国的，也是属于世界文化范畴的。"

海上生明月 天涯共此时

1990年11月24日，孔德懋首次应邀赴日本访问时，与正在日本千叶县丽泽大学讲学的弟弟孔德成不期而遇。相别已42年之久的姐弟俩，在短暂的相聚中，真是"执手相看泪眼"，"激动异常，道不尽的别后沧桑岁月，诉不尽的骨肉分离之情。在归国的飞机上，孔德懋老人紧紧抱着与弟弟合影的像册。仿佛弟弟已同她一起回到生他养他的故乡。

孔德懋比孔德成大两岁。孔德成出生十七天母亲就去世了，大姐德齐又早故，幼年时的德懋、德成相依为命。德成把二姐德懋当成最亲的亲人，未曾因些微小事拌过嘴、吵过架。孔德懋遵命远嫁北京时，小弟哭成泪人，舍不得分离，最后不得不含泪抱着公鸡送二姐上了花轿。他把一件家传一千多年的视为孔府无价之宝的大楷木如意，送给孔德懋作为嫁妆。这个像写字台台面般大小的如意上，精工雕刻着"文王百子图"，100个小孩子姿态各异，栩栩如生，孔德懋出嫁后，小弟德成为自己起了个字：孑余。这个字包涵着他在二姐出嫁后无限孤寂苍凉之感。这种深切地亲情思念，随着岁月流逝，两岸分离，在他们来往的信件中表露得更为深刻、感人。孔德懋至今还能背诵出小弟寄她的一首《怀二姐》的七律诗：

黄昏北望路漫漫，骨肉相离泪不干。
千里云山遮烟雾，搔首独听雁声寒。

另一首七律是：

铜壶漏响三更幽，独对明月感旧游。
何当再逢共话夜，晚雁声里惨对秋。

五年后的中秋时节，孔德懋随中华民族两岸文化交流代表团穿越波涛滚滚的台湾海峡，抵达祖国宝岛台湾时，再次见到了小弟德成。当天下榻台北，孔德成和弟媳就不顾高龄冒雨驱车到宾馆看望姐姐。孔德懋在看到他们的时候，似乎周围的一切都不存在了，在她的眼中和心里只存有天涯海角、地上人间剪不断的亲情。近半个多世纪中，她终于又圆了第二次相聚梦。

弟妹琪芳虽也届古稀之年，但依然保持着她当年熟悉的身影和风韵。60年前，当孔德成举行隆重的婚礼时，是孔德懋为新娘当伴娘，把弟媳迎进大门，送到小弟身旁的。这一对伉俪相敬相爱，同甘共苦，共度一生。看到他们在金婚之年并肩立在她的面前，孔德懋心中真是无限欣慰，感慨万千。

孔德懋在台湾逗留期间，除代表团统一安排的一些参观、游览活动外，她和孔德成夫妇总是在一起。她们按照曲阜家乡的习惯，吃饺子，吃馍馍。孔德成知道二姐从小时就爱吃泡馍馍，执意要她带一个合适的碗到宾馆去用，这只碗后来被老人带回北京留作纪念。

孔德懋老人回到北京后，时时刻刻都思念着远在台湾的弟弟。她不仅为半个世纪来的两次相聚而高兴，而且把希望寄托在未来。她不时把家乡日新月异的消息和回乡扫墓的活动写信告知孔德成夫妇，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他们同归故里，共祭祖茔。

浓浓桑梓情

孔德懋老人一提起故乡曲阜就充满深情。她说："我是喝曲阜水长大的，尽管那里已没有

1998年孔德懋在孔子家谱续修工作会议上发言

我们家的亲人，但我总还是惦念着那个地方。"

1979年她四十多年后第一次重返故里时，惊奇地发现她与弟弟孔德成出生的"后堂楼"景物依旧。孔德成当年在这里结婚的生活原貌也都保存完好，连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送的贺匾——"瑞应睢麟"仍悬挂在前厅。曲阜古迹——孔府、孔庙、孔林都由当地政府修葺一新，孔府、孔庙金碧辉煌。对此，她非常高兴也非常感动。她说，即使在"文革"初期，数千红卫兵冲击这块圣地时，当地乡亲们还冒着生命危险，将孔府和孔庙里的大批文物抢救出来藏匿在各处，使历代保存的孔府档案文书以及元、明、清服装、出土文物、稀世碑碣等珍宝都完好如初。孔府门前的一对大石狮子以及许多不易搬运藏匿的文物，乡亲们用木板四面护牢，贴上毛主席语录，而得以保存下来。从1977年10月至1989年7月，中央和地方政府为维护整修孔府、孔庙、孔林耗资两千多万元。同时还恢复和整修了颜(颜渊)庙、周公庙、少昊陵等古迹名胜。

1994年，她参加全国政协考察团到山东考察。考察团离去后，她独自留下参加汶上县孔庙修复落成典礼，并向一位台胞募集20万元资金，支援汶上县建设。日本大坂妇女界知名人士、企业家北条美智子是孔德懋多年老友，当她了解孔德懋想帮助家乡兴建一座儿童乐园的心愿时，慨然捐赠了100万日元。

这位曾在圣府深闺内度过少年和青年时代的老人，在历尽生活坎坷和年逾花甲之后，随着新中国的诞生，在政府的关怀下，一步步走出"金丝笼"般的封闭环境，成为一位社会活动家。她是全国政协六至八届政协委员、中国孔子基金会副会长、全国孔子研究学会名誉会长、孔子世家家谱续修工作协会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理事、首都博物馆名誉馆长等职。

为推广孔膳作出贡献

孔德懋老人除了担任上述等等职务，尽心尽力，为社会作奉献以外，在她晚年更是关心家乡经济建设的开发与发展，把孔府世代相传的孔膳推向社会，为中华饮食文化的传播增光。

孔膳是孔府饮食文化的精华。这是历代衍圣公在接待皇帝和皇室人员，向朝廷进贡或宴请王公贵戚及举行庆典家宴、喜宴、寿宴时的宴席。这些宴席上的菜肴由孔府内名厨遵照孔子"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遗训，精心制作而成，形成一种具有独特风格的官府菜，是我国饮食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过去这些珍馔不外传，只有孔府才有。改革开放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政策的开放，孔府菜才逐渐传入社会，受到广大人民的欢迎，孔德懋老人更是在这方面发挥其影响，做了不少工作。比如她亲自主持"孔府宴酒"、孔府家酒"的新闻发布会，以孔府酒庄名誉经理的身分向十一届亚运会赠送孔酒二吨，使这一名酒跻身于世界名酒之林。

孔府饮食文化的内涵，不仅指它精美的菜肴烹调讲究，风味独特，而且宴席布局、餐具、酒具都与众不同，其中有些菜肴还具有历史典故，使人在品尝之时，还重温到孔子的教育哲理，给人以文化滋润。

当笔者访问临近结束时，孔德懋老人无限感慨地对我说，在她有生之年，有两个心愿：一是希望能为祖国统一大业做点事，愿海峡两岸早日统一，骨肉至亲能早日团圆；第二个心愿就是为弘扬推广孔膳、丰富中华饮食文化做点实实在在的工作，为国家、为故乡的繁荣发展和人民富裕作些贡献。

(责任编辑　方　徨)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驰骋商海

● 孙晓鸥

60 年代初，13 岁的李德强一觉醒来，出现在他眼前的是他从未见过面的父亲，以特赦国民党战犯的身份，从东北战犯管理所回到山东的老家。李德强和他的家人面对着这位面孔苍老、头发灰白的老人，李德强不禁仰天长叹：认命吧！

李德强不能不认命。他父亲是原国民党第二十二集团军总司令李仙洲。像李仙洲这样的国民党大官儿，又是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在山东就出了一个，自然有响当当的名气。据说当年家喻户晓的电影《南征北战》中那个在碉堡里手持电话绝望呼喊“伸出手来拉兄弟一把”的李军长，就是以李仙洲为人物原形创作的。其实李仙洲没有电影中的“李军长”那么鬼。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国共合作的情况下，热血青年参加革命，投到谁的名下，有很大的偶然性。时年 31 岁的李仙洲参加革命时目标明确，就是打倒封建军阀，拯救劳苦大众，走时极为秘密，连老婆孩子都不能告诉。可谁知“四·一二”老蒋一翻脸，国共两党成为敌对的两个阵营，李仙洲恪守“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逐渐成为蒋介石反动派阵营的一分子。李德强在母亲肚子里时，父亲正率部与解放军打得如火如荼。李仙洲 1947 年 2 月在著名的莱芜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李德强当年 9 月出生，“狗崽子”的帽子自然“没商量”地扣在他头上。

李德强长到 13 岁也不知道自己父亲是怎么回事，但他从别人的眼神和口气中，也知道了父亲的问题远比地主、资本家严重。为此，他在村里和学校里都抬不起头来。他心里清楚，他李德强要想被社会所承认和接受，必须付出相当于他人十倍的代价。

李德强不愿认命。他聪明好学，他决心用自己的勤奋来改变现状。在学校里，他努力学习；回到家他爱帮助母亲承担家庭的生活困难。不远的村外公路上有一个很大的土坡，过往的负重人力车要爬过大坡是需要别人帮助的。小德强便在放学后，拿一条绳索等在这里。每帮别人拉一次车，就可以得到 5 分钱的报酬。懂事的李德强总是把这几枚捏出汗来的硬币，恭恭敬敬交给母亲，贴补家用。

初春一个蒙蒙细雨的傍晚，李德强照例来到高坡前等待着过往的人力车。左等右等，淋了个落汤鸡，仍不见过往的人力车来。天很快黑了，雨雾中出现了一辆蹒跚前行的人力车，李德强满心欢喜跑上前，套上绳扣用力拉了起来。不知是因为车太重还是路太滑，他在泥泞里摔了几个跟头，才爬过了大坡。当李德强向那拉车人要那 5 分钱时，才发现拉车人竟也是个比他大不了多少的孩子，而且在他那张充满稚气的脸上，分明流露出了一丝难以诉说的歉意和无奈。李德强怎忍再启口讨要本应属于自己的五分钱劳务费呢？李德强的视线被泪水和雨水模糊了，他好似忽然明白了，无论何年何月，人生的路，不会是笔直的平坦的。一个人要想生存，要想有所成就，必须奋斗，必须不懈努力。

1999 年李德强在全国政协九届二次会议上(孙晓鸥 摄)

李德强在农村一干就是三年半，他用了比别人多得多的力气整天默默无闻地干活儿，用来洗清本不应由他负责的有关出身的“污点”。村里干部群众和同去的知青看在眼里，记在心头。对李德强的工作，就是再挑剔的人，也无可指责。一天，李德强忽然发起高烧，病情愈加严重。村里人吓坏了，不知是啥怪病。消息传到老爷子那里，老爷子心里别提多伤心和着急了。但他毕竟是在战犯管理所受过共产党教育多年的老人，他只低低说了一句：“有组织的照顾，我放心。”对于李德强的病，贫下中农的关心程度，着实说，绝不亚于他的父亲。他们太喜爱这朴实善良的孩子了。为了使他能够早日恢复健康，大爷大娘们没日没夜地仔细照看他。也亏老天爷有眼，李德强得了这么重的病，经过一段时间痛苦的煎熬，居然恢复了健康。

特赦回家的李仙洲没有给家庭带来更大的变化，但情感细腻的李德强已隐约体会到进入老年的父亲对自己的发自内心的爱。这爱包含了作为一个战犯对自己家庭和子女的歉疚。共产党在教育改造战犯这件事上创造了震撼世界的奇迹，硬是使一个铁杆国民党的人生观价值观有了改变。李仙洲回家没多久，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当李德强告诉父亲这一消息时，已七十开外，生活上正需要照顾的老人，没向政府提出半个希望儿子留下的字。李仙洲这位毕业于黄埔军校第一期的老资格军官，一生烟酒不沾，廉洁是他终生做人的准则。抗战初期，李仙洲率部英勇抗敌，在忻口战役中负了伤，蒋介石为表彰李将军的战功，曾犒赏给他 5 万大洋。然而李仙洲没等把这钱攥热乎，便统统买了药品送给部队的伤病员。虽然李仙洲与儿子李德强相差 53 岁，且在儿子 13 岁以前就没有见过面，但父亲骨子里那种要强向上的东西却遗传到了儿子的身上。

李德强就这样怀着对父亲的眷恋和担心踏上了插队的征途。离开父亲那天，天阴沉沉的，压得人透不过气来。李德强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故土，离开了相见不久的老父，他只能在心里默默地祝愿父亲保重身体。

李德强病愈后，村里办起了小学校，缺少教师，大家头一个推荐的便是李德强。后来有了知青返城的政策，村里干部群众一致认为李德强积极肯干，工作扎实，应当推荐他回城工作。然而，前来招工的人，知道了李德强父亲的问题，谁还敢要他？李德强一次次感受到了家庭影响的阴影。眼看一批批朝夕相处的伙伴高高兴兴走向返城之路，他只是默默忍受这一切，因为他早已习惯了这一切。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探亲回城的李德强回到了年迈的父亲身边。那时母亲已经过世，看到父亲那慈祥的面容，深深感受到家庭的温暖。虽然这个家庭是残缺的，但他早已体会到父亲对自己发自内心的爱。入夜，长期在农村劳动疲乏已极的儿子进入了梦乡，可老人还趴在床前，贴近儿子，直盯盯看着他那因农村超强劳动而变得粗糙的脸，件件往事涌上心头。他觉得自己对不起儿子，让他们因为自己的罪过而吃尽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苦，不禁突然老泪纵横。不知

是心灵感应还是巧合，李德强从睡梦中忽然醒来，恰与父亲那慈爱的悲伤的目光相遇，一种难言的酸楚不免从自己的心底流出。

“爸爸！”一声轻轻地呼唤，把两代人的心紧紧联结在一起。

老人那青筋凸起的手，颤巍巍紧紧抓住儿子的手，一股异样的暖流通过这两双相差半个多世纪年龄的手，传递到对方的心灵深处。李德强从父亲温暖的大手中，从父亲那饱经风霜满是皱纹的脸上，从父亲那不无期待和慈爱的眼神里，读出了从大哲学家那里也难以领教的人生哲理。父亲没留下一分钱，可他那种慈爱，可以使做儿子的李德强终生受用。

已经习惯了农村挥汗如雨的劳动和生活的李德强，在又一批返城名额下达时，他没有再填回城申请，但是眼明心亮的村里人这回可不干了，大队支书大动肝火地向招工的人抗议说：“像德强这么好的孩子你们如果再不要，我们谁也不推荐了！”

在决定返城后，惜别村民的那一天，李德强对送别的村民说：“大爷大娘，回吧！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说着竟“咕咚”一声跪在地上。

带着对当地贫下中农依依不舍的眷恋，李德强离开了农村，来到了城市。返城后他以敏感的嗅觉，即刻感受到了城市生活中那特有的节奏和韵律。在被分配到一家变压器厂工作后，原本就爱动脑筋的他更是热衷于小发明小创造之类的事情。他在困境中长期的社会生活积累，从此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和运用。“四人帮”粉碎后，批判了极左路线，思想解放了，打碎了许多人为的桎梏。高考恢复时，李德强刚好 31 岁，他经过刻苦学习和复习，终于在当年考上了大学。三年后，踌躇满志的李德强拿着那张大红的毕业文凭，带着新学到的知识，重返当年曾工作的变压器厂。

是金子总会发光。由于李德强工作上积极肯干，又热心于发明创造，不久便被省里推荐为全国青联委员，这对李德强来说是莫大的荣誉。他暗暗下定决心，一定要干出个样儿来，使自己不愧于青联委员这光荣称号。当时他工作的变压器厂正在试制新产品，主要项目是试制洗衣机，李德强便被吸纳为技术革新小组的成员。这下爱动脑筋的李德强可算是有了用武之地。他没日没夜地钻研技术，忙时甚至许多天不回家。经过三个多月的艰苦奋战，厂里的第一代产品小鸭牌洗衣机终于问世。接着大家又一鼓作气，连续作战，终于使厂子里的洗衣机一代代更新，并以其巨大的生产规模，吞并了本市一家拖拉机厂，终于成为全国驰名的六大洗衣机生产基地。在洗衣机厂工作的李德强的确是如鱼得水。由于他为厂里的技术革新和产品的更新换代立下了汗马功劳，他本人也由一名普通的工人升为技术员、工程师，一直到企业集团的副总经理。

好心早晚会得到好报，李德强在事业上的成就，使他在济南洗衣机行业有了名气。因偶然的机会，一位在市无线电十二厂的青年女工认识并爱上了他。这姑娘温柔贤惠，又特别能干。在经过一段时间的恋爱之后，两人结成连理。婚后的生活美满幸福，李德强有了更加充沛的精力来为厂子工作，而工厂的生产经营状况更是芝麻开花节节高。1983 年，作为重要统战人士的李仙洲到北京开会，国家主席李先念接见了李老先生。1998 年 3 月初，对李德强来说是一个个阳光灿烂的日子。他以他优秀的业绩以及作为重要统战人士后代的身份，成为第九届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出席了一年一度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大会，参政议政。他无比珍惜这一荣誉，愿意利用这权利为人民说话，为人民办事。

（责任编辑　舒元璋）

本刊更正

我刊今年第 8 期《中国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作者应为王 珺 ；文中“马次春”应为“马次青”。“国民特务组织亚情研究所”应为“国民党特务组织匪情研究所”。“个别省紧跟康生的人”应删去“省”字。特此更正，并向作者致歉。

萧克将军重访炎陵县

● 王锡堂

1928年4月，萧克同志率部分湘南起义农军奔向井冈山，直至1934年8月率红六军团突围长征，他与湘赣边区人民并肩战斗了六个多春秋。

1991年10月8日，江西省永新县举办湘赣革命根据地创建60周年纪念活动，萧克将军应邀回到了阔别57年的故地。当晚得知时任中共顾问委员会常委、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执行会长的萧克将军，欲去酃县（1994年4月更名为炎陵县）拜谒炎帝陵的消息，酃县县委立即作了安排，湖南省顾委决定由副主任赵处琪前往酃县迎接。

沔渡圩上忆往事

10月11日，天气晴和，金风送爽，萧克将军乘车抵达湘赣交界处，健步走下车来，同省顾委副主任赵处琪深情地说："六十多年前，我第一次到酃县，曾在这里的沔渡圩住过几日。"

酃县的同志说："沔渡圩现已改为建制镇，就在前面不远的公路旁边。"

10分钟后，汽车来到沔渡。萧克将军沿着当年的老街，凭着自己的记忆，一边寻觅当年的住户，一边讲起他第一次来到沔渡时的情景：

那是1928年3月，蒋介石调集湘粤重兵"会剿"湘南，加之湘南特委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湘南起义部队严重受挫，为保存武装力量，朱德、陈毅率领起义部队撤离湘南，向湘赣边界井冈山转移。毛泽东在酃县中村得到消息，立即决定兵分两路前往湘南接应。一路以第二团为右翼，由何长工、袁文才率领向郴州方向前进，阻止尾追湘南起义部队之敌；一路以第一团为左翼，由毛泽东率领，向桂东、汝城方向进军，阻击由粤北前来追击的敌人，掩护湘南起义部队向井冈山顺利转移。此时，湘南起义主力部队在朱德、陈毅的率领下，已向湘赣边界挺进。萧克率宜章独立营由骑田岭出发，经过郴州来到资兴龙溪洞，正巧与毛泽东率领的工农革命军汇合。毛泽东握着萧的手笑着说："朱德没接到，接到了你萧克"。随后，萧随毛泽东离开资兴，到达酃县水口。毛泽东率一团去酃县城，萧率宜章独立营经坂溪、石洲、十都来到沔渡，此时已是4月下旬。朱德、陈毅率领的起义部队和何长工率领的工农革命军已先期到达沔渡。顷刻间，小小的沔渡圩上住满了我们的部队，足足有八九千人。圩街内外，到处炊烟缕绕，一片热闹景象。萧克住的那间小店铺，房子不算好，店主一家对他们十分热情，帮他们摊铺，烧茶。后来，毛泽东在酃县击溃尾追朱德部队的湘敌张敬兮团，回到宁冈砻市。他一听到朱德部队到达沔渡的消息，马上率工农革命军赶到酃县沔渡，与朱德部队胜利会师，并迎接我们大部队上了井冈山。

将军走完了沔渡镇，询问了不少店户，然而与他同辈的老人都已不在人世，他住过的店户未能寻到，带着几分遗憾回到了车上。

汽车径直往县城方向奔驰，萧克又谈起他第二次来酃县的经历：

1928年7月，湘赣两省敌人"会剿"井冈山革命根据地。为粉碎敌人进攻，红四军军委决定，由朱德率二十八团、二十九团攻打酃县、茶

萧克在《中华文化通志》主编会议上讲话

陵，袭击湘敌后方，迫使湘军退回湖南。当时，萧克在二十九团二营任连长，随朱德攻克酃县后，原计划返回宁冈，攻打永新，由于原来湖南省委有过要打湘南的指示，加上当时二十九团大部分官兵回乡心切，纷纷要求改打湘南。虽经朱德多次劝阻，但由于省委代表杜修经坚持攻打湘南的错误指示，致使劝说无效，最后还是南下攻打郴州，与范石生部队发生激战，先胜后败。结果二十九团大部溃散，除团长胡少海率领部分官兵和萧率领的一个连不到二百人回到部队外，其余被胡凤璋及当地土匪武装打散，死伤损失惨重，这就是历史上讲的“八月失败”。毛泽东得知郴州失败的消息后，迅速率部队前往湘南，接我们返回井冈山，我率领的二营部分官兵编入二十八团。

谈到这里，将军深有感受地说：“干革命，统一战线很重要。当时驻在郴州的湘军范石生部队同我们党一直保持着较好的关系，朱德和范石生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南昌起义失败后，朱德在广东得到过范石生的帮助。朱德离开广东时，曾与范石生有过‘今后相遇，你不打我，我也不打你’的协议。这次，如果我们不先打范石生部队，范石生部队也不会打我们，红军力量就可保存，边界就可减少损失。每次念及此事，朱德都会说，当时打范石生是一个深刻的教训，是我们党内‘左’倾错误造成的。”

将军侃侃而谈，不觉来到了酃县县城，酃县县委负责同志劝他进县委招待所休息一下再去炎帝陵，萧克毫无倦意，叫司机直开炎帝陵。

酃县县委负责同志接过将军回忆的话题高兴地说：“您写的长篇小说《浴血罗霄》，我们都看过了，写得很好，对广大青年很有教育意义。”

萧克将军感慨地说：“井冈山是毛泽东亲自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对开辟中国革命胜利的道路作出了很大贡献，应该好好回忆整理出来，可惜命运多舛，书还没出版，就被批判了两次，说是一部反党作品，现在拨乱反正，书出版了，总算是一件喜事。”萧克接着又说：“如今从第一线退了下来，可以对炎黄文化多作点研究了，这次来酃县，就是想对炎帝陵作点了解。”

萧克将军这一路对于往事的回忆，有一点特别引起中共酃县县委领导同志的重视，县委党史办公室经过广征博采，证实毛泽东、朱德第一次会面是在酃县，于是在1993年8月，报经中共中央宣传部批准，同意在酃县兴建“毛泽东、朱德第一次会面纪念碑”。翌年，萧克将军应酃县县委请求，欣然挥笔为纪念碑题写了碑名。

炎帝陵前敬始祖

汽车穿过开阔的田野，向炎帝陵行驶。萧克将军的话题转到了炎帝陵，他兴味很浓地说：“炎帝是中华民族的始祖，他为我们民族的繁荣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炎帝和黄帝已成为我们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象征。我作为炎黄子孙，早就期待有这样一天，到炎帝陵来拜谒始祖。”

很快，汽车来到了傍山依水、森林茂密、风景秀丽的炎帝陵区。老将军下车后环视四周景色，顿觉心旷神怡。管理局负责同志向将军汇报重修炎帝陵的经过说：

“历史上有关炎帝神农氏殁葬的记载，最早见于晋朝的《帝王世纪》，到了宋代，便有‘崩葬于长沙茶乡之尾’的明确记载，即现今的酃县。炎帝陵最早建于宋德五年（公元967年），以后经过历代多次修葺，甚为壮观。可惜在1954年因香客不慎失火而被烧毁；‘文化大革命’中，这里又被视为‘四旧’，以至夷为平地。1983年全国六届人大一次会议上，湖南省株洲市人大代表提议重修炎帝陵，得到国务院批准。1986年由湖南省人民政府拨出专款，正式动工修复，1988年建成主殿。”

将军一边点头称“好”，一边步入主殿大厅。他怀着对民族始祖的敬仰之情，在坐落于正殿中央的一米多高的金色炎帝塑像前驻足良久。炎帝陵管理局的同志介绍说：“原先的炎帝像为苎麻所织，1954年失火被烧。这次重塑是根据明代大画师姚大经留下的画像，由浙江东阳雕塑公司设计雕塑而成。原画像为双手捧稻穗的形象，表示炎帝‘始作耒耜，教民耕耨’之意。这次重新设计时，考虑到炎帝的‘遍尝百草，宣药疗疾’的另一贡献，雕塑为一手捧稻穗，一手拿灵芝的形象”。将军听完介绍，连说：“改得好，改得好！”

萧克在炎帝神农氏墓前，指着许多香烛说：“每年到这里朝拜的人多不多？”炎帝陵管理局的同志说：“自古以来，谒拜炎帝陵的人历来络绎不绝，即使正殿烧毁后，来墓前朝拜的也没有停止过。炎帝陵修复后，来自台、港、澳的同胞和海外的华裔朋友也逐年增多。”

在新建的墓碑亭中央，萧克仔细抚摸着胡耀邦在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期间题写的高3.2米、宽1米的“炎帝神农氏之墓”汉白玉墓碑，显得十分欣慰。炎帝陵管理局的同志特别介绍说，早在1962年、1963年胡耀邦同志就两次瞻仰炎帝陵。

萧克说：“共产党人也不能忘记始祖；搞社会主义建设，也要学习祖先那种勇于开拓和自我牺牲的高尚精神。”

那时炎陵后山兴建的御碑园尚未建立（编者按：已于1996年建成），萧克在临时设立的碑房参观。这里陈列着的十几块清代、民国时期的碑文，有的字迹已模糊不清，酷爱历史和书法的萧克将军一块一块地认真察看，询问祭文碑的来历。

参观结束后，萧克将军不由感慨万千，他应邀即席挥笔题词：“中华文明始祖，神州农耕先声”，含意深邃。

纪念馆中话英烈

下午，萧克将军来到洣泉书院参观工农红军在酃县革命活动纪念馆。这里是当年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一团团部驻地。1928年4月，毛泽东率领这个部队在资兴龙溪洞与萧克率领的宜章独立营会合后返回酃县，就住在这里。萧克瞻仰毛泽东住室后，来到陈列室。纪念馆负责同志就《南昌起义部队和湘南农军汇集沔渡示意图》征求将军意见，萧克细心察看后，肯定地说：“没有错。”

在“红七军、湘东独立师在酃县”的版面前，萧克注视着工农红军第七军、湘东独立师的旗帜和张云逸、王震的照片，好像想起了什么。随后，他对纪念馆的同志说：“据我所知，当时湘东独立师的师长是刘沛云，是毛泽东派去的，后来牺牲了。王震是三团政委。要如实反映独立师的活动，建议你们在版面上补上刘沛云的名字和照片。”

在革命烈士史迹展览室，萧克将军看到何孟雄的照片和事迹简介，深情地说：“何孟雄是我党创建时期的党员，他的名字，我早就听说过，他是酃县人，是你们县的骄傲，要好好宣传。”

他又说：“革命烈士才是最伟大的，他们用鲜血换来了新中国的诞生。我们这些人能活下来，也是他们用血换来的。我们要用他们的献身精神教育后代，焕发出民族精神，建设好我们的国家。”

（责任编辑·洛　松）

用巴黎公社原则根治当今腐败

● 王曾瑜

中国古代大致从秦汉开始，就建立了御史和言官制度，作为帝制下制约腐败的特殊机构和制度。但是，专制和腐败是一对双生子，专制必然滋生腐败，腐败也必然依赖专制。监察权根本不能独立于皇权，古代法制虽然详密，却不能真正以法治代替人治，监察权既是皇权的附庸，就不可能真正有效地制约腐败。

尽管如此，古代监察制度不仅给今人留下了失败的教训，也留下若干可资借鉴的经验。第一，从制度的规定看来，古代的台（御史台）官和谏官不但可以论事，也可以论人，不但可以纠劾百官，也可以批评皇帝。"文死谏，武死战"，文官以谏，武官以战而死，历来被视为最高的道德标准。第二，古人虽然有很强的等级观念，但监察制度却规定低品的台谏官可以弹劾高官，直接批评皇帝。凡是刚直不阿、直言无讳者，反而得到舆论的称赞，被视为台谏官的楷模。第三，允许风闻言事，即所论的人和事即使与真实情况有出入，也不以言为罪。事实证明，如以风闻不确而治罪，就等于杜绝了弹劾和谏诤之路。古代开明的皇帝，如宋太祖，曾立下不杀上书言事人的秘密誓约，这当然是旨在保证言路通畅和监察权实施的重大措施。

这里不妨回忆一下 1959 年庐山会议的那场斗争。彭德怀的上书，其实只是对毛泽东的大跃进、人民公社化等措施作了十分温和的批评，不仅对事不对人，而且自己也主动承担了一部分政治责任。而毛泽东却不能容忍。不能容忍彭德怀上书的直接后果，是华夏大地出现了千千万万饿殍的惨剧。

古代皇朝的覆灭，虽然各有具体情况，但总的说来，也是离不开从腐败走向灭亡的规律的。共和国成立不满五十年，但腐败却呈现了高速泛滥的趋势。旧社会的一切腐败现象，如今也是应有尽有。党内最早是陈云提出党风是生死存亡的问题，已经有十多年了。然而时至今日，腐败仍是发展之势。腐败的积累，社会矛盾的积累，会是动乱的前提条件。老百姓平时受腐败之害最深最广，而如果不幸发生动乱，受害最深最广的还是老百姓。我个人怀着危机感，并且真诚地期望用服药的方式逐步根治腐败这个社会毒瘤，而避免动乱给百姓带来更大痛苦。

根治腐败，当然可以有许多方案。从根本上说，腐败的产生，正是权力的腐蚀。人们常引用一位西方学者的话，绝对的权力绝对地腐蚀人。任何人的权力不得到有力的监控，是不得了的。无庸讳言，曾经受到人民普遍尊崇的毛泽东，正是因为个人权力得不到监控，最后发展到滥用权力，造成"大跃进"后的大饥饿和"文化大革命"这两次祸患的极其可悲的后果。陈希同名

义上应是北京的头号公仆，但是，北京市区的任何一名号称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人，又有谁能对他进行有力的监控，这正是他走上犯罪道路的基本条件。其实，他的腐败问题传闻已久，即使按照古代风闻言事的原则，也早该揭发示众了。

从治本的角度说，根治腐败的思路，我以为应当按照130年前早已提出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建立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全面的、严格的、有效的监督体制。目前法治的口号喊得很响亮，但是，对法治具体内容的理解，只怕是有分歧的。按我个人的意见，是应当以巴黎公社的原则和理想为核心，建立足以保证任何社会主人实施对任何公仆全面的、严格的、有效的监督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当然也应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恩格斯说，“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巴黎公社“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以求“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一百多年前恩格斯的话，还是说中了今日中国的时弊。中国今日不少人对一官半职如此迷恋，说穿了，还不是为了捞实惠，搞腐败。按照马克思主义，每个社会主人对任何公仆应当拥有直接选举（恩格斯所说的普选当然是指直接选举）、批评、弹劾，以至罢免任何公仆的神圣权利。如果说，古代的台谏官按制度规定尚有权评论皇帝的政绩，难道现代的任何一个公仆，居然应当拥有只准百姓歌功颂德，不准批评、弹劾以至罢免的特权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李长春说，在广东，全省人民第一个就应当监督他，这句话是说得好的。

在一个有着几千年专制积习的中国，人们又在一个远离巴黎公社原则的社会里生活了近五十年，建立足以保证任何社会主人进行对任何公仆全面的、严格的、有效的监督的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自然是很难的。为了保持社会稳定，发展经济，无疑必须有一个逐步积累的政治体制改革进程。人民必然要有一个逐步学会使用自己民主权利的过程，各级官员也必然有一个逐步适应人民选举、批评、弹劾以至罢免的习惯。例如普选，即直接选举，就可以从直接选举省人民代表，过渡到直接选举全国人民代表，从直接选举县长，过渡到直接选举省长和国家领导人。直接普选应该是政治文明成熟的一个标尺，是人民对任何公仆实施考核和监督最有效、最直接、最有力的措施之一。不能以目前中国的某些情况作为拒绝直接选举的借口，行将进入21世纪的中国，不能说比130年前的法兰西更落后，更没有条件。唯有按巴黎公社原则进行认真的政治体制改革，彻底调整目前并不正常的社会主人与公仆的关系，才能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

其次，我还想驳斥一些抵挡批评腐败的言谈。有人持经济改革过程中腐败必不可免论，这种议论当然经受不住事实的检验，例如香港和新加坡正是在经济改革和发展进程中有效地消除腐败。又有人抬出所谓腐败古今中外都有论，似乎是大哥不要笑二哥，脸上麻子一样多。其实，身为无产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社会主义制度，有什么必要与剥削阶级政党和国家去比较脸上的麻子谁多谁少，岂不太降低了自己的身价，难道即使脸上有一点麻子，有一点腐败，就不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奇耻大辱？更何况今日的腐败岂止是一点或几点而已。凡此种种，似乎说明有一部分人虽然居于耻辱之中，而还不足以知耻，腐败就是今日的国耻，今日的党耻。知耻者勇，每一个公仆，应以愧对人民，愧对历史，愧对天下后世的沉痛感、羞愧感、负疚感和紧迫感，而痛下反腐雪耻的决心。

我看了电视剧《黑脸》，不免产生深长的感喟，这难道不是一部古代清官戏的翻版吗？清官从个人的品格说，值得人们尊敬，但清官又岂能消除腐败？但反过来想，今天反腐的总格局，似乎还是停留在清官戏的水平上。从这个角度看，《黑脸》还是真实地反映了目前反腐的实际水准。一个芝麻大小的镇干部，百姓对他根之入骨，却不能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原则，将他

直接弹劾和罢免，移交法院，而只能指望一位青天小老爷救苦救难。人们的思维，应当实现一种转变，一种飞跃，就是从求救于清官，转而求救于马克思主义的巴黎公社原则。

有人说，人民监督、舆论监督和党内监督，党内监督是第一位的，这要看从哪一个角度讲。我认为要从根本解决问题的角度讲，人民的监督是第一位的。按照马克思主义巴黎公社原则，把人民监督置于首位，而不是将人民当家作主当作一句常用不衰的空话，人民在反腐败中的作用，就不能仅限于当举报员。应当采取一系列的措施，制订一系列的法制，以保证和维护人民对任何公仆实施监督（包括选举，罢免，弹劾……）的神圣权利。舆论监督亦具有强大的作用，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思维，舆论理应充当当代的人民台谏官，对任何公仆实施监督，允许风闻言事，首先应当揭发高官及其家属的腐败问题，唯其如此，方能对腐败真正产生强大的镇慑作用。国家固然应当有政治机密，特别是军事机密，但是，按照前述巴黎公社原则，任何公仆没有资格和权利，就腐败问题向社会主人保密。这个事件不准刊载，那种情况不准披露，这正是将自己的权力凌驾于人民之上的陈腐思维，而与巴黎公社的原则背道而驰，事实上正起着庇护腐恶的作用。

感谢马克思和恩格斯，他们为我们留下了巴黎公社原则这个传家宝，这是兴邦治国的法宝，反腐的法宝，万万不可弃置不用。

原载《北京观察》1998 年试刊第 3 期，在本刊发表时此文有所增补。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

（责任编辑　杜　晋）

补　正

本刊第七期刊登的《曾克林率部挺进东北亲历记》第 9 页右栏第 17 行至第 23 行：“陆续到达东北工作的党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有：张闻天、李富春、高岗、李立三、罗荣桓、林枫、陶铸、蔡畅、王稼祥、黄克诚、吕正操、王首道、谭政、刘澜涛、程子华、乌兰夫、万毅、古大存、陈郁、肖劲光、陈正人、罗瑞卿等。其中有 4 人是政治局委员和候补委员。”

经查原作有误，更正如下：

一、当时政治局并无候补委员；

二、陶铸、陈正人当时不是中央委员；

三、乌兰夫、刘澜涛、罗瑞卿在抗战胜利后均未去东北工作。

谨向来信来电指正的吴永胜、张杰英同志致谢，并向读者致歉。

本刊编辑部

开展“舆论史”研究

● 邵燕祥

舆论应该有史,我们应该研究舆论史。

不必上溯到唐尧的时代，说什么当时的华表又称“诽谤木”,是类似意见箱的设置等等,更不必烦琐哲学似地从语源学上考证舆论一词的含义及其历史变迁。只要上溯一百多年,从上世纪末，也就是清王朝末期 ，中国有了近代的舆论工具开始,从有文字记载的舆论,联系它对各个时期的政治生活，社会动态，道德风俗，文化时尚的双向关系加以研究,就行了。

这个想法，是我在读萧乾文集的时候萌生的。因萧乾的写作生涯，想到 30 到 40 年代的《大公报》，我想，即使对这样一家报纸，要想确切地作出历史评价，也不是仅仅从所谓新闻史或报刊史的角度就能蒇事的。一个社会里,尽管有处于支配地位的舆论，也总还会有各种各样的舆论，它们在一定的社会政治和道德文化的背景下互相消长，来自不同的社会阶层和社会力量，反过来对各个阶层和各种社会力量又发生动态的影响。

一般说来，社会舆论是自发的，而如毛泽东所说,某种社会力量还会自觉地“造成舆论”。这就使我们的研究者有事可做了。首先,不是做价值判断：这个舆论正确，那个舆论不正确，如毛泽东所说，看它们是否符合实际，是否真有道理等等；而是首先要弄清，在一个历史时期，围绕着某一重大的政治事件，以至非政治性的、为全社会所瞩目的问题，包括重大的自然灾害、社会困扰、刑事民事案件，以至文化公案，都会有各种各样的舆论。把它放在一个历史范畴里来考察，可以从中找出民意的轨迹，找出利益驱动和文化指向的作用。

这就不是像我们现有的某些研究那样，标注出一些舆论工具、一些报刊主办者的政治倾向、资金来源，就可以“一言以蔽之”的那么简单了。

这也不像我们现有的某些思想史那样，主要在形而上学的领域回旋扫描。按照学术规范，立论当然要从文字记载有据的典籍出发，然而，研究者的视野还应该扩大到民间的口头舆论。就以 40 年代中国的舆论来说，代表各种政治派别的报刊固然是研究的对象，但我举一个例子：当时几乎普及到各个阶层的一句流行话语，就是“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到处不留爷，爷去投八路。”前两句流行江湖不止百年，而后续的两句则带着鲜明的时代色彩，且赋有极大的现实鼓动性。这样的舆论,为国共两党的正史所不载，为各样的报刊史、新闻史、更不用说思想史所不载,然而,却是研究舆论史所不容忽视的。

在一百多年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的艰难进程中，到本世纪上半叶为止，对社会舆论的研究，除了舆论工具本身如报刊留下的文史资料外，还有各类型的图书可资参照，但时间久远，有些已成珍本善本的文物，搜集使用有一定的困难。下半个世纪以来，为时较近，但舆论工具除了少量篇幅“读者来信”和“群众呼声”一类版面外，在了解舆情方面，还应全方位多渠道地进行。

总之，要有有志于近代史、现代史研究而又不愿囿于原有的窠臼者，有志于思想史特别是民间思想研究者，有志于社会学、文化人类学以及其他跨学科的研究者，以披荆斩棘的精神来做这项开创性的事业。

与此同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在中国近、现代舆论史研究的基础上，可望建立有中国特色的舆论学，这是有助于舆论导向的。——如果弄不清中国舆论的历史发展，弄不清当代中国的舆论是怎样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来的，又怎么谈得到正确的舆论导向呢?

难事不难

● 王 村

在新中国生活几十年，经过各个方面、各种形式的教育(学校的、生活的，后者包括各种“运动”和有地方色彩的遭遇)，我国人民的政治水平普遍提高，鉴别能力显著增强。人们关心政治形势和政治事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个人生活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

现在群众对国家大事，用群众的常用语来概括，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急”。

“喜”，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作为一个中国人，真可扬眉吐气。年逾八十的中国人永远不会忘记上海租界里那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而上海是中国的城市。现在上海更发达、更繁荣，外国人更多，但它再不是“冒险家的乐园”，而是中国的一个繁荣昌盛的国际性大都市。我国的国际地位今非昔比，对任何不平大事我们能够说“不”，任何国家都要考虑考虑这个“不”字的份量。

“急”，是对那个万人侧目的腐败。许多人想不通：堂堂中国人能够打败国内外十分强大的拿枪的敌人，怎么就挖不掉自身这块“烂肉”？

中央对反腐败很有决心，制定了不少有效措施，有的已经收到显著成效。各有关职能部门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不能说小，取得许多成绩。各种传媒也不断揭发、呼喊。最近几年，各地发案数、结案数都有增加，有些涉案人员的官职也比过去高。这一方面说明反腐败斗争很有成果，一方面也透露在一些地区、部门腐败现象还在蔓延，很值得人们警惕。

世界上不少国家在由贫到富的过程中，都经过一个腐败滋长——大力反腐败的过程。各国情况不同，在经济发展道路上发生的问题和解决的办法也不同。我国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日益富强的过程中，产生别国未见的许多问题，处理既要坚决，又要仔细。我们有个好传统，就是“允许人犯错误，允许人改正错误”。这个传统可以避免在缺乏经验的情况下，不考虑具体情况、不作具体分析、率尔决定的惩办主义。但这是为的“治病救人”，不是给坏人留“空子”。不少腐败案件从领导角度说是用人不当。什么是粗枝大叶，用错了人；什么是以权谋私，任用坏人，这是可以分清楚的，但有些人就是多方遮盖，想把水搅浑，致使并不复杂的案件久拖不决。

我有一事弄不明白：据传媒报道，有的人原来人品不错，工作也好，上级据以加重担子，给他升了官。此人经不住花花世界的诱惑，很快变坏了，贪污受贿，犯了重罪。如果追究领导责任，我看这是“失察”。也有的人原来品质不好，口碑很坏，竟被提拔升官。这有多种可能：此人很会伪装，善于逢迎，领导一时上当受骗。坏人会混，混过一个或几个关口。还有就是别有隐情：除了过去常说的同乡、同事、世谊等等之外，还有某种物质关系(尽管有时是曲折的)。群众最厌恶的是这一类，最难查处的也是这一类。

有些国家有一种成文法或习惯法：上级对下级某些大错负连带责任，下级出了大事，上级“引咎辞职”。各国历史情况不同，我国有无这种先例，我不清楚。据我个人看法，对这种做法(如果实有其事的话)简单地表示是、否都不妥当，还是应该实事求是，具体事物具体分析。下级出了贪污渎职、受贿卖官等等违法丑事，是推荐、任用者工作粗疏、看人不准，还是有徇私卖放、上下其手等私弊？只要出以公心，不畏权势，这其实不难弄清楚。只要有“五不怕”的精神，敢打破“刑不上大夫”的陈腐传统，事情都不是那么难办。

老的感觉

● 冰　子

编辑先生：

我在纽约唐人街东方书店，见到《炎黄春秋》，读后很感兴趣。现寄上短文一篇，希望能介绍给远在中国的读者。

冰　子

老的感觉，不是光老人才有，有的人并不老，却有了“老的感觉”，昏昏沉沉不知进取，我真为他们婉惜。在中国大陆上，大学的确有年龄限制，而在美国，八十多岁的“奶奶”、“爷爷”读博士者，屡可闻见。我以前居住在新州南桥镇时，就知道有位八十多岁的美国妇女，已有了两个“P. H. D”（哲学博士），她还在兴致勃勃地攻读法学博士。有人问她是否想做律师，她笑而回答：“不一定，读书不但可以解寂寞，而且可以使人一直有年轻的感觉。”美国人确实不认老不服老，特别忌讳“老”字。我的内人在医学院工作，年轻的中国研究生，见了她总喊她“老林”。有个老美便好奇地问她，他们称呼你什么。她说：“他们叫我‘OLDLIN’。”“天哪”，那位老美脑袋摇得像货郎鼓：“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他们喜欢年龄保密，也不喜欢别人问年龄。

我们中国人就不一样，喜欢别人叫自己“老师”、“老爷”、“老爸”、“老妈”、“老手”……成语中的“老马识途”、“老成持重”、“老谋深算”，都是以老为荣。我年轻时在医院实习，带教的王老师是位50岁左右的副主任医师，带我们查病房时，正碰上六十多岁的正主任，对着我们喊了他一声“小王”，竟使他霎时弄个满脸通红。可见中国人有了一定地位，上了一定年纪，是不能称“小”的。我也就受了这种影响，刚来美国时才四十多岁，自以为老了，没有抓紧时间再去上学，一拖就是十年，错失了大好时光。我有位朋友的舅舅，今年64岁，他在香港是牙医，到了美国，读了纽约大学牙科学院，就是通不过美国全国的牙医考试，但他毫不气馁，不断参加考试。最后，他终于得到了执照，去年开设了门诊，收入甚丰。

听说现在大陆，不论是医生或工程师，一到规定年龄，一律退休，这实在是件遗憾的事。其实那种年龄，可能正是技术人员大放光彩的时刻。在美国，是有法律的，要是雇主以年龄为理由解雇工作人员，是触犯了法律，名曰“年龄歧视”。在我工作过的医学院，有不少七八十岁的教授和医生，仍在勤奋工作，毫不服老。有一位病理学教授已经八十多岁，腰背部直不起来。但他在病理切片的诊断上，在当地无人可及。他以办公室为家，不分白天黑夜地在那里工作。他不甘心“老”而“退休”。我真希望在中国将来也能有反“年龄歧视”的法令，使许多人可以继续工作，发挥余热。

其实对于老的感觉，古代和现代也有很大差别。中国古代，一过五十，便称年过半百；到了七十岁，“古稀”了。唐朝大文豪韩愈不到四十便觉老了，他在《祭十二郎文》中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现代社会，却是“七十小弟弟，八十不稀奇”。因为古代人的寿命不如现代人久长吧。据说，美国人和中国人平均寿命都已超过了七十岁。这自然与科学进步有关，不少“不治之症”已可治愈。饮食讲究营养成分，居住考虑环保因素，越来越多的人打拳、练气功、跑步、减肥，保持了健康。难怪不少国家惊呼，不久将来，人们将步人“老人社会”，老人将占人口的多数。不久以前，有两位美国名人相继去世。一个是棒球名将曼托，另一个是摇滚歌手贾西亚，都只活了六十多一点，人们为他们英年早逝深感婉惜。曼托是酗酒，造成肝病；贾西亚是吸毒过量。如果没有这些恶习，他们不会这么年轻而离开人世吧。

（责任编辑　舒元璋）

生物学家石声汉的劫后幸存诗

● 涂光群

石声汉教授祖籍湖南湘潭，生于1907年11月19日，殁于“文革”期间的1971年6月28日。在他生活、工作的六十余年，正值中国多灾多难的岁月。他从小体弱，中年又患严重的肺心病及哮喘。在时难世艰的几十年，他以羸弱之躯，顶着各种干扰，孜孜不倦地工作，写成近六百万字的科学著作，涉及植物生理学、生物化学、植物学和动物学、古农学、农业教育等领域，饮誉海内外。例如他在中国古农学研究、注解等方面的成就，英国和日本学者都极重视。著名英国学者李约瑟博士写的《中国科技史》中，曾多次引用他的论著。然而他又是个艺术家，喜好中国传统诗词、民歌、书法、篆刻。1928年他在广州中山大学毕业后，留在生物系当助教，曾参加大瑶山采集队，赴广东瑶山进行中国近代首次动、植物的科学考察。返回后他在学校出版《采集队采集日程》、《广东北江瑶山初步调查报告》等科学著述；同时也发表他搜集的《瑶歌》二百余首。在诗艺方面，他尤其擅长作词。写词伴他生活近半个世纪，作品近四百首，虽因战乱丢失部分，但保存下来新近出版的近一百首词，足可传世。与他共过事的古史学家顾颉刚、武汉大学的古典文学教授刘永济均称赞他的词，“不下宋名家”。

石声汉出身于一个家道中衰的书香世家，父亲精于书画、金石篆刻，擅长写诗作文。他因家学渊源，长期浸润习染，资质敏感，又受小说《红楼梦》、《聊斋志异》中感伤诗词的触发，所以12岁就曾做诗，来宣泄一个“穷房”子弟身处大家庭压抑下的某种郁闷、伤感。

他15岁至17岁，独自离家，到长沙明德中学上学，因家贫，几乎辍学。只因他聪敏好学，深受老师器重，才为他争得惟一一个半工半读名额，替学校管理图书，同时完成学业。后来他又离家去武昌“高师”(武汉大学的前身)读生物专业。还没成年，他已尝受了生活的艰辛，离别的苦情。有感而发，发而为词。在他写的《相见欢》中，便流露了他独自离家的悲楚。

无聊细数行云，晚风轻。试问秋来何事不销魂？漫漫路，家何处？倍伤情。天把相思尽付可怜生。

爱情诗篇

石声汉先生，是性情中人，他对青年时代恋爱结婚的妻子许慕贞女士情爱深笃，他的《荔尾词存》中有一些美好动人的篇章是献给女友——爱妻的，如《莺啼序》：

斜阳尚凝旧陇，待长林共暝。晚烟起、飞罥(音juan，此处是缠绕的意思)空枝，逐风飘漾难定。正相念，天云深处，征鸿又报秋归讯。乱山前，雾色苍茫，火霞初褪。　蔓草萧疏，暮景淡晦，绕孤坟寂静。月初上、乍绽银辉，寒光流泻荒径。漠空原，风鸣古柳，藓泥罅、哀蛩凄紧。漱青苔，溪水涓涓，伴伊清冷。　当时少小，却解相怜，也万端绮境。记并坐、溪头闲话，共濯沧猗，素手扶肩，垂鬟拂颈。寒泉浸缭，雪跌霜踝，芳心绰约腮生晕，道天边、月也和侬病。相携涉水，还

将憨笑央人，苔泥滑处扶稳。　秋还依旧，月更如昨，正那寻倩影。最苦是、晓窗孤坐，旧梦都荒，客馆凄清，泪眸长醒。飘零湖海，难蠲幽怨，温存谁寄相忆语？画腮痕、羞向人前揾。泉台千遍呼君，但愿相忘，漫牵旧恨。

这首词，他很感性地、细腻地写和初恋情人的约会过程。先是环境描写继而触景生情，写他们的约会，最后是追忆：那逝去的日子就像在昨天，秋色依旧，月光一样明亮。可是她的倩影哪儿去了呢？他晓窗孤坐，旧梦都荒，客馆凄清，泪眼长醒……

在许女士31岁生日时，石先生写了《寿细君》的《鹧鸪天》，状写了中国知识分子令人伤心落泪的困苦生活；表达了对爱侣深情的感激，尤其动人：

自嫁黔娄百事乖，春风纨绮尽蒿莱。岁朝羁旅伤憔悴，九月寒衣未剪裁。儿女累，米盐灾，七年犹著嫁时鞋。鸳盟若许前生约，后世为君作妇来。

忧谗畏讥

如果说，青年时期，石先生的词，那是他刚刚涉世不久不深，虽说已尝受苦辛，但仍对生活充满热情和幻想，描绘美好事物（如爱情），显得比较轻灵、潇洒，富有浪漫情调；而进入中年，他这位视野扩大（曾在英国、德国留学进修四年多）、学成归国，一心要用科学报效国家的正直知识分子，处在内忧（蒋政权的腐败；人事的错杵）、外患（日本侵略者强占我国大片国土）夹层之中，历经坎坷，他的诗性词风已走向沉郁，更加直面严峻的现实。1928年毕业后，他留在中山大学生物系任助教，工作、科研都出了成果。然而1931年春，学校发生内部矛盾，系主任和他均遭排挤，1931年秋天，他只好离开中山大学，去浙江大学工作。1936年秋天他从国外归来，怀着一腔"科学救国"热情，自愿去偏远而贫穷、急需专业人才的西北农林专科学校执教。他倾心于用学到的知识，来改造西北干旱地区的农业。可是不久，他和校长却无端遭攻击和排挤。在1937年底，他愤然辞职，离开那儿。石先生期望着做事有个好环境的美丽梦想，在腐败的专制体制带来的人事纠葛面前，顷刻间，像泡沫一样破灭了。石先生40年代后期，就他写作诗词的"故事"，发表过一篇专文"忧谗畏讥"，道出了他写作诗词的动因及内心情结。"谗"是进谗言，向体制内的权势者进别人（其欲攻击的对象）的谗言。"讥"是在人前背后，对被攻击对象散布流言蜚语，或直接的攻击，造谣中伤。中国自古以来有所谓"谣啄杀人"、"人言可畏"，即是指此。"谗"和"讥"，这是两具最常用的颇含杀伤力的"武器"。好些正直的中国人，心里"畏"是畏，仍是忍受着、并顶着这种攻击、诽谤、告恶状，而照样做人做事，否则就做不成任何事情。但还是有好些人，他们的事业被迫中断；甚至被这种攻击毁坏了。这是一。再则，这些善良、正派的知识分子，他们既是"忧谗畏讥"，又还始终不改他们那颗忧国忧民、矢志不移的报国之心。这使他们的处境更加艰难了。

1937年底，石声汉在西北农专遇到新的人事挫折，他的词中有这样的句子："……秋期蓦地风浪卷，病文园，羸弱招虚谤。十年误尽韶华，粉褪香销，鬓霜渐涨。"写作此词时，作者才30岁。

愤然离开"西农"后，作者写了三首寄给"西农"友人的《水调歌头》（长沙乡居）。这几首词，他不仅回首了自己的"一出续黄粱"（想在这学校施展自己抱负的美梦破灭）（第一首），而且绝妙地讽刺了那些声称到西北来"办教育"的国民党官僚的丑态："烽火漫云急，道远正无妨。须知抗日救国，正好做文章。胡桃国防树也，萝卜国防菜也，慷慨说周详。热血俨如沸，讲演声琅琅。飞机过，大炮响，始匆忙。太太细软文件，偷向四川藏。练习话剧歌咏，组织宣传大队，出发避穷乡。救国募公债，遍解他人囊。"（第二首）

第三首则表达了作者决不与这类人为伍的凛然正气，也是一个以科学救国为己任的爱国知识分子在黑暗中的呐喊："日暮电灯黑，独坐

石声汉教授(一九六〇年)

静思量。不才如我之物,何苦亦装腔。欺人自欺而已,于我于人何补?愧汀湿如浆。附和事容易,难在泯天良。人才事,百世计,许荒唐?廿年卅年以后,粉骨岂能偿!人生餬口而外,尚有其它可贵,长叹起彷徨。珥耳服辕久,风起忆穷荒。"

生活的艰辛

作者在抗战中后期写的《病骥集》37首词,反映了当年知识分子艰难的生存处境。这是血泪汗水凝成的诗篇,如《沁园春驮行病骥》一首,以极其生动的象征艺术手法,典型化地状写了知识分子在物质条件匮乏的艰难生活困境中,苦苦挣扎着做事的情景。

《嘉州自作日起居注》(《浣溪沙》六首),是抗战期间大后方教授生活的白描。常听人说国民党统治的大后方教授生活极其清苦、艰难(另一方面,则是国民党大官僚孔(祥熙)、宋(子文)等家族及特权阶层生活的奢靡、腐化)但这些中国知识界精英,生活到底清苦、艰辛达何等程度,并非许多人都具体知晓的。这是中国历史的一页,我认为后人仍应该知道的。石声汉教授写于1944年夏末这六首现实主义的《浣溪沙》词,恰好填补了这一空白。今全篇引录,供读者观赏:

其一

五鼓敲残露薄曦,匆匆推枕起寻衣,渐闻啼鸟弄晴晖。汲罢井华僵指活,烧明冷灶倦眸眵,营门吹角报升旗。

其二

白足提篮上菜场,残瓜晚豆费周章,信知菰笋最清肠。幼女迎门饥索饼,病妻扬米倦凭筐,邻厨风送肉羹香。

其三

十号(每月发薪之日)才能几日过,频翻挂历待如何,纵教发放也无多。寄卖行前低问讯,旧书摊畔再巡逻,近来交易有成么?

其四

双袖龙钟上讲台,腰宽肩阔领如崖,旧时原是趁身裁。重缀白瘢蓝线袜,去年新补旧皮鞋,羡它终日口常开。

其五

课罢归来喘未纾,襁雏蹀躞扫庭除,添薪落叶也都疏。脱粟饭成儿女乐,涤盘水竭病妻呼,挑灯先课大儿书。

其六

骤雨惊传屋下泉,短檠持向伞边燃,明朝讲稿待重编。室静自闻肠辘辘,风摇时见影悬悬,半枝烧剩什邡烟。

生命的真谛

石声汉先生在抗战后期,任教武汉大学时,花了8个月业余时间,写成一本《生命新观》的书,这书是接受他的同乡前辈、中国化学工业巨子范旭东先生的建议而写的。范说,应当有一本中文书,写出中国人自己的"生物学的人生观"来。石先生久久地酝酿、思考着,后来从他的业师、一位老教授张镜澄先生30年守着教席,以自己的修养,利用极艰难环境,创造了业绩中得到启示,顿悟:"生命是根据过去,利用现在,创造未来,是连续和谐的变化。"于是灵感沛然而

生，写出近十七万字的大著，用活泼、生动，幽默、通俗的文字，表达了深刻的人生哲理。该书当年在《海王》杂志连载，由武汉大学出单行本。1962年，经考古学家董作宾推荐，还在台北再版出书。我认为石先生那几句简洁、明白的话，是他的生命新观，也是生命哲学的精华。这个意思，1963年6月，他写给老友杨东莼的信中，有了更精彩的表述。他说，“黄金时代不在过去，尤不在将来；目前最不可放过：平生一切，皆以此为动力来源”。这几句话既是石先生一生实践的写照，也是他从实践经验中得来的黄金般珍贵的人生隽语。

在《生命新观》哲学书完稿的同时，词人石先生，也写了赞美创造的生命的庄严的歌。也是他自己生命甘苦、创作历程的写照。石先生的《春蚕梦》、《望江南》等十二首词，以蚕吃桑叶，吐丝，结茧，成蛹化蛾，生命成长，牺牲、奉献、消失的历程，来象征人们为社会劳作、奉献、创造，而宠辱皆忘，不求报偿的崇高生命境界。其间佳句迭出。回味无穷。

人格境界

石声汉先生在1946年11月9日，当其人生哲学著作《生命新观》一书脱稿时写的一首短词《鹧鸪天》(甲申受生日写)，还有他1946年秋天写的词《柳梢青》(丙戌秋作此封笔)，最能显现他的人格和境界。

《鹧鸪天》：

惯是同曹最少年，蓦惊华发欲侵颠。百无一可犹能悔，万有俱空总认缘。温旧梦，砌陈言，春蚕作茧不须怜。闲云野鹤西风紧，已算温馨自在天。

这首词，可以说是石声汉先生对其前半生的小结。他聪慧过人，又专心学业，所以从小学、中学到大学，他都是同届同学中年纪最小的。可是他饱经忧患。在埋首工作，“超负荷运转”之中，仍要承受那额外的精神负担，这就是流言的攻击、诽谤。用石先生自己的话来说，就是“百无一可”——“我怎么做都不对”。所以他那年37岁，已是“华发欲侵巅”了。尽管如此，石先生还是一颗爱中华之心，“虽九死而犹未悔”。这就是中国正直知识分子的本色、特色所在。也是石先生人格力量所在。他总是“春蚕作茧不须怜”，“平生不甚以显达荣乐为怀”。他很超脱，很散淡，但自己认定的人生道路，一生矢志不改。虽说“西风紧”，他依旧“闲云野鹤”“自在天”。

照说像石先生这样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知识分子，在新中国应该有个较宽松的，能够不受干扰地充分发挥自己聪明才智和专长的环境。然而事实同人们想象的不大一样，那些年，政治活动，已经渗透人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了。离石先生写小结自己生活的《鹧鸪天》词又十多年，石先生的处境怎样呢？1958年，在西北农学院从事古农学教学、研究的他，经过3年潜心持续努力，终于完成了对艰深难懂的中国古农学国宝书《齐民要术》97万字的今释本，由科学出版社全部出齐四卷大书，立即在海内外有了好评，如两位日本学者在与石先生通信中说，这是“贾学”之幸(日本人很重视研究中国六世纪农学家贾思勰的农学巨著《齐民要术》，称其为“贾学”)。然而也正在这时候，一场“拔白旗”的“教育大革命”却在全国高校开展起来。石先生这样一个为农业科学竭诚奉献，做出特殊业绩的人，竟荒谬地被当作“厚古薄今”的“白专”典型，遭猛烈批判。他领导的古农学研究室，也被迫停止工作。石先生心情苦闷，难以理解。但他坚信，弘扬民族传统文化，用现代科学观点整理古农书、古为今用的研究，对中国是有益的。

劫后幸存的书

“文革”浩劫中，多少有价值的学者、文人手稿被毁灭了，这是现代中国文化经历的一次无法挽回，也无从统计的损失。石声汉先生不是为发表的私人手稿《荔尾词存》，也被强逼着，作为“黑材料”上交。1979年，石先生逝世8年之后，学校当局正欲将这些“文革”残留下来的“黑材料”销毁，得亏石先生的好助手姜义安先生长了个心眼，他从中翻检出来了石先生的《荔尾词存》。这本险遭火焚的颇具识见和欣赏价值的中华传统词集之一，才算幸免于难。

(责任编辑　舒元璋)

国歌的故事

● 俞乃蕴

打开史册,对我国的国歌演变作一点鸟瞰: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清朝曾制作了一首国歌,题为《巩金瓯》:

巩金瓯,承天帱,民物欣凫藻。喜同胞,清时幸遭,真熙皞,帝国苍穹保。天高高,海滔滔。

清廷被推翻了,这首《巩金瓯》也就成了清廷的挽歌了。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蔡元培任教育部长,主持在全国征集国歌。是年2月,临时政府《公报》刊出了沈恩孚作词、沈彭年谱曲的《国歌拟稿》,原文是:

亚东开化中华早。揖美追欧,旧邦新造。飘扬五色旗,民族荣光,锦绣山河普照。我同胞鼓舞文明,世界和平永葆。

孙中山只当了四十多天的临时大总统,袁世凯粉墨登场,这首《国歌拟稿》也就进了历史档案馆。

1915年袁世凯废除民国,宣布1916年为"洪宪元年",当时,袁氏的"政事堂仪礼馆"制作了一首国歌,词文如下:

中华雄踞天地间,廓八埏,华胄以来昆仑巅。江湖浩荡山绵延,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

什么"勋华揖让开尧天,亿万年",洪宪皇帝只当了八十三天!

1918年安福(系)国会选徐世昌为大总统,1919年成立了"国歌研究会",决定以相传上古尧舜时代的《卿云歌》为国歌。词如下:

卿兮烂兮,纠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

本来,原文只有前四句,为了歌唱的需要,重复了"日月光华,旦复旦兮"这两句。

物换星移,几经更迭。1926年广州国民政府出师北伐,到了1928年6月结束了北洋政府的统治,国民政府迁都南京。

1929年,国民党当局把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时的训词,作为"国民党党歌"。1936年国民政府以此作为代国歌,直到1943年才正式公布作为国歌,原文如下:

三民主义,吾党所宗,以建民国,以进大同。咨尔多士,为民前锋,夙夜匪懈,主义是从,矢勤矢勇,必信必忠,一心一德,贯彻始终。

1949年9月21日至30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共商建国大计。其中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政协筹委会第六组主要拟制国旗、国徽、国歌的方案。聘请了马思聪、吕骥、贺绿汀、姚锦新等参加国歌词谱评选委员会的工作。7月向全国征稿,截止8月30日,全国(包括海外华侨来稿)共收到国旗、国徽、国歌的稿件2664件,第六小组在应征国歌词曲中,选印了一部分供大家参阅,其中包括郭沫若、马叙伦、欧阳予倩、冯至等名家的应征作品。郭老的作品后来以《新华颂》为题,发表在1949年10月1日的《人民日报》上。有的词曲还组织乐队演奏过,但大家都感到不理想;同时,又感到在短时间创作出高水平的国歌词曲,还是比较困难的。

最早建议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歌的有周恩来、徐悲鸿、刘良模等人。经第六组反复研究,比较一致的意见,在国歌未正式制定之前用《义勇军进行曲》作为代国歌。

从法国留学归来的艺术大师徐悲鸿,对《义勇军进行曲》有着特殊的感情。1935年2月,田汉在上海写完电影剧本《风云儿女》和主题歌

《义勇军进行曲》后不久，即被国民党反对当局逮捕下狱。徐悲鸿四出奔走，设法营救，他找了宗白华等人，将田汉保外就医。当时，《义勇军进行曲》已广为流传。徐悲鸿慨然评述道："垂死之病夫，仍有强烈之呼吸；消沉之民族里，方有田汉之呼声。其音猛烈雄壮，闻其节调，当知此人必不死，此民族之必不亡。"人们一致赞颂田汉、聂耳作词、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是以金石般的文字，号角式的旋律，写出这首鼓舞中华儿女前仆后继、不屈不挠、顽强斗争的战歌。

在讨论中，也有人提出，歌词中有一句"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似乎不合时宜，不太适用，主张修改一下。也有的主张不作修改。为了便于会议主席团领导同志审定，小组推选郭沫若等人修改了一下，郭老改稿共分三段。9月25日晚8时，毛泽东、周恩来在中南海丰泽园召开座谈会，讨论协商国旗和国歌问题。出席座谈会的有：郭沫若、沈钧儒、黄炎培、陈嘉庚、张奚若、马叙伦、田汉、徐悲鸿、李立三、洪琛、艾青、马寅初、梁思成、马思聪、吕骥、贺绿汀等18人。毛泽东说，大家都同意用《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意见比较一致，我看可以定下来了。马叙伦说，有个别人主张修改一下某些歌词。周恩来接着说，要嘛就用原来的歌词，这样，才能激励感情，修改了就没有那种感情了。法国用《马赛曲》作为国歌，也是没有修改过的嘛！毛泽东说，我国人民经过了艰苦的斗争，取得了伟大胜利，全中国快要解放了，但还受帝国主义包围，不能忘记帝国主义的压迫，要争取完全的独立、解放，还要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还是保留原来的歌词好。大家热烈鼓掌，表示完全赞同。会上，毛泽东、周恩来提议，大家合唱《义勇军进行曲》。后来，毛主席在有关国歌的一份文件上批示：拟用，居安思危。

居安思危，是唐代名臣魏征在《谏太宗十思疏》中说过："居域中之大，不念居安思危，戒奢以俭，斯亦伐根以求木茂，塞源而欲流专也。"《义勇军进行曲》的"前进，前进，进"的声音，永远响彻大江南北，长城内外，"居安思危"四个字，也永远在谆谆告诫后人！

在"十年浩劫"中，国歌只奏不唱了。后来，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国歌的歌词作了改动。

到了1982年12月4日，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决议恢复《义勇军进行曲》作国歌。决议指出："国歌体现了居安思危的思想"。

从战歌到国歌，从战火纷飞的年代，到改革开放、进行现代化建设的年代，特别是今天仍然面对强权政治的世界，国歌始终激励着人们，奋勇向前！

(责任编辑　仲　文)

请订阅《文史春秋》

鲜明特色：视角独特
百态纷呈　具体翔实
生动感人

- 《文史春秋》双月刊，国内外公开发行
- 16开本80页码彩色封页
- 半年定价15元，全年定价30元
- 邮发代号：48－93 全国各地邮局(所)均可订阅
- 本刊地址：广西南宁市桃源路3号
- 本刊电话：(0771)2807862
- 本刊邮编：530021[可直接向本刊发行部函购，不另收邮费]

《文史春秋》是广西唯一，全国不多的文史类综合刊物，内容主要是记述我国和广西近现代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和社会百态、民族风情等史料，以"亲历、亲见、亲闻"史料来源为主，以独特视角，生动感人笔调将您想知道，于您有启迪的，对您有所乐的史与事告诉您。开设领袖剪影、人物春秋、将军轶闻、史海钩沉、内幕秘闻、文史传奇、文史知识、民族风情等几十个栏目。知识性广、可读性强、可资借鉴，可供珍藏。

有心报国岂无路

● 臧英年

人生的前途和发展反映了四周环境的基本框架和条件，是所谓:大势所趋。同时，人生的选择和努力也决定了个人运作的成效和结果，那便是:事在人为。于是，环境和个人交互影响，其结局便也千变万化。人生的旅程也蕴藏了无限玄机，或若隐若现，或突如其来。在人生旅途的每一个转折里，都出现了新机遇。而其轻重取舍，何去何从，便要靠自己去主宰了。

随家赴台

1949 年夏天，我随家人离开大陆，距今已 50 年整。我们从厦门渡海到达台湾，此行既改变了我的前途，也预铺了我日后的报国之路。先父是爱国爱乡、正直清廉的堂堂君子，抗日战争前后，曾任职国立东北大学校长十年。他携眷抵台后，可真是两袖清风，身无分银。而我于 1950 年 6 月在台中一中毕业后，便决定投身全公费的左营海军机械学校，以减轻家庭的经济负担。我亦曾以名列前茅的成绩考上台湾大学工学院机械系，但却近在咫尺，未入其门。

因为秉性开朗，喜欢活动，又有相当的运作能力，我在台湾海军机械学校四三年班乙组的马公岛入伍培训期间，就被选派为海军军官和机械两校数百名学生的总队长。1951 年初回到左营海军机校和升入五四年毕业班时，我都担任了班长。50 年代台湾的反共教育是十分彻底的。“反攻大陆、杀尽共匪”的呼号，在台湾喊得震天价响。还记得台湾海军“太平舰”被解放军鱼雷艇击沉后，台湾轰起了一阵“献舰复仇”的运动，当“海军总司令”马纪壮到达机校视察时，我还被指定代表全校学生做了一番慷慨激昂、“与汉贼誓不两立”的即席发言。那时也真是信誓旦旦，怒发冲冠。1958 年国共金马炮战时期，台北“海军总司令部”特别举行了鼓舞士气的“海军装备展览”，我曾被派把守头关，当“总统”蒋介石亲临参观时，由我首先向他报告了一艘刚自美国接收来的军舰的情况。

在海军服役的最后一年，我以“国防部联络局”上尉联络官的身份奉派为何应钦上将的随从武官，伴随他于 1962 年出访欧美两洲。与何将军朝夕相处，给了我不少启发，增加我不少见识。1963 年我从海军退役后，考入台湾政治大学公共行政企业管理中心，工作了四年。

参加钓运

1967 年秋天我获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奖学金，就读于该校教育心理研究所。初到美国，美中交往闭塞，大陆情况不明，美国报纸上绝少看到有关中国情况的正面报道。我在华盛顿大学先被选为中国同学会会长，后又连做了数任同学会的顾问。那时，如何日后报效祖国的思索即常系心头。

1970 年我读完研究所，前往西雅图社区学院任职。次年，爆发了惊天动地的钓鱼岛事件。那时台湾蒋介石政府正面临被排出联合国的压力，为讨好日本和美国，表现十分软弱，不能坚定立场，据理力争。这便使美国校园内来自台湾和海外的中国学生感到愤慨。转眼之间，美国各

大校园都成立了保卫钓鱼台委员会，一致呼吁要“对抗日寇，捍卫国土”。在此同时，中国北京方面的表态是振奋人心的。于是许多同学就立即跳出了对中国大陆持否定态度的槽臼，而对新中国刮目相看，重新定位。不少命名《钓鱼台战报》的校园刊物，似雨后春笋一般地破土而出，大家相互传阅，彼此鼓励，齐心协力，共奔前程。

这时，我便和华盛顿大学另一同学张智北联手推动了在西雅图的保钓鱼台运动。他掌内，我主外。我们公开在华大校园焚烧了报道失实的“中央日报”，我在华大礼堂主持了上千人出席的誓师大会。大家又手执标语牌和宣传旗，拥上西雅图街头，到达日本总领事馆，我亲递了抗议书，并向当地的新闻界发表了抗日内容的公开宣言。如今，回想起那段热血沸腾的时日，还是心头激动，旧情难忘。

电视风波

1971 年 11 月，我在报上看到美国尼克松总统即将访华这一好消息，便立即打电话给西雅图五号电视台，建议该台“观点”节目主持人专辟一个座谈节目，让当地华侨发表一下他们对尼克松总统访华的观感。这个建议被电视台采纳后，主持人要我安排不同观点的人加入座谈。于是，一位亲台的老华侨，一位任职波音公司的华裔工程师，一位反蒋情绪高涨的台湾籍访问教授，一位香港背景的研究生，加上我，便组成了一个五人座谈会。

在电视座谈会中，我们各就所想，畅所欲言。我发表的主要看法是：“我赞成尼克松访华。因为美中两国相隔久，误会深。正因为两国间政治和经济制度不同，彼此间沟通和交流的需要和重要性才更大。尼克松访华将开辟美中人民的交往之路，势在必行，意义深远。”这番话如今看来，是尽人皆知的常识，可是在 28 年前的那种反共气浓的美国大众和华侨社会里，这种论调就大大不合时宜，甚而是“妖言惑众”了。立即，就有人把我的名字报告了美国联邦调

1998 年 12 月，臧英年、苗丽华夫妇在友谊宾馆

查局。好在我是“明人说亮话”，没有任何见不得人的秘密，调查局的调查便也无疾而终。此事的前后经过都登上了西雅图两家大报显著的版面，倒使我成了当地家喻户晓的“知名人士”。当然，我在一些人眼里，从此也成为“毒蛇猛兽”。那时，我却自处坦然，我坚持自己的观点，力倡其说。因为我不认为大陆的落伍，会是台湾的佳音；大陆的内争也不会产生台湾“反攻大陆”的机会。惟有美国和中国大陆及早接触，才会将大陆从自封自困中解脱出来，让中国面对现实的国际环境，进行深思和自省，自强和自立。这一来，台湾西雅图“总领事馆”例年送我的双十国庆请贴也立即中断了。一夜之间，我从他们的“贵宾”名单上坠人了万恶不赦的“黑名单”。

在这个黑名单上，我姓名高挂，历久不衰。1987 年深秋，何应钦将军以九十九高龄在台逝世，我申请去台奔丧，以示对长者的敬意。这时我已持美国护照十多年。台湾驻西雅图“总领事馆”也早在 70 年代更名为“北美事务协调办事处”之类的名称。但，旧账陈远，遗恨难消，办事处工作人员在收取了我美国护照一周以后，答复说：“臧先生，护照请收回，你知道为什么我们不能给你赴台签证。”我没有生她的闲气，我明白，她是奉命行事。直到 1993 年，我人台的禁令才最终解除。

一九六二年，臧英年（右）任何应钦（左）的随从参谋兼译员。

促进交流

在70年代和80年代，我在美国大张旗鼓地展开促进美中建交和交流的活动，我以美中人民友好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全美华人协会西雅图分会会长和西雅图重庆友好城市协会会长等身份，不断在各种新闻媒体上提倡美中建交，主办许多美中交流活动，也大量接待了中国的移民、访问学者和政府的、工商界的代表团人员。例如，1973年我首先接触了中国民航赴西雅图购买波音707飞机的机组人员；1979年4月，我力排阻拦，组织华侨热烈欢迎首次抵达美国西雅图港的中国远洋轮船公司属下“柳林海”号货轮。在1979年至1984年间，我也参加了邓小平、薄一波、李先念、赵紫阳和李鹏等国家领导人的访美活动。其间还曾应卡特总统的邀请，三进白宫，在中美交流的活动中留下了不少美好的回忆。

1989年，我已从西雅图社区学院教职岗位上提前退休三年。当年夏天北京政治风波刚过，我就决定接受美国丹佛大学之邀，在该校担任了由中国国家外国专家局主办的“高级企管人员讲习班”的授课任务。9月下旬我和妻子又应专家局之请，前往北京参加国庆活动。

1990年刚到北京旅居，妻子便受聘为文教专家，我则是想在企业咨询和投资方面报效辽宁家乡。但很快令我发现，合作伙伴少坦诚多私欲，又到处可见地方保护主义的魔影。我在这方面失败之后，又寻找报国之新途。从1992年起，我全力投入了在中国义务控烟的工作，当年11月我和卫生部陈敏章部长交谈之后，他推荐我担任了中国与健康协会的美籍名誉理事。后来，我又陆续在台湾、澳门和上海担任各地控烟组织的顾问。最近，我又开始为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中国办事处作顾问，在首都医科大学任教，专攻控烟问题。我陆续写了一百多篇中英文的提倡控烟、禁烟和戒烟的文章，在国内外的报刊上发表，到不同单位作控烟报告更是我例行“私”事之一。

今年3月中旬，我还去华盛顿参加了一个儿童与烟草国际政策研讨会，与会者中有数十位国家卫生部部长和国会议员，控烟运动已在国际上风起云涌，中国控烟的措施和成效一定会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常念祖国

祖国常在我心中。70年代我参加保钓鱼岛学生运动，80年代我促进中美交流，90年代我从事中国控烟义务活动，也许到了21世纪，我要再投入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工作。作为炎黄子孙，我一定热情不减当年，信心充沛全力以赴地从事自己选定的工作，对祖国极尽绵薄之力。我要深深感谢先父先母，他们的为人之道，爱人之心，示我典范，种我根基。我要歌颂中美两国，它们造就和磨练了我，也给了我处处施展才能的园地。我要鼓励两个初入社会的儿子，他们是各有专长、头脑清醒、身强体健、烟酒不沾的翩翩少年。我要感谢许多亲友，有了他们的支持和善意，我才受到更高、更多的鼓舞，从而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我要祝福我的岳父母和其家人，敬天爱人，亲切互助，是他们的本色。我尤其要赞美我的爱妻苗丽华，她和我在华长住十载，同甘共苦，美中往返，忧喜同当。

（责任编辑　文　贤）

“却卷波澜入小诗”

● 胡 绳

去岁(1998)岁尾、今年年初,我虽有病,但仍出游湘南衡阳一带,并至粤北的韶关。衡阳和韶关都是我五十多年前到过的地方。1941 年我奉党组织命,由重庆到香港,路过衡阳;1942 年又由香港经韶关、衡阳到内地。其时为皖南事变以后,国民党当局大肆反共,在韶关的广东省委和南方其他某些地下党组织遭严重破坏,正在我路过韶关时,不可不说是一时波深浪急。五十余年后,重临故地,时移世迁,海晏河清。因录此时作小诗三首,并借苏东坡的诗句为标题。

胡绳同志近照　　　　沈健中 摄

一　忆六十年前过衡阳

匆匆不见百年樟,
雪岭春寒满地霜。
山鬼林魈空警逐,
风声鹤唳渡湘江。

注:我 1941 年是经贵州越雪峰山(这是湘西的大山)而到衡阳的。衡阳火车站前有一老樟树,今日人谓其寿已一百五六十年。但昔日路过,视而不见。

二　韶关

少年行万里,履险尚从容。
话旧浑如昨,称名似未逢。
城多千丈阁,人尽白头翁。
六十年来事,沧桑屡变通。

三　南岸村

残屋三间幸尚存,
颓垣难觅故人魂。
草丛石径轻移步,
恐有当年旧屐痕。

注:韶关市曲江县重阳镇有南岸村。抗日战争初期,我党地下组织南委副书记张文彬同志在村中赁屋供同志来往韶关时居住。我在1942 年也曾暂寓此。文彬同志当年被捕瘐死狱中。1998 年冬我重来韶关,在当地同志帮助下觅得此小屋。

炎黄春秋

孔德懋（中）与孔德成夫妇在台北合影

1950年，陈赓（右）与邓小平（中）贺龙（左）合影

■ 烈士方志敏和他的妻子

■ 忠贞不渝的刘达五将军

■ 臧英年：有心报国岂无路

■ 王作尧命途多舛斗争不屈

■ 李仙洲之子李德强驰骋商海

■ 陈赓大将在援越抗法中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ISSN 1003-1170

9 771003 117002 09>

中国标准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

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